

公益慈善周刊

2013年3月24日

2013年第10期(总第064期)

◎微观点

◎政策点击

- 民政部盘点慈善事业十年发展 5
- 全国社会组织评估工作成效明显但发展不平衡 7
- 关于公布获得2012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的通知 7
- 广州市民政局将设慈善组织监督委员会 10
- 广州将推千个慈善项目 欲募资3亿元 12

◎专家视野

- 王名：政府机构改革让社会组织迎来春天 13
- 张强：公益慈善不能代替公共服务 15
- 王振耀：高校公益引领未来生活方式 16
- 张维迎：慈善需要市场的逻辑 19

◎行业观点

- 人民日报：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建言） 22
- 新华日报：社会建设亟需社会政策的创新发展 23
- 羊城晚报：免费午餐“正能量”背后之困 25
- 新华网：“公益创业”成为中国年轻人创业新领域 29
- 南都网：志愿者如何与公益组织一起成长？ 30
- 刘选国：中国的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远？ 32
- 霍庆川：慈善联合会应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典范 35
- 晏和淘：从无根树到有根树，NGO的生存之道 36
- 姚遥：个人自愿捐赠的才是慈善 39
- 杨澜：“做慈善，我是尝到甜头啦” 41

◎行业动态

- 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区发布会在京举办 45

《中国非营利组织法专家建议稿》出版	46
《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才现状调查报告》在珠海发布	47
《贫困地区小学生缺鞋状况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49
支付宝发布数据显示, 2012 年网络公益捐赠同比 2011 年增长 70%	51
一份环保提案背后的公益力量	53
“红丝带”召开理事会展示“造血”项目, 白岩松建议重视软捐赠	56
京城农家女“嫁”到广东——国内首家乡村妇女基金会诞生记	57
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颁奖典礼举行	60
微博曝红社会企业网店	63
盘点 2013 全国各电视台慈善公益节目之最	66
◎公益人	
杨文庄: 现在没有太多乐观的资本	67
“世界社工日”看世界各地社会工作者的辛苦与满足	72
王克勤: 士不可以不公益, 任重而道远	74
◎亮机构	
阿里之家: 帮灾区把特产卖到全国	78
心目图书馆: 打开心目和盲人一起阅读	83
◎国际观察	
Dan Pallotta: 我们的慈善观, 大错特错!	85
美国非营利机构能力建设的新变化	89
慈善如何缔造美国	91
美国大学募款之道	104
六个改变世界的青年公益组织	108
志愿活动影响力评估方案	110
后金融危机时代 挣扎的华尔街慈善业	112
跨代社区: 邻里关系亦能有效助人	114
可乐生命: 一个公益项目的“寄生”史	118
把设计思维带入公益世界	121
遗产税如何撬动美国慈善	123
◎企业社会责任	

想过做 CSR 吗?	125
环境责任险立法正在协商中	130
中国标准化协会联合海尔空调起草制定行业首个除 PM2.5 标准	131
万通样本: 绿色公司的公益之路	132
利乐公布“2020 环境目标”最新进展.....	135
三星加强中国市场布局 创建投资与社会责任并重模式	137
◎社会组织登记体制大变革专题报道	
聚焦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大变革	137
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契机	143
法制日报: 只有法律自身完善社会组织才能成熟	144
中国青年报: 政府放权给社会 四类社会组织将不需再找“婆婆”	145
中华工商时报: 民间公益组织或将蓬勃涌现	147
广东推进社会组织自治 力争半数组织承接政府职能	148
深圳率先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151
安徽强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152
◎公益布告栏	
第八届中华慈善奖公布入围名单 启动公众投票	153
福特基金会庆祝北京世妇会召开 20 周年项目招标	156
新浪微公益办事流程	157
2013 年第五届 SEE • TNC 生态奖要评基层政府.....	160

◎微观点

加措活佛告诉我：如果让佛教与现代慈善接轨，佛教也面临着改革。讨论起来，很受启发。厦门广普法师也说：既要普渡众生，就要入世，了解社会大众疾苦，并建立起慈善项目。慈济的理念则是：道场就在社区，应该深入社区做慈善，帮助贫苦大众。看来佛教通过转型，完全可以从事现代慈善。

——@王振耀

参加北师大珠海分校举办的中国公益人才高层论坛。政协委员王名分享两会归来的兴奋，他在报告中看到了社会组织体制改革。他认为从这一改革出发，下一步是社会服务体制改革，自然到社会治理的改革，如果这些改革都能顺利推展的话，那就真能形成包含结社生态系统、公民精神体系和公共协商领域的公民社会。

——@朱健刚

来自香港的许荣茂发言指出内地社区建设中存在自治不强、投入不足、参与不够、认同不高等问题，主张借鉴香港幸福社区经验，推进社区管理创新，加强民主自治，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形成以民生为重点、以服务为导向的社区服务体系，加快专业化社工队伍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幸福社区建设，挖掘社区文化内涵。

——@清华 NGO

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同的追求，有人义无反顾淡薄名利，有人热衷名利开拓进取，也有人利益至上只为稻粱谋。公益领域也不例外，认识到业界的多元性以及自身所处的真实境界，可以避免莫须有的道德判断以及不必要的道德包装。

——@倪一璟

昨天参加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2013 年会，感到网络组织优势是能够凝聚社会各方力量，能够形成共同发展的平台，促成互相支撑的体系和相互监督的自律以及他律的机制；劣势是成员各方目标不一致，组成人员的变化，倡导过程中难以统一协调和筹资面临着很多困难；这需要集中力量，求同存异，形成共识。

——@黄浩明 CANGO

◎政策点击

民政部盘点慈善事业十年发展

日前，民政部公布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我国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服务工作情况，对社会救助体系、减灾救灾能力、社会福利制度、拥军优抚安置工作和慈善事业近十年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盘点。

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

十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实现了从临时性、单一性社会救济向制度化、综合性社会救助的历史转型，救助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城乡各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了稳定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救助制度的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全覆盖。

各项救助制度的配套衔接切实加强。先后两批在全国 143 个县（市、区）开展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试点工作，探索建立了跨部门、多层次、分类别的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各项救助标准和补助水平大幅提高。从 2003 年到 2012 年，城市低保对象月平均保障标准由 149 元提高到 330 元；农村低保对象年平均保障标准由 2007 年底建制时的 840 元提高到 2012 年的 2068 元；城乡医疗救助人次从 2004 年的 640 万人次增加到 2012 年的 9134 万人次，支出资金从 4.4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221 亿元。2012 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乡低保、医疗救助资金 1547.3 亿元。

社会福利制度

逐步向适度普惠转型

十年来，我国社会福利政策不断完善，受惠范围逐渐由孤寡老人、残疾人、孤儿、弃婴等特殊群体向全社会拓展，社会福利事业正在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迈进。

老年福利事业大大拓展。截至 2012 年底，18 个省份建立了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生活补贴制度，22 个省份建立了生活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各个省份均出台了老年人社会优待政策。

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制定了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出台了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等。

孤儿保障有了全面的制度安排。2010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对孤儿抚养、教育、医疗、康复、成年后就业、住房等作了全面的福利制度安排；实施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机构集中养育和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1000 元、600 元，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补助地方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

面向公众的基本社会服务不断拓展。2012 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

作服务的指导意见》。2011年和2012年，中组部、民政部等多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有了制度性安排。

福利彩票事业实现跨越发展。2009年国务院颁布《彩票管理条例》，有效规范了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工作。福利彩票销售额连年增长，十年间累计筹集公益金2254.3亿元，有力支持了社会福利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发展。

慈善事业加快发展

十年来，各级政府从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规政策、加强奖励扶持、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强化能力建设等方面入手，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政策引导进一步强化。民政部先后颁布了两个为期五年的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出台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和《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连年开展中华慈善奖表彰活动。一些省份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从政策扶持、慈善组织孵化、慈善行业能力建设特别是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给予慈善事业相应的支持。

慈善组织快速发展、捐赠规模不断扩大。基金会数量从2003年的954个增加到2012年底的2961个，基金会总资产已超过800亿元；。社会捐赠总额2002年为20.8亿元，2008年和2010年均突破1000亿元，2011年为845亿元，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慈善活动由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救灾发展到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体育、扶贫等各个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志愿服务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组织大量涌现，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广大志愿者在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抗灾救灾工作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台了《志愿服务记录办法》。社区志愿者默默奉献在街道楼宇和村落中，为社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3-03/19/content_5462.htm?div=-1 [【返回目录】](#)

全国社会组织评估工作成效明显但发展不平衡

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获悉，自 2010 年 12 月民政部颁布《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以来，特别是 2012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提出“探索社会组织分类评估和第三方评估制度，全国社会组织评估率达到 30%，3 年内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全部纳入评估范围”的要求后，各地民政部门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各地社会组织评估工作推进力度还不平衡。

从各省级和计划单列市本级社会组织评估情况看，2012 年评估工作推进力度大、成效明显、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参评率超过 30%的，有青海、厦门、福建、北京、甘肃、宁夏等 6 省市。2012 年，青海省评估 123 家，累计评估 357 家，参评率 72%；厦门市评估 304 家，累计评估 325 家，参评率 51.8%；福建省评估 263 家，累计评估 593 家，参评率 45.1%；北京市评估 209 家，累计评估 700 家，参评率 44.7%。评估工作进展较快、取得一定成效、参评率超过 20%的，有河南、黑龙江、大连、宁夏 7 外，还有一些省市评估工作进展缓慢，参评率较低，个别地方至今仍未启动评估工作。

民政部今年将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列入对地方民政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303/20130300431999.shtml> [【返回目录】](#)

关于公布获得 2012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的通知

财税[2013]1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民政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 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45 号）规定，现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审核确认的获得 2012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予以公布。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

2013年3月8日

附件:

获得 2012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

- | | |
|----------------------|------------------|
| 1、泛海公益基金会 | 29、比亚迪慈善基金会 |
| 2、安利公益基金会 | 30、神华公益基金会 |
| 3、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 31、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 |
| 4、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 32、顶新公益基金会 |
| 5、亨通慈善基金会 | 33、瀛公益基金会 |
| 6、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 | 34、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
| 7、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 35、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
| 8、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 36、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
| 9、河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 37、中国保护黄河基金会 |
| 10、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 38、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
| 11、德康博爱基金会 | 39、中国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 |
| 12、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 40、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
| 13、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 41、华阳慈善基金会 |
| 14、济仁慈善基金会 | 42、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 |
| 15、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 43、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 |
| 16、中国盲人协会 | 44、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
| 17、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 | 45、中国航天基金会 |
| 18、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 | 46、中国禁毒基金会 |
| 19、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 47、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
| 20、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 48、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 |
| 21、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 49、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 |
| 22、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 50、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
| 23、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 51、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
| 24、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 | 52、中科院研究生教育基金会 |
| 25、华润慈善基金会 | 53、中央财经大学教育基金会 |
| 26、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 54、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
| 27、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 55、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
| 28、陈香梅公益基金会 | 56、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
| | 57、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

- 58、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 59、南都公益基金会
- 60、华民慈善基金会
- 61、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 62、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 63、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 64、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
- 65、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 66、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 67、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 68、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 69、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 70、中国扶贫基金会
- 71、海仓慈善基金会
- 72、爱佑慈善基金会
- 73、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 74、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 75、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 76、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
- 77、中国检察官教育基金会
- 78、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 79、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 80、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
- 81、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 82、中国孔子基金会
- 83、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 84、中国绿化基金会
- 85、万科公益基金会
- 86、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
- 87、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 88、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 89、人保慈善基金会
- 90、中远慈善基金会
- 91、中华慈善总会
- 92、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
- 93、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 94、中国癌症基金会
- 95、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 96、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 97、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 98、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 99、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 100、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
- 101、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 102、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 103、凯风公益基金会
- 10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基金会
- 105、天诺慈善基金会
- 106、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 107、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108、心平公益基金会
- 109、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110、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 111、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 112、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
- 113、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 114、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
- 115、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
- 116、南航“十分”关爱基金会
- 117、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
- 118、中国民航科普基金会
- 119、中国医学基金会
- 120、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 121、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 122、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
- 123、中国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
- 124、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 125、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 126、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
- 127、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 | | |
|-------------------|------------------------|
| 128、亿利公益基金会 | 139、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 |
| 129、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 | 140、增爱公益基金会 |
| 130、天合公益基金会 | 141、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 |
| 131、开明慈善基金会 | 142、鲁迅文化基金会 |
| 132、永恒慈善基金会 | 143、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 |
| 133、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 | 144、紫金矿业慈善基金会 |
| 134、民福社会福利研究基金会 | 145、智善公益基金会 |
| 135、东风公益基金会 | 146、包商银行公益基金会 |
| 136、北京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 147、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
| 137、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 | 148、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
| 138、刘彪慈善基金会 | |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地址：

http://czzz.mof.gov.cn/zhongguocaizhengzazhishe_daohanglanmu/zhongguocaizhengzazhishe_zhengcefagui/201303/t20130320_783305.html

[【返回目录】](#)

广州市民政局将设慈善组织监督委员会

广州市民政局将组织设立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昨日，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了解到，该委员会近期成立后，可对广州市慈善组织接受社会捐赠及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有望提高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和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受信任度。

对捐赠情况实施监督

广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易利华介绍，设立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监督委”)的法律依据是《广州市募捐条例》。监督委的监督对象为广州市慈善组织，包括：市区两级的红十字会、慈善会(共 26 个)，21 个公募基金会以及根据《广州市募捐条例》取得募捐许可的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

据了解，监督委具体有 5 项工作职责，包括：对慈善组织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实施监督；对因慈善组织运作不公开或不公平而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可以主

动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调查监督结果；提出或转达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工作意见和建议；向民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发现的慈善组织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调查和监督的实际情况，独立向社会公众发布年度监督工作报告。

按照计划，监督委对广州市慈善组织的下列情况进行监督：财务会计制度、受赠及募捐财产使用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制度建设情况；接受社会捐赠及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情况；受赠及募捐财产的使用情况；信息公开情况。

委员由市民政局聘任产生

易利华说，监督委由社会各界专业人士组成，全部是兼职担任委员，没有报酬，且没有政府公职人员和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委员人数在 11-15 名之间，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3 名。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选举产生。委员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 3 年。委员需符合一些基本条件，包括：热心于公益事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社会信誉；志愿担任委员，能够独立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委员由广州市民政局聘任产生。广州市民政局已经开始了委员的遴选推荐工作，并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慈善家、会计师、审计师、媒体工作者等发出了聘请函。

据了解，监督委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主任委员或者 1/3 以上的委员提议召开委员会会议的，可以召开临时会议。监督委下设秘书处，设在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负责监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广州市民政局、市相关部门支持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主动提供相关信息资料。由市慈善会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慈善组织作为发起人，全市慈善组织参与，共同倡议提高慈善活动和慈善资金管理使用的公开透明度，并自觉接受监督委的监督。监督委开展监督活动所需经费由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负责保障，经费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

来源：南方日报

地址：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3/22/content_7175810.htm

[【返回目录】](#)

广州将推千个慈善项目 欲募资3亿元

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近期将公布首届委员名单

推介成功项目要接受社会监督

3月21日,相关媒体从广州市民政局获悉,今年3月至6月广州将举办首届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其系列活动与2013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暨广州慈善日”活动一并开展。此外,引人关注的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有望在近期公布首届委员名单。

据介绍,本次推介会力争实现推出1000个慈善项目、募集资金3亿元的总目标,推介会系列活动与2013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暨广州慈善日”活动一并开展。

昨日,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通报情况称,今年初相关推介方案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后印发。进入3月份,逐步确定推介会相关事项,以及部署推介会筹备工作。此前被媒体报道的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委员会有望在近期公布首届委员名单。

3月至4月期间为项目收集阶段,有关部门将通过媒体、网络向社会各界征集慈善项目,并通过走访调研和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了解掌握困难群众当前最迫切和最直接的困难问题,开发设计相应的慈善项目。其后,推荐组委会对汇总的慈善项目进行初选,提出需重点推介的慈善项目初步计划。

4月至6月下旬,相继进入项目推介阶段和大会举报阶段。此后,进入监督实施阶段,推介会推荐成功的慈善项目纳入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委员会监督范围,全程监督。

关注监督委员会能重振社会慈善信心?

“广州即将设立慈善组织监督委员会”自今年1月被媒体报道以后,备受多方关注。记者查阅了解,中国红十字会最先在全国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而广州市设立的慈善组织监督委员会,在国内各大城市属于首创。

3月13日,市民政局印发《关于设立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方案》表示,监督委员会由社会各界专业人士组成,由市民政局聘任产生。

监督委员会由11-15名委员组成,并由全体委员选举产生1名主任委员、3名副主任委员。监督委员会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3年。监督委员会开展监督活动的经费均由市慈善组织服务中心负责保障。经费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

成立后的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否能够达到广大市民预期的监督功能?昨日,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该社会监督委员会作为国内的新鲜事物,会一直摸索总结,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让老百姓都信得过”。

来源：新快报

地址：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3-03/22/content_1550474.htm [【返回目录】](#)

◎专家视野

王名：政府机构改革让社会组织迎来春天

“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与中国改革总方向是一致的，这个方向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在此背景下，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将迎来发展春天。”3月14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名，做客正义网、腾讯网联合推出的“2013年全国两会系列访谈”时，就政府机构改革、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失独家庭等问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新一轮机构改革方向：小政府，大社会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后，长期从事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王名倍感兴奋。他告诉记者，此次政府机构改革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与整个中国改革的总方向相一致，“我把它称为‘小政府、大社会’”。

“简单地说，机构改革是让原来的全能政府在职能上、结构上进行创新，使之逐渐与市场、社会融合，变成有限的政府，发展出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然后形成国家、市场与社会相互和谐、相互制约、相互融合的体系。”王名认为，前几轮的改革经常存在“是往前走还是往回走”的争议，而新一轮改革脉络更清晰，更能呈现顶层设计思路，真正提出了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的放权。

王名表示，政府职能的转变仍是改革要义。要实现这一核心目标，需注意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政府的职能要向社会转移；二是政府职能要下放地方，地方能做的不一定非要中央统筹；三是要进行政府职能整合，一个部门能做的事不要让两个部门做；四是要注意避免因改革出现部门职能弱化等问题，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这次改革的亮点是明确提出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与此同时，新一轮改革方案也为今后的改革留出了较大的空间。”王名强调，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下一步能给人们一个足以期待的空间就算莫大的进步。

社会组织：借力机构改革迎来发展

作为研究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业内专家，早在十年前，王名就开始呼吁“立法保驾非政府组织发展”。

王名坦言，在此期间相关立法虽不多，但在法律框架上已经作出了一定的改进。“这次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后，新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可能会很快公布，不仅在条例和行政法规层面，而且在基本法层面也会有大的推进。”王名对此颇为乐观。他认为，短期内需要为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出台行政法规，此外，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法、慈善事业促进法、行业协会商会法也亟待列入立法进程。

王名表示，这十年，社会组织虽然已走过起步阶段并走向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在制度建设、能力建设、治理结构、制度框架方面还存有诸多问题。

在他看来，此次机构改革释放出政府向社会放权的强烈信号，这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进购买服务，这一次机构改革方案中还专门提到购买服务，将其提高到宏观管理和控制的角度。“购买服务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谁能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王名说，这就要求社会组织加快改革，加快能力建设和完善结构，但也需要政府给社会组织一定的试错空间和时间。

针对当下公众热议的铁道部门改革后铁路票价推向市场化可能导致票价上扬等问题，王名认为，公共服务的外包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慢慢建立新的监管和问责机制。“政府要学会从原来的直接做事转向委托第三方做事，这样效率会提高，实乃长远之策”。

王名还认为，社会组织是公众意愿集中表达的形式和平台，其重要功能在于化解矛盾，“比如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如果没有形成共识，很容易带来混乱，而当有了组织和共识，就有条件进行对话和博弈”。他补充说，对中国而言，今后几年会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真正春天。

失独现象：人口政策应引起社会重视

除了着重关注自己研究领域以外，这些年来，王名一直建言国家放开二胎政策。“这是我第五次提交这一建议。”他认为，目前引发公众热议的失独家庭问题，其成因部分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

王名说，据人口学专家分析，不管是从人口出生意愿还是从人口结构变化上看，我国目前人口总量都呈现萎缩现象。“千万不能拿陈旧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人口问题，更不能低估人口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当前人口政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正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正确看待。”王名说，“人口学专家分析认为，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比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成为失独家庭的概率要高一百倍。”针对这一问题，王名建议理清并明确政府、国家的责任，并提议建立公益性基金，动员社会资源帮扶失独家庭。

“我现在已经开始着力做失独家庭的全面调查，明年我还会继续提这个建议，也会让建议更加深入和具体。”王名一直坚信政策最终会因各界的努力而改观，“因为它不仅与每个人的生活、基本权益相关，还与社会、民族的未来有关。”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改革和转型的社会，我们眼下的梦应该是期冀改革和转型继续下去，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长远来看，最重要的还是保持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以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王名道出了他心中的“中国梦”。

来源：检察日报

地址：http://news.jcrb.com/jxsw/201303/t20130315_1067400.html

[【返回目录】](#)

张强：公益慈善不能代替公共服务

政府不能用公益慈善来简单替代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更不能把公益慈善作为新的“钱袋子”工程来运作。

已获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提出公益慈善等四大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前不久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则把慈善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

回顾过去几年公益慈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已成为地方社会创新的重要领域。这一趋势不仅发生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地，也席卷了宁夏、四川等中西部地区。不仅诸多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参与其中，许多地方政府也把公益慈善领域的建设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乃至区域经济社会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然而，在公益慈善浪潮如火如荼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冰火两重天的“公益困境”，老百姓既不满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公信力匮乏，也对当前社会组织的透明性、有效性诟病很多。这一困境揭示了我国公益慈善发展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府在公益慈善发展中的定位。

公益慈善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对应的社会职能有一定的一致性，那么政府的“为与不为”，就涉及到政府的“大小”问题，还有政府的“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问题。

政府的“大小”问题关乎治理范围的确定，要明晰基本公共服务递送框架和服务标准，确定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公益慈善工作目标的异同。政府的主体工作是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基于公平、通过法律确定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这与强调自愿性和参与性、以对弱势群体救助为主的公益慈善事业是有所差异的，尽管在一定层面上两者也相互衔接、相互促进。针对这些该政府有所为的领域，我们更多考量的是政府工作是否规范、到位。在现阶段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领域，政府不能用公益慈善来简单替代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更不能把公

益慈善作为新的“钱袋子”工程来运作。

政府“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关系到治理路径。公益慈善作为一项社会治理内容，政府的参与方式也直接影响到效果。自上而下的“大政府”动员型运作模式，与公益慈善本身蕴含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主性和公民参与性有着一定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不可作为，而是要转变治理方式，即从有形的手向无形的手转变，营造环境、搭建平台。不能大包大揽，以行政管理方式来硬性计划公益慈善领域工作，用政治动员的方式组织民众被动参与。软实力理论的创建者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和笔者交流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呈现的软实力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层面的创新活力，而不是政府的计划管理。

纵观全球，社会企业、社会金融等公益慈善创新工作在公共治理边界和路径方面不断突破传统认知框架，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简单、僵化的“角色”定位，而是一个政府、企业和社会三部门互动参与式、强调能促性的公共治理精神和氛围。

保证政府在公益慈善领域中更加有所作为，首先需要立法先行，加快慈善立法，加强底线建设。其次，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进一步破除政策障碍，从简单准入式监管转向服务内容上的监管，激发社会活力，让各类社会组织成为公益慈善工作的主角。最后还需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标准化，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和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政策工具充分发挥撬动社会资源的杠杆作用。当然，这里也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即建立可操作的社会效应评估体系，以保证公共资源得以有效配置。

来源：人民网

地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321/c1003-20859170.html>

[【返回目录】](#)

王振耀：高校公益引领未来生活方式

一所高校里，哪一级学生最重要最有价值？国外大学和中国大学最重要的区别在哪儿？在考察了国内外诸多高校之后，王振耀得出了结论：即对待本科生特别是大一学生的态度。

王振耀，中国公益研究院的院长。他认为，一所大学有无竞争力就体现在对大一学生的态度上。在哈佛大学，最好的条件一定是给大一学生的，相反，我们很多大学却把新生都迁到了新校区。一念之差，就决定了一所大学的实力和发展后劲。

“与发达国家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的差距，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王振耀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高校公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知识生产方式亟待转型

《华夏时报》：现在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王振耀：这个时代跟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用数据来测算这个时代的变化。比如，2012年中国GDP总量为519322亿元，人均GDP达38852元。折合成美元，总的GDP的存量也过了8万亿美元了。如果按照6.3的汇率计算，中国已经超过6000美元！而在2010年，这一数据还仅超过4000美元，这才不到两年的时间。

那什么时候能过1万美元呢？因为人均1万美元就意味着迈入了发达国家的门槛。我想，2016年是不是一个可能呢，或者说是不是一个临界点呢？其实，现在像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已早早地超过1万美元了。可见，经济发展的速度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的设想。

《华夏时报》：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王振耀：当前我国的时代主题就是社会的快速转型，它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发展与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是不一样的，它到了一个大的转折点，时代性质开始变化，我们正在从政治社会化转化为社会政治时代。过去我们常讲很多群体性事件是有敌对分子，而今天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却是因为我们管理不善才造成的。比如说三聚氰胺事件，比如北京接连出现的雾霾天气，这都说明现在社会问题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与此相对应，就会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需求，特别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服务需求正在成倍增长！比如说，老龄化问题怎么办，儿童福利政策如何解决，残疾人权益怎样保障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还填不饱肚子的时候是不可能想到要解决的，现在却都成为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必须解决。可以说，社会的各类要素正在发生着快速的重组并且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生活！

《华夏时报》：这样一个快速的变化，好像我们的社会还不太适应。

王振耀：对。坦率地说，我们整个社会准备不足。我的基本判断是，这种变化给社会带来了两个不适应。

其一，就是知识生产方式严重陈旧。与国外相比，我们还是一种静态的学习与研究方式，其假设的前提是社会不会有大的变化，即社会完全是在一种可控的状态下生活的，这已经完全不适应于设计现代社会多变的需求。因此，我国的这种知识生产方式需要从静态型的记忆标准答案转向动态型的创新型设计，很多知识也要从批判为主转向建设为主。

其二是生活方式陈旧。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以拥有的多与少来追求生活的幸福与否，慈善还没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的社会还不会处理海量的财富，中国处于财富的大禹治水年代。

就是说，到底如何使用财富，我们还不太适应。

高校公益至关重要

《华夏时报》：高校是知识生产的最重要场所，但高校能够产生出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吗？能够实现自我转型吗？

王振耀：这也正是我的思考所在。在高校，其实尊重自己研究自身的基本需求不是一件易事，现在很多领导人在呼吁要改变讲话方式，但在学校里，好多教授的讲话方式比官员还官僚呢。而且教给学生的也大都是标准答案。这怎么行呢？

我们的大学的学习方式要变，理念也要变。比如说，我一再提到，一所高校对大一学生的尊重程度高低就知道这个大学有没有实力。看一所高校是否名牌大学，要看其卫生间里有没有卫生纸。这都牵扯到一所大学的实力，也牵扯到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有没有关注身边最重要的事情？

高校公益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开拓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社会服务方式，能够引领社会大众。你知道，在北师大，有很多德国的高中生在做志愿服务，德国法律规定，男孩必须做一年社会志愿服务，很多女孩不服，于是也来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现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可以说，年轻的学生在相当程度上必然引领中国未来，因为我们都要老，这是由自然定律所决定的。当然，高校公益如果能够将社会服务的使命与知识学习方式的调整较为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华文明！

《华夏时报》：你认为高校公益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振耀：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学习发现社会需求。没有书本标准答案的社会需求，动态的社会需求，很不容易系统地发现，但公益恰恰是必须不断地发现，你不发现，就进步不了。这是知识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型：尊重普通人的需求！

第二，有组织地做善事，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修身养性，开始进行公德建设和公共能力的提升。高校学生从个人做好事到组织做善事，这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他们在开发机制的力量，从而让慈善更有力量。这也是最为上乘的知识：发现体制的力量！

最后是专业服务标准的训练。服务必须建立较为系统的标准，包括开会的标准，讨论的组织，项目的管理等，这都不是依赖以身作则的老办法就能够行得通的，需要应用型的现代知识！这是一种新型的知识学习与生产方式，与中国式的大学课堂有着多方面不同，这是自主性的学习与交流！是一种新的学习文明！

来源：华夏时报

地址：<http://www.chinatimes.cc/pages/127309/moreInfo.htm>

[【返回目录】](#)

张维迎：慈善需要市场的逻辑

《中国慈善家》：你是否赞同“慈善家”这样的称谓？

张维迎：我当然赞同。但慈善家并不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做，只要有爱心和号召力，每个人都有做慈善家的潜质。

《中国慈善家》：在一个成熟社会的构成中，政府是第一部门，企业是第二部门，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是第三部门。但目前中国对于充当减压阀或缓冲带的社会组织依然没有合理放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慈善如何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有力补充？我们如何运用市场经济的力量重建社会？

张维迎：民间的力量只有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社会的，只有政府和个人。而重建一个社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合理的事情都会出现。但我充分相信，如果中国把大量的资源放开，让每个人都能自由竞争，人们不仅会过得更好，而且会有爱心。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企业家高调做慈善的现象，比如陈光标这样的？

张维迎：慈善是一种给别人带来幸福的方式，创造财富和使用财富完全是两回事。做慈善的人一定是能够从慈善中获得快乐才会去做，一个人真正的快乐不是花别人的钱，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让别人花你的钱。所以我相信陈光标也是这样，我不过多评论做慈善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但是为别人带来幸福本身就是值得提倡的，任何人都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把慈善道德化。

《中国慈善家》：你自己比较欣赏哪种做慈善的方式？

张维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更低调的方式。关于慈善，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一个人如果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使再有爱心也是没有用的；其次，慈善本身一定要能够给做慈善的人带来快乐，按照他的意志去做；最后，慈善不是简单的施舍，而要讲究方法，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一定不会过分溺爱孩子。

《中国慈善家》：作为财富的一种分配行为，慈善可否兼具创造财富的功能？你如何看待慈善目标与商业模式的结合？

张维迎：慈善与商业的结合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商业就是为社会做贡献。而慈善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一个再生机制，需要盈利部门和优秀员工，更需要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如福特基金会、诺贝尔奖委员会等机构也正是靠着商业模式在维持。慈善是民间自发的事情，靠政府做慈善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慈善款被征税更是荒唐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在 2012 年度《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中，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等近 10

家国企荣登前100强，中石化更是跻身前五。对此，你认为大量国企的上榜是依赖体制和资源的“红利”，还是凭借市场实力和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在西方国家，由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也会出现一些大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做大，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竞争力，在资源同样多的情况下，占有更多的市场，创造更高的价值。同时，这些大企业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机制，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创造财富的结果。但是在中国就须另当别论。

《中国慈善家》：面对社会舆论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批评甚至讨伐，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最近发表言论为国企打抱不平，认为国企理所应当拥有更大的市场。在类似这样的国企领导人身上，究竟有没有企业家精神的存在？

张维迎：“企业家”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需要企业家，是因为我们对社会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有一批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的人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极强的创新力，并在转变的过程中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不可否认，在国企中也有一些颇具企业家素质的优秀领导人。作为个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肯定会把企业治理得更好，而国企本身效率的提升也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率提升。但这并不能成为捍卫国企的理由，只要国家授予国企一定的特权，民企和国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的。

《中国慈善家》：但也有人高呼“国企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对于这样的观点你又怎么看？

张维迎：我不是太认同这样的观点。“领头羊”企业一定是创造力最强的企业，而创造力则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仅用销售额这样简单的数字为国企辩护是不合理的。还有人说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这种说法问题更大，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家看作家庭，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应该享受机会平等，不应出现论资排辈的情况。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理应更受尊重，采用非竞争性方式塑造出来的所谓“强大”，本身也可理解为对社会财富不公平的分配，甚至掠夺。

《中国慈善家》：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道统理想，与现代企业家精神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或冲突？

张维迎：二者没有矛盾。很多企业家一开始是因为养活不了自己而去做企业的，但把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他们的胸怀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关注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企业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需要他们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更强的社会责任心。

《中国慈善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困境无法仅仅依赖

于奥地利学派或者凯恩斯学派中的某一方，两者的巧妙结合才可产生最佳效果。这究竟是一种审时度势的辩证思维，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中庸观点？

张维迎：我们需要政府，但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由和财产权，只有在保护财产权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运行。另外，政府还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

《中国慈善家》：“市场的逻辑”在财富的社会化环节中是如何运行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机制，保障财富正常的社会化及合理分配？

张维迎：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分配财富的方式。市场经济下，技术进步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费者，市场最重要的财富分配机制就是对财富的消费。市场本身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分配财富的过程，没有自由的竞争，财富分配就不可能完成。

另外，我们需要机会的平等，一个机会平等的市场才是分配财富最好的方式。有人认为市场会带来两极分化，在我看来，公平竞争环境下的市场很难带来两极分化，市场竞争会不断回归，产生新的创造者。一个充分平等的竞争环境可以使人的先天性差距缩小，每个人各尽其才，不会产生单一的财富分配方式。

《中国慈善家》：当今中国，财富占有与分配严重的非均衡化已成为影响社会进步和公平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初步来看，可归结于中国的产权与资本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但这背后显然还有更为深层次的缘由，你认为是什么？

张维迎：中国现在最大的不均衡是由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和控制，以及对企业家精神过强的抑制造成的。慈善事业也是这样的，慈善是一种民间私有财产的力量，只有在自由的体制中才得以出现。

现在的中国慈善业，很多情况下是在“表演”爱心，把慈善业当做一种寻租空间。还有人把钱捐给政府和公安局，这种现象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是不合法的，是畸形和变态的，政府应该保持自身的公正性。

《中国慈善家》：你在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又该如何考核？当前中国企业家普遍缺乏安全感，甚至越富越不安。除了投资增值，如何让他们的财富产生超越货币性的意义，发挥最大的价值？

张维迎：企业需要消费者满意才能够赚钱，而企业只有创新才能让消费者满意，这些都是一种社会责任。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对于中国如今掀起的移民潮，政府是需要反思的。如果政府能给市场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财富自然会来，财富分配也自然会合理。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养活自己，才会过得有尊严。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给人以尊严，使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创

造生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html/view_346.htm

[【返回目录】](#)

◎行业观点

人民日报：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建言）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有法可依

加强制度规范，制定购买目录，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有章可循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明确职责权限，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伙伴关系

建立监督机制，评估购买绩效，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理合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利益主体和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传统政府主导的一元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必须推行社会管理创新，重新厘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和“小政府大社会”，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要。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我国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是此项工作的关键。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完善：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有法可依。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基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的指导意见，确立宏观层面上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职责范围、体制机制等，建议制定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专项规划。此外，完善现行的《政府采购法》，把政府采购的范围扩大到向社会组织购买的公共服务，并针对这一服务的特殊性提出具体的购买原则和标准，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行为有法律依据。

加强制度规范，制定购买目录，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有章可循。规范地方具体的购买行为，研究并制定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标准、种类、性质和范围。目录应突出政府所要购买服务的“公益性”，即非公益性服务一般不纳入购买范围，以确保政府真正履行公共服务职能，防止社会组织在承接服务过程中出现营利化倾向。同

时，建立健全财政程序，规范购买流程，包括招投标、询价、委托等不同方式的操作流程，提高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透明度，增强购买的公信力。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明确职责权限，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伙伴关系。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在厘清政府与社会组织职能的基础上，推动政府职能转型，使政府从具体的管理活动中脱离出来，致力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环境的维护，做好“掌舵而不划桨”的角色。还要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创立多形式、多渠道的政府与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方式，拓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沟通渠道，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

建立监督机制，评估购买绩效，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理合法。力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透明化，充分调动群众、媒体的监督力量，运用电子政务方式，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实时查询和监控平台，并引入第三方监督，防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确保政府购买行为的合法性。量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绩效指标，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效果评估具有可操作性。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签订的购买合同中，细化购买服务的数量、质量和费用标准，并确立量化的参照值，使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估具有可操作性。

来源：人民日报

地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2/0704/c1003-18438150.html>

[【返回目录】](#)

新华日报：社会建设亟需社会政策的创新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是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为此，主要应从研发能力、教育水平、技术引进以及产业支撑几方面来着重推进。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重要部分，其包括以民生为主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健康和社会管理。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报告这一整体思路，可以看到报告不仅仅勾画了中国未来社会的宏图蓝景，也提出了中国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

社会建设政策是政府积极主动干预社会过程、化解影响社会建设的负面因素，预防影响社会发展的风险，提升人民福祉的政策制定过程和实施行动。社会建设政策既包括传统社会政策的内容，

也有诸多创新，如将社会管理的内容纳入政策体系中。社会建设政策具有公平性、主动性和建设性的特征。

中国社会建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建设政策不仅仅包含西方社会政策原有的内容，还有多个创新领域。社会建设政策比社会政策的内容更丰富。国家积极干预和管理社会的方式方法整体性强整合度更高。中国社会建设政策创新发展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路的体现。社会建设政策的创新发展是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路形成的。社会建设政策创新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社会建设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社会建设政策主要目标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建设政策创新发展的具体实施框架包括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健康、社会管理六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建设政策创新发展内容：

(1) 社会建设政策必须突出教育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制定和实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相关政策。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2) 社会建设政策必须体现就业在社会建设中的带头作用，制定和实施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的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

(3) 社会建设政策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收入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制定和实施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4) 社会建设政策必须大力提升社会保障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制定和实施整合型社会保障政策，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

(5) 社会建设政策必须积极倡导健康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制定和实施健康政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健全

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以及巩固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

(6) 社会建设政策必须加强社会管理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制定和实施社会管理政策。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特别是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等。(作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 彭华民)

来源：新华日报

地址：http://theory.gmw.cn/2013-03/19/content_7045017.htm

[【返回目录】](#)

羊城晚报：免费午餐“正能量”背后之困

2011 年 3 月 9 日，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微基金发起人梁树新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看到贵州黔西县中建乡红板小学有 2/3 的孩子因路途遥远和家庭困难吃不上午饭。当日，微基金便发起了“午餐计划”公益行动，随后免费午餐行动便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时隔两年，今年 3 月 9 日，梁树新发微博称，将在黔桂两省再增开 10 多所“午餐计划”学校，筹款压力倍增。与此同时，“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接受《民营经济报》采访时也表示，天逐渐热起来，食品安全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他们将加强“免费午餐”的监督。

一边是巨大的筹款压力，一边是责任重大食品监督，在免费午餐传递“正能量”的背后，他们面临了哪些困境？又该如何走出困境，使更多贫困儿童享用免费午餐？

公众捐款热情下降

自 2011 年 4 月 5 日正式启动至今，“午餐计划”已解决了 5000 多个贫困孩子的午餐问题，资助学校达 26 所（其中包括“乡村童园”项目的 3 个试点学校）。该项目发起人梁树新告诉《民营经济报》记者，截止目前，微基金筹集的善款累计超过 400 万元，其中约有 350 万元左右用于“午餐计划”。他们还将打算再增添一些新的项目，预计资助总人数将达 7000 人，学校覆盖 50 所。

据他介绍，“午餐计划”主要依托于互联网的运营推广，以淘宝为交易平台进行募款。在该项目正式启动前，他便通过网络筹集善款 30 万元，与此同时，开始有人对他的筹款方式表示质疑。为

使“午餐计划”善款公开透明，2011年4月5日，他便与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联合天涯公益一同合作乡村儿童权益“午餐计划”项目。

“最初的困难是来自大家的质疑，不过这一问题很快就得以解决。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梁树新说，在项目启动初期，媒体对这一项目高度关注，出了很多新闻报道，公众参与捐款的热情也比较高。“那时，每天的捐款有10至20万，现在一个月才10来万。”

他表示，从“午餐计划”的筹款曲线图来看，其筹款金额一直在走下坡路。目前，“午餐计划”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升公众对“午餐计划”的关注热情与参与度。虽然筹款金额在下降，好在依然有一批网友在默默地支持他们。

为了方便公众捐款，提高善款金额，他们设立了日捐、月捐、学期捐的捐款方式。此外，他们还通过与企业合作增加项目资金。

梁树新称，接下来，他们还将实施一个“微米”计划，即将实物包装100克每，售价15元一袋的米卖给公众，是一种落地义卖的筹款方式。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公众传递一种新的微公益理念。

组织运营经费吃紧

在正式运作“午餐计划”之前，梁树新与他的团队都依赖于天涯社区与微博做公益宣传，运作方式较为单一。待该项目运作起来，他便总结积累出一套完整的团队运营管理模式。“在此之前，我们运营组织全都是靠志愿者，包括我也是义工，不拿报酬。”梁树新说，现在“午餐计划”已有3名专职人员负责该项目的日常事务，他则帮助团队部署运营战略。

去年7月，梁树新因为个人的本职工作需要，辞去了“微基金”执行主席的职务。他希望，不论他是否参与“微基金”的日常管理实务，该组织都能较好地运作，能够逐渐成长起来。“作为发起人，怎样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的团队；怎样培养一批人来做好这件事，关键在于弄清这份工作是否符合团队成员的价值观。”

据他介绍，微基金的理念是：为价值观工作；组织的定位则是聚焦乡村教育的互联网公益组织，面向农村教育，专注“午餐计划”和“乡村童园”项目运营。随着微基金项目规模的扩大，原本需要7-8个人的团队，目前仅有3人，团队人员急需扩张，但由于运营资金受限，一直无法增加人员。

有业内人士认为，受资金影响，整个社会环境对民间公益组织业化，行业从业人员薪酬的认可相对欠缺，使得民间公益组织没有能力支付起相应的经费雇佣专业人员对团队进行经营管理，阻碍了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

对此，梁树新表示认同：“我认为全职公益应该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我反对完全牺牲个人去做公益，这样不会持久。”此外，他还强调，民间公益组织不缺专业人才，关键在于参与人员是否

与组织的价值观一致，只有一致才能更好地为公益事业服务。

在“午餐计划”运作过程中，一些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对该项目给予了一定帮助与支持，“通过与地方财政配比合作，各出一半，缓解微基金的资金压力，也可以让（‘午餐计划’）这个项目能够可持续发展。”据梁树新介绍，这一合作方式是在2011年下半年开始，具体落实是在2012年上半年。

政府服务采购不足

虽然部分当地政府给予了“午餐计划”一定帮助，但据记者了解，眼下，政府对于慈善组织的扶持和购买服务明显不足，而慈善组织的发展又需要政府支持，这是一个国际通则，大部分国家慈善组织，有40%-60%的经费来自于政府，政府用购买服务或者整比拨款的形式来支持慈善组织发展。

在国外大部分基金会是资助类基金会，在这种机构安排下，民间慈善组织只需要做好服务即可，基金会会为其提供经费支持。而在国内民间慈善组织既要做服务又要筹资，同时，绝大多数民间慈善组织不享受税收减免优惠，使得很多捐赠者也不愿意将经费投向民间慈善组织，给组织项目运作造成很大影响。

梁树新说，他希望政府能再给予他们更多支持，比如购买他们的公益服务，在运营费用方面的给予一定资助，或为他们增添人手等。他们可以接受政府的考核，政府可以每年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评估，若合格，能给他们一点补贴，也算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鼓励。眼下，“午餐计划”的资金全靠“微基金”独自筹款，使该团队感到压力巨大。

针对目前捐款资金缺乏，运营经费吃紧等问题，他希望能与更多的企业建立合作，让企业参与进来，将“午餐计划”做大做强。

食品安全监督棘手

其实，不只梁树新在运营经费上遇到困难。由媒体人邓飞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在“免费午餐”项目运营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些棘手事。

邓飞告诉记者，2011年的2月，他在一次年会上遇到一位来自贵州的小学支教老师，这位老师说她的学生都没有午餐吃，常常在中午用凉水充饥。“我听了以后很震撼，从此萌生了为孩子们建食堂，推动贫困地区免费午餐计划的想法。”

同年3月9日，他便与其他媒体人在微博上发起“免费午餐”活动，倡议社会捐款。短短两个月，不断有人关注“免费午餐”，捐钱捐物，募集善款176万余元，贵州、河南和湖南三地的7所山村学校的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

据悉，自2011年4月2日正式启动至今年2月，“免费午餐”基金募款已超过4300万元，已使200余所学校的学生免于饥饿，享有热腾腾的免费午餐，更直接影响国务院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大规模改变中国乡村儿童营养状况。

2011年10月，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两年来，“免费午餐”帮助解决了2万余贫困学生的午餐问题，期间负责这个项目的团队也遇到一件棘手的问题，“天逐渐热起来，食品安全是棘手的，我们只能加强监督。”邓飞如是说。

考虑到邓飞对免费午餐项目运营经验丰富，教育部“营养改善计划”还邀请邓飞做顾问，在湖南新晃、湖北鹤峰、广西马山、四川美姑、普格等县都与他有过合作普及。“我们人力有限，食品安全方面主要靠学校和当地政府支持”谈到“免费午餐”的运营问题，邓飞表示，“免费午餐”项目的实施，增加了学校工作量，使学校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大部分学校都能坚持下来，家长都很支持，孩子们也得到了图书、衣物等，入学率和出勤率都有增加。”

他说，免费午餐基金已经服务224所学校，虽然食品安全监督是个棘手问题，但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目前还没有发现食物中毒和贪腐现象，“我们会尽力帮助更多孩子免于饥饿，健康成长。”

增值服务有助脱困

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在接受《民营经济报》记者采访时候表示，如何让捐赠人持续捐赠，原本就是一个募款过程中的难点。

目前来看，国内比较成功的公益项目，基本上都是依托事件或者说依靠眼泪指数来进行筹款。这在现阶段的确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模式会面临捐赠者热情下降导致的募款额度下降的调整。对于这个一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肯定需要通过慈善理念的倡导，鼓励更多的人来参与，基数大的情况下，具体公益筹款也就相对容易。

他认为，从项目本身出发的话，有两种解决路劲：其一，是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也就是我们对捐赠人的服务不能简单停留在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等，而是需要有各种项目反馈，包括背后捐赠故事的发掘，志愿者探访，甚至做一些事件营销，从而使得捐赠者从一时兴趣转化长期的关注和持续的卷入。同时，在捐赠渠道上，要建立常态的月捐模式，只要捐赠者不主动停止捐赠，每月都会定期捐赠。“像壹基金，常态的月捐其实就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当然，常态捐赠募款前期成本比较高，但一旦稳定以后成为重要资金来源。

其二，可以从项目营销转为机构营销，就是说通过建立项目的公信力逐渐转化到建立机构公信力。让捐赠者信赖机构，从而使得资金来源更具有可持续性。

他强调，当然，上述两种解决方案都需要项目运作团队或者机构的专业化。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下，可以有三条腿来走路：其一，加强对专业志愿者的使用；其二，使专项募款用于团队和机构建设，包括行政成本支出；其三，逐步提高公众捐款中用于项目管理的比率。只有这三者共同努力，

才能逐步走出当前的困境。单独使用一种都是不可行的。

来源：羊城晚报

地址：http://myjjb.ycwb.com/2013-03/18/content_4376687.htm

[【返回目录】](#)

新华网：“公益创业”成为中国年轻人创业新领域

年仅 22 岁的“90 后”廖熙田是中南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一个偶然的机，让他对“公益创业”充满了热情。

所谓“公益创业”是一种新的创业模式，因为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越来越受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欢迎。

“我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每年放假回到家，总有不少村民来找我帮助他们解决电脑使用的问题。”廖熙田说，当时并不在意的他，后来接触了“公益创业”后，才突然意识到，“帮助农村电脑普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项目。

“一方面，这个项目能帮助解决‘农村电脑普及技术瓶颈’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是大学生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创业的一个很好的市场空白点。”廖熙田说。

在他的发起下，由湖南高校 5 个在校大学生组成的公益创业组织“兴农之翼”团队组建起来。同时，项目也得到了社会人士的认可和支持，取得了一笔可观的启动资金。

湖南醴陵市浦口镇仙石村成为项目的首个实施点。在廖熙田的帮助下，不少村民参加了电脑操作培训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寻求技术帮助。此外，团队还设计整合了村子的无线网络资源，将每户每年上千元的上网费用降低到每月仅 30 元。

上网资费的降低，不仅给村民提供了实惠，更创造了项目的盈利空间，解决了公益创业的自身“造血”问题。这就意味着项目即将开始实现“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

“公益创业”对于当今的中国年轻人已经不再陌生。和一般的商业创业不同，公益创业更强调公益性、社会性、创业的社会利益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创业。前者能带来直接的财富，后者则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

湖南大学中国公益创业研究中心汪忠说，现在，中国各种形式的“公益创业”遍地开花，项目大多由在校或毕业大学生发起，公益创业已经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创业新领域。

“中国目前正处在公益创业的‘黄金期’，既有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需求，又有充足的社会资金和创业市场，可以说前景巨大。”汪忠说。

多年来，中国的公益创业一直面临人才缺失的瓶颈。《2010 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44.8%的公益组织的专职人员在 3 人以下，其中还有 10%并没有专职人员，而专职人员超过 10 人的还不到 2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已经开尝试将公益创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并意在打造“产学研”一体化格局。同时，一些关注公益人才成长的项目不断出现。

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来助推年轻人公益创业的热潮。面对公益创业普遍面临的资金缺乏问题，深圳市政府规定社会组织公益创业可“融资贷款”，并鼓励引入社会资本。另外一些城市则加大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力度，来支持公益创业组织的运营发展。

“在国外，公益创业的全职就业率已经占到了社会的 7%到 8%，而目前中国只有 0.1%。未来 10 年乃至 20 年，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公益创业家，公益创业对大学生来说不仅是全新的道路选择，更代表着新的发展前景。”滴水恩公益创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玄奇说。

来源：新华网

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3/18/c_115066510.htm

[【返回目录】](#)

南都网：志愿者如何与公益组织一起成长？

3 月 8 日-9 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仙湖畔热闹非凡，南海团区委、南海义工联与南方都市报共同组织“首届珠三角义工交流营”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将与珠三角地区义工展开首次交流。包括“免费午餐”发起人，著名媒体人邓飞、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民、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邱建生等公益界知名人士均有参与。

在两天的交流营活动中，来自珠三角的各类组织也相互借鉴发展中的经验，交流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探讨现阶段发展的最佳模式。

陈建民(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责任中国 2012 公益盛典评委)：每一个志愿者都是领袖

当把 NGO 志愿者和政府、企业工作人员相比时，陈建民认为，NGO 志愿者最能塑造人，作为

NGO 的管理人员，想留住人才，必须要让每一个志愿者发挥出“领袖特质”。“每个志愿者从 NGO 的视角看起来都是领袖，其实每个人，当大家进行小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别人一个感觉，每个人都是领袖。”这位在讲台上滔滔不绝、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竟曾是一位腼腆、自卑的少年，正是义工的经历改变了陈建民。

陈建民说，一个人去做公益，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受苦，“以自己的痛苦体验去感受别人的痛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资源可以用，在很多领域，能够把我们生命用起来，这种理解在企业是得不到的。

陈建民还提到，珠三角地区的义工，不能只学香港，不妨到台湾取取经。香港政府每年拨给香港 NGO 做社会服务的经费，是 100 亿港元，而去年和今年，中央财政购买社会服务的经费，是 2 亿元。台湾更看重志愿者，更看重民间的动力，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台湾看一看。

翟雁(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惠泽人志愿服务发展网创始人): 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是一对孪生姐妹

已经从事志愿服务能力建设与行动研究 18 年的翟雁认为，公益真正的资源是社会的人力资源。公益组织应该要职业化、规范化地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开发出来的技术可以解决已发现的社会问题。开发好岗位，“左手牵社区，右手牵个人”。在此过程中，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就如一对孪生的公益姐妹。

她说，每一个 NGO 组织的发起，内在动力都是相同的，即自发的责任和爱心。但过了创始期之后，翟雁更强调志愿者和组织的共同成长。

黄文锋(深圳 NPI 理事长): NGO 如何破解筹款困局

黄文锋认为，转型期的挑战，重点会放到筹款。“接地气”对于一个组织的筹款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组织是否接近地气，资方对它的需求是可以把握到的，如果这个项目可以改变一些东西，而且恰恰是资方需要的话，获得资格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建议每个机构在筹款之前先想清楚：“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自身的团队的能力在哪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到既是我想做的事情，又是我们团队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交叉情况。”

不过，他接触的很多 NGO 在筹款中都碰到了“为了钱而做事”的“使命”和“活命”困局。“使命和活命，才是真正关系到组织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不能活命的时候，离我们的使命会越来越远。”他以自己看的一本书《油麻菜籽》引出对筹款困局的总结：“这书讲的是一个富家的千金嫁给了一个穷人，写了一个中国女性在生活上的挣扎，其实我们在想草根组织生存的状态可能也是像这种状态，当然我们不想像祥林嫂般抱怨，但是生活中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不会妥协，还是有一些办法。我们在筹款的时候，时刻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活命和使命中找到一个出路？”

来源：南都网

地址：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3/18/content_1822829.htm

[【返回目录】](#)

刘选国：中国的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远？

今年初，中国红基会为了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先后走访了福特、盖茨两大基金会的在华办事处和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东亚办事处，通过交流学习，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基金会离这些世界伟大公益组织的距离还十分遥远！

现代公益基金会作为人类财富第三次分配的一种伟大制度创新，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如同公司制度的创新导引工业革命、实现全球财富增长、将世界变成地球村一样，基金会制度的创新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失灵，为人类财富更加公平的分配、为现代公益慈善的繁荣提供了制度基础。

美国二十世纪以来的基金会发展，引领了全球基金会发展、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期间产生了一批伟大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不仅仅被誉为是美国上个世纪社会渐进改良的三大力量之一（见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也是上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减少贫困、促进健康、消弭贫富差距的重要力量，到今天这些基金会还在全球的文明进程和消除贫困、预防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已走过了 31 个年头，这个在国外更多被富人家族、财团所使用的散财制度，最初用于我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吸纳社会资金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用于改进儿童少年、妇女、残疾人福利的基金会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先后成立，直到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出台后，以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捐赠为主的非公募基金会出现，到 2012 年底中国基金会的数量突破 3000 家。在基金会数量增加的同时，一批优秀的基金会开始出现，如中国青基会、扶贫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等引领着中国基金会前行，而主管部门的年检、评估等加强监管措施，基金会行业组织如基金会中心网、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等推出的行业自律行动、透明指数等，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基金会的品质，使其管理水平与国际靠拢。但是比起国际上一些伟大的基金会，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追赶：

首先在基金会的使命、宗旨设计上，中国的基金会不够远大。中国的基金会多以扶贫济困等而下授人以鱼慈善目标为主，而国际上著名基金会的使命更多定位于促进社会进步、消除贫困、自由平等这些人类终极关怀的伟大使命，推动政府政策改良，探寻和消除人类贫困、社会不公的根

源，支持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授人以渔公益项目。

福特基金会的使命是为全世界有创新精神的人和组织提供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其价值观是：我们崇尚人自身的尊严，寻求社会公正。因此其资助的主要领域是：寻求强化民主价值观，减少贫困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提高人类的成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则是本着众生平等的理念，致力于帮助所有人享受健康而高效的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重点是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使她们有机会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在美国则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特别是资源匮乏的人——获得所需机会以取得学业和生活的成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使命更加远大和好记：最初是“促进全人类的安康”，后调整为“在全世界造福人类”。如果你了解该基金会近百年在世界医疗、教育、科学、农业发展等方面的项目成效，了解该基金会上世纪对中国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你会相信该基金会真正践行了其伟大使命。

再看中国一些优秀基金会的宗旨，你能感觉到其间的差距。中国青基会的宗旨是：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宗旨是：扶持贫困社区和人口改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健康条件并提高其素质和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和持续发展。中国红基会的宗旨定位虽较远大：“致力于改善人的生存和发展境况，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促进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但不够凝练和好记。

其次，从基金会实力和可持续发展看，中国基金会与美国基金会的整体和个体实力差距巨大。盖茨基金会 2011 年度财报显示其资产总额为 346 亿美金，年度资助支出和费用总额达到 49 亿多美金，自成立以来累计资助发放总额达到 261 亿美元。福特基金会 2011 年底的资产总额为 103 亿美金，其在中国的年资助总额为 1900 多万美金。据王雯研究美国基金会的文章介绍，2006 年“美国有各类公益基金会 7.2477 万家，总资产达 6147 亿美元”。而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基金会总数达到 2912 家，总资产仅有 604 亿元人民币”。如按现行汇率折算，中国基金会的总资产仅为美国的 1.5%，整体实力差距巨大。

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基金会基本上都是资助型基金，以花钱为主，一般都把投资增值部门与资助部门严格区分，一个团队负责投资理财，一个负责公益资助。投资收益好的年份资助额会提高，差的年份则削减下一财年的资助计划。其运作可持续、可预算。负责开展公益项目的团队由于有充足的财力保障，完全可依据其使命来选择项目，可不像企业那样单一追求利润，也不像政府那样受制于选民倾向和国会，因此在一批有人类进步、社会改良理想的职业人士治理下，这些基金会的确在从事造福人类、改良世界的伟大使命。

中国的公募基金会大多是筹资运作型为主，既要筹资又要实施公益项目，年度筹资计划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软预算，很多公益项目的实施取决于筹资进展。大多基金会的资产总额在百万元级，

亿元级基金会不多，而投资理财由于缺少舆论和政策环境，还刚刚起步，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近年成立的少量非公募基金会虽具有一定实力，如一些大型央企设立的基金会、大学的基金会，但由于捐资机构和捐赠人控制太强，理事会缺少独立性，又缺少专业人才运作，目前还未体现其活力和影响力。

第三，从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准看，中国基金会的管理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福特、盖茨这些基金会已经形成理事会与管理层、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立、管理者与执行者责任明确、项目设立、执行和监督评估体系科学，而中国的公募基金会大多还依附于其主办机构、非公募基金会大多由其出资方控制，职业化还远未形成，管理和项目执行水平都处于初级阶段。

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在华机构均网罗了具有多年非政府组织工作经验、语言和业务素质极佳的职业化团队，其工作目标清晰，运作机制科学，其理事会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有明确的资助目标和精细的经费预算，办事处和每个项目官员的职责明晰，考评机制完备，激励和约束机制健全。盖茨基金会奉行用企业的科学管理做公益的理念，注重项目实施前的评估、过程中的考量、实施结果的评估，让公益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更有效率。走近这些基金会，接触他们的项目官员，你能感觉到一种厚重的文化气场让你肃然起敬。

中国的基金会虽近年来行业发展和管理水准有所提升，一些优秀基金会在管理的科学化上也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治理结构、员工职业化、激励和约束制度建设、绩效考量、公开透明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更不用说还有63%的基金会合规性指标都不合格的那些基金会（据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数据）。

中国基金会离这些伟大基金会差距的确还十分遥远，但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好的苗头：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民财富的增长，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增长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而且开始有数十亿人民币资产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出现，如河仁慈善基金会，还有上百亿捐赠的基金会正在酝酿，加上公益行业的自觉，与国外行业的交流学习，专业人才的培育和成长，中国伟大基金会孕育的土壤正在形成，可以确信：不久的将来，胸怀人类和全球的伟大基金会将在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中出现！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gvzx/201303/3fc37759ee8c48128f1ac1a91c0295f5.shtml>

[【返回目录】](#)

霍庆川：慈善联合会应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典范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3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中国慈善联合会即将成立的消息。中国慈善联合会被定义为慈善组织中的一个联合性的、枢纽性的，能够起到协调、互动、行业自律、行业维权作用的组织，被赋予进一步推动慈善组织发展的期望。

根据经验判断，中国慈善联合会的“预产期”已经临近。虽然现在讨论这个“孩子”该不该出生为时已晚，但孩子还没正式出生之前讨论这个孩子最后的孕育期该如何度过、谁负责分娩这个孩子、是顺产还是剖宫产、应该如何养育（包括谁来抚养、奶粉钱谁出等）、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长大之后承担什么责任等问题，却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

今年两会上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引人注目。方案明确了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安排，主旨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其中特别提及要实现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自主开展活动并且引入竞争机制。

判断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否成功，既要看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范围、步伐、力度是不是真的加大、加快了，更要看作为职能转移对象的“社会组织”的性质和属性。如果作为职能转移对象的“社会组织”与政府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的话，那只是政府将职能从左手转移到右手，从桌子上转移到桌子下。这样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肯定不算成功。

中国慈善联合会还未正式成立，只能根据它父母的容貌、性格、风格，去勾勒和憧憬它的相貌。如果它还是一家由民政部主导成立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它的会长还是由民政部卸任或现任高官担任，它的秘书长还是来自民政部相关司局或与民政部有很深的渊源，国内主要公益机构都要作为会员加入并缴纳会员会费，而它的工作风格和工作思路还是延续政府机构的工作风格和工作思路的话，那么这个组织将不但起不到民政部预想的作用，还可能会对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带来负面作用。但愿我是杞人忧天，误判了中国慈善联合会的相貌，误读了民政部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高发、频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公益慈善事业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将更加巨大。但根据目前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国捐款总额在700亿元左右。中国的人民、社会、政府需要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公益慈善事业，需要独立、透明、专业、高效的公益慈善机构，而需求和现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问题在哪里？

在我看来，对公益慈善行业，政府现在管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该做的没做好，不该做的却做得太多。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责任部门和公益慈善行业的管理部门，应该充分信任民间公益慈善机构，应该充分发挥民间公益慈善机构的主体作用，应该把协调、互动、行业自律、

行业维权的功能交由民间公益慈善机构来实现，应该减少管理，增加服务。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已经获得批准，民政部门应该加大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范围、步伐、力度，将民政部“代孕”的中国慈善联合会在出生之前就交由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去继续孕育。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由民间公益慈善机构去孕育这一联合会的话，可能孕育的周期会比较长，可能妊娠反应比较大，可能这个联合会在刚刚出生的时候比较孱弱，但这些都无关，民间公益慈善机构的基因和出生后进百家门、吃百家饭，会帮助这个孱弱的孩子生长成一个身心都非常健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才能真正肩负起进一步推动慈善组织发展的重任。

（作者系资深公益从业者）

来源：新浪网

地址：<http://news.sina.com.cn/o/2013-03-20/100926586339.shtml>

[【返回目录】](#)

晏和淘：从无根树到有根树，NGO的生存之道

贫穷不是 NGO 的特征

“无根树，花正多，遍地开时碍碍河。难扳折，怎奈何，步步行行龙虎窝。”这是张三丰《无根树》中的两句，他用无根之树来比喻人：凡树有根，方能生发，若无根，必不久长。NGO也是无根之树，因为它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完全依靠别人的“接济”度日。一旦外面的捐助减少，NGO就会面临着灭顶之灾，所以每一次发生稍有规模的经济危机，NGO就要随之大量裁员，很多小的NGO更是哀鸿遍地。那么，“无根树”能不能变成“有根树”，要怎么变成有根树才能够保证有长久的营养来源，增强自身生命力和抵御资金减少所带来的伤害程度？

NGO曾经习惯上被叫做慈善组织，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NGO都把自己叫做发展机构。慈善机构是因“慈”而“善”，很多中国人理解的慈善往往就仅限于捐钱捐物，帮助弱势群体。但是，发展机构的目标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即通过当地的人力资源发展，通过资金设备投入和制度建设提高当地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发展机构既要发展合作伙伴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自身也要不断发展。邓小平提出“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也再次明确贫穷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同

样，NGO并不是只能依靠乞讨度日，贫穷也不是NGO的特征。很多NGO都已经开设了网上商店，或者通过与一些企业的合作来进行产品拍卖以增加机构资金来源，NGO已经过了完全依靠捐赠开展项目的时期，如果不能利用自身的优势拓宽收入渠道，以后的道路将会越走越窄。

NGO当然要增强自身的筹款能力。但是，仅依靠捐款生存和开展项目依然解决不了NGO的问题，随着NGO的快速发展，数量也越来越多，即使是那些世界知名的NGO同样面临着强烈的捐款竞争和压力。要顺利实现NGO的使命和目标，只有先解决生存问题。而NGO只有从无根树变成有根树，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才能持续发展并继续开展项目。除了慈善捐款，NGO增加收入的渠道一般有几个：销售纪念品或特色产品；同企业联合开展社会责任行动；直接提供收费服务。

很多人对NGO提供收费服务持反对态度，他们依然认为NGO是非营利的，是为穷人服务的，所以不能收费。实际上，NGO的主要体现在其收入的用途上，而不是是否收费。只要收入被用于满足机构的使命和目标，针对产品和服务收费丝毫不违背NGO的基本原则。相反，很多免费的行为不但不利于机构目标的实现，还会阻碍机构实现自己的使命。

印度防盲领域的“有根树”

一些公益项目当中，由于机构为当地提供的是免费的服务与产品，当地的受益人反而不珍惜机构提供的设备及产品，因为这些东西是不用任何付出就可以得来的。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对抗可避免失明的公益计划中，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大量的免费白内障手术运动，但是在这一运动得到群众认可后却带来了新的问题：有眼病的患者再也不主动到医院去了，他们只等待免费的手术，他们认为政府总是会来提供免费的手术的，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当地医生没手术可做，医院眼科没收入发展，不但损害了当地眼病预防的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总体上降低了国家防盲的工作能力。

在印度的公益防盲领域中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模式，机构既提供免费服务，也提供收费服务，通过收费服务的资金来帮助穷人。他们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从无根树到有根树的转变：

大量免费服务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

这些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全免费的服务，固定时间到农村进行免费的眼病检查，对于眼睛有疾病的农村患者提供全免费治疗和手术。并且不断扩大范围，从一开始的几个村，逐步扩大到整个邦，同时建立了多家分院以及五十多个医疗服务点，可以持续的为当地贫困患者提供免费及低价服务。他们把这个免费服务的模式推广到了全国以及中国、越南、缅甸等其它众多发展中国家。

提供收费服务增加机构收入。

该机构不断提高医疗水平，不仅为贫困人口服务，有需求的普通人群甚至有钱人也可以按照正常价格享受医疗服务。开始的时候，他们服务的人口免费服务人群占到80%多，但是随着他们的服务能力越来越强，无论是免费患者还是收费患者数量都大大增加，目前免费患者已经下降到百分之

40%左右。而机构也有了更多的资金在农村地区开设更多医疗服务中心，扩大了为贫困患者服务的能力。

人力资源管理上有着独特的方法。

他们很少到社会上直接招聘，大部分人员都自己培养。在一般工作人员的招聘上他们有几个原则：

收农村青年。对应聘者进行家访，从邻居或者熟人处了解此人性格是否吻合，对人是否友善；

对招聘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培训时间长达一到两年；

严格执行科学的业绩考核和监管，如果员工收入远高于当地水平；

在市场开发上，奉行的原则是主动寻找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坐等他们上门。

在印度，防盲机构都有着强大的社区服务团队，每周都有两个组轮流去不同的村庄组织筛查。每年初，他们都要根据当地的地图及人口数据制定详细的筛查计划，选定工作区域，根据一年的重要节日，季节来安排筛查活动。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工作目标，年工作目标、周工作目标、日工作目标、按地图一个村一个村的去组织筛查。他们还在当地农村聘请了专职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去查视力，寻找患者。每次筛查都经过周密的组织和策划，同当地社区合作，提前十多天在社区进行宣传，由当地社区组织患者，定时定点长期大量的在社区进行免费筛查（并且为穷人提供一顿免费午餐以及从村子到医院的免费接送）。

除了开展免费的医疗服务，收费服务可谓无所不包。

他们针对普通患者提供正常收费的眼科手术和治疗，收费的验光配镜服务。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培训学员，提供包括眼科培训和管理培训等内容的收费培训、收费的出版物。同大学合作开发的各类眼科服务和管理软件。他们甚至邀请本地的小贩在机构的培训中心内摆摊卖纪念品。

最大限度的同一切资源进行合作。

不仅是政府和社区，其它机构也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他们不仅为其他机构提供专业培训，管理咨询，资源共享等多种合作。最大限度的帮助贫困人口。他们同企业合作发展项目，即为企业提供品牌和宣传，他们对企业捐赠的资金没有具体限制，企业可以是资金，也可以是人力投入，这样有助于长远建立同企业的关系，并且也提高了机构为患者提供服务的能力。

就是通过这种抓大不放小的筹资渠道，该机构目前的收入已经完全能够负担为贫困患者服务的费用，全部收入扣除成本以后还有40%左右的盈余，可以支持机构不断扩大服务范围。

多渠道的筹款

国内的大部分NGO依然是无根树，即使是那些有政府支持的大型NGO在面对一些社会变革和突发事件的时候也无能为力，也依然有很多机构把自己定位为“慈善机构”，在为更多的捐款苦苦发

愁。相反，很多本地的 NGO 却已经先行一步，开始了多渠道的筹款工作。很多机构都开始出售本机构或者受益人的产品或者纪念品。但这还不算有根，因为这些收入对于机构的运营和项目发展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目前在中国更为可行的方法是拓宽同企业合作的渠道。不要总是在乎企业资金的投入，而是要让企业投身公益成为一个习惯。现在很多的银行、保险公司、电信公司、健康产品商店……他们都是我们潜在的合作伙伴，都有专门的公共关系或者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他们也有自己的公益计划和投资，如果基金会能找到合适的结合点，他们必然会成为机构的强大资源库。

但是在和企业合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机构的原则和定位。不能为了经济收入而一味迎合企业。我们要记住，机构增加收入的目的是为了为受益人群服务，筹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项目，而开展项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机构收入，要始终记住机构的使命，不要把增加收入当成最终目的。

没有自己的收入渠道，NGO 接受别的机构捐款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大量的文字工作与各种报告当中，疲于应付捐款人的检查及各种任务，如果可以抛开机构捐款人，则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把项目做得更好。

现在国内的大部分 NGO 服务能力和营销水平还不够，直接提供收费服务的可能性还比较小，但是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只有这个才是可以长期持续为 NGO 发展提供养分的根，如果这个根长不出来，NGO 就永远是无根树，随时可能会枯萎。

晏和淘（弗雷德·霍洛基金会中国项目官员）

来源：社会创业家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dcef4b0101g4pt.html

[【返回目录】](#)

姚遥：个人自愿捐赠的才是慈善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 2 月 27 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慈善立法势在必行，现在《慈善法律纲要》已经出来了：即每个人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钱做慈善。正在征求意见，如果顺利的话，很快就将完成慈善立法。

推进全社会参与慈善事业，本是一个好事，不过通过征收慈善税不仅无法促进慈善，还会阻碍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个事与愿违的意见不能成为法律。政府征税建设社会保障系统，和民间行善扶

贫济困，是各司其责，发挥各自的长处全面地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把一切个体的创造力都用行政系统管理起来，而随意加税，不仅不是着眼于解决问题，更是制造新的社会矛盾。

“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引来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可见税收兹事体大，有了代表，也不能轻易加税。而慈善，本身是从个体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出发而诞生的私事，和集中全国人民力量办大事的政府管的是两摊事，也是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全面覆盖社会各个角落的有力补充，因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捐给上帝分配的慈善和交给政府完成的救助是互为补充的两条脉络。两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并行不悖，但也泾渭分明，个人自愿捐赠的才是慈善，通过立法从每个人征税的是政府行为。

我国个人税负已经不轻了，尤其是工薪阶层承受的税负。这部分税收交给了国家，就是每一个纳税人让渡的部分权利，国家用这笔钱建设社会，提高全社会的福祉，促进所有人的平等发展。很遗憾，现在税负不低的情况下，教育、医疗、养老三大发展和社会保障网都还有着不小的问题，在这个局面下，继续从个人的工资中规定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慈善，相当于变相加税，激化了当前的矛盾。

即便在税收之外，单列一个名义叫慈善费，也改变不了这笔资金实质为慈善税的本质。而将一个自愿捐给慈善机构的行为，收编入政府强制征收行为之中，更是完全违背了慈善的本质，也改变了民间慈善与政府救助互为补充的稳定架构。征收慈善税的行为，只是变相将民间慈善国有化而已。即便政府未来愿意将通过法律征收的慈善税再次发放给民间慈善组织，但是现有民间慈善依赖的是民间的信任机制，而不是国家财政的二次分配划拨；现有民间慈善是对捐款人直接负责，而不是向政府善款管理机构汇报；现有民间慈善是根据民间需求而产生的灵活机动的市场，不是政府能够依靠计划宏观调控的社会角落。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凯撒拿走了上帝的税，是办不好上帝的事情的。

因此，既然周代表无意中透露了或许政府要通过立法来征收慈善税，那我也就旗帜鲜明地代表我自己，反对通过慈善法，从每个人的工资中扣除钱用于慈善。捐与不捐的权利，要永远把握在我自己手中。

作者系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

来源：南都网

地址：<http://nandu.oeeee.com/nis/201303/18/25478.html>

[【返回目录】](#)

杨澜：“做慈善，我是尝到甜头啦”

中国慈善需要职业经理人

《中国慈善家》：你当年留学美国期间，对国外的公益慈善氛围感受如何？对比中国的慈善状况，会不会特别惊讶？

杨澜：海外经历对我很有参考价值。我发现海外的慈善机构多如牛毛，从资助医学研究和科学开发到研究疾病治疗，非常多元。与之相比，国内的差距很大。首先是种类的差距太大。中国成规模的基金会非常少，援救助的对象和慈善项目的种类也少。另外，募款的方式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募款方式。第三是跟捐助者的沟通不够及时。

《中国慈善家》：国内慈善机构的反馈很少。

杨澜：对。国外的回馈特别及时。我在美国上研究生的时候，曾捐款给一个救助非洲儿童的慈善机构，之后就经常收到他们的回馈，比如他们在非洲的哪个国家的哪个村庄建立了一个小学等等，还配有照片和图片，让你觉得自己的捐助产生了效果。而国内通常是捐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

《中国慈善家》：在具体的理念、机制方面，有没有类似感触？

杨澜：在国外，做慈善也可以有职业规划和收入，这是我过去没想到的。以前我觉得做慈善就是义务性的，所以，有些慈善晚会请我做主持，我总是觉得应该无偿参与。但我惊讶地发现，美国有很多终身专职做慈善的人，他们以此养家糊口，并将之当做一个非常自豪的职业。

我觉得，中国慈善需要职业经理人。比如我们的阳光文化基金也有专业的基金和慈善项目管理者，我要求他们有商业社会的成功经验，这样才有效率，对效果的评估意识才更强。当然也要付给他们一定的工资，虽然不如商业机构那么高。这些都是我在理念上的触动。

《中国慈善家》：如果不拿工资的话，这些帮助别人的人可能三年之后，同样沦为被救助的对象了，因为不可持续！

杨澜：对。而且不拿钱的时候，通常就不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么认真负责。这是人性的自然反应。所以，慈善事业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应该注重培养职业经理人。

创新地去做事，就一定会有非议

《中国慈善家》：你14年的慈善之路上，是否有过伤心、生气或者气馁的时候？

杨澜：没有。这14年中，通过做慈善，我认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当你怀着一颗诚恳的心做慈善，就会交到很多真心朋友。我跟这些朋友的友谊基础非常纯粹，所以，这种朋友才做得长，不会有利益冲突。

比如做环保的奚志农，比如徐永光，比如红十字会的郭长江、王汝鹏。跟这些人在一起，友谊

特别长久，彼此的尊重和欣赏也很长久。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做慈善，往往会遭到质疑，甚至是诛心之论。上期杂志中我们梳理了中国慈善“十大年度人物”，你好像是里面为数不多的没有遭受过质疑的。

杨澜：是吗？我还算幸运，大家都比较信任我。其实我也有过受质疑的时候，比如我们决定拿出自己公司一半的股权来做慈善基金时，就有人说，这股权怎么能做呢？好像必须要现金才能做慈善一样。实际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是以股权作为慈善基金会的捐资。现在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已经比较全面了。但2005年我刚做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能接受。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杨澜：我认为，只要创新地去做事，就一定会遭到非议，但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像永光在2003、2004年就受到过很大的压力，曹德旺先生也一样，都是做了好事却遭到非议。我的经验是：不必愤愤不平，也不必急于表白，其实不用太长时间，也许只有几年，随着社会公众的认识程度的提升，时间将会检验出一个人是否真心在做事。

《中国慈善家》：可能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杨澜：还有就是，做比较理性、可持续的慈善基础的建造和打造时，就不如救灾和扶贫之类的事情受关注度高，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度就会有点不够。有时当我在筹款的时候，人家就会问：啊，你怎么没去扛麻袋啊？没有到哪儿去发放水啊，粮食啊？因为大家对于慈善的理解还停留在救灾的层面，对于那些比较理性、可持续的机构的支持，以及环境的建设，大家的理解度就不高。

所以，从社会资源的凝聚力来说，一开始我会觉得挺难，主要靠自己的身份来维持和做这些慈善项目。但慢慢地，特别是随着“巴比晚宴”的举行，整个社会对慈善的认识深了一层，大家考虑的，不再仅仅是捐不捐的问题，而是捐给谁和怎么捐的问题。我认为，这反映出社会和大众的认识都逐渐开始趋于理性。

没有什么事比它更值

《中国慈善家》：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你，用14年时间，投入这么多精力去做慈善？毕竟你不是职业慈善从业人员。

杨澜：我觉得我是尝到甜头啦。所谓的成功和财富，无非是大家的个人价值需要得到承认。对我来说，做慈善也是使个人价值得到承认的一种方式，这种承认感令人很快乐。一个人不需要多么高尚地做慈善，真正爱自己的人也会爱别人，因为你在其中得到了一种价值的肯定。

《中国慈善家》：尝到甜头啦！有具体的事例吗？

杨澜：比如我们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先生从报纸上看到一对下岗夫妇的孩子缺少几千块钱学费，就代表我俩送去了两万块钱。后来我也去看过这个下岗女工。听说我刚刚做了妈妈，她就用

市场上最常见但质量很好的蓝色毛线，给我的婴儿织了小衣服和小裤子，还很贴心地把小裤子做成开裆裤。由此我感觉，慈善绝不是施舍或给予，而是一种双向的、心和心的平等沟通。

在这之后，我还把第一笔稿费，大概30万左右，捐给了希望工程。还有一次捐款，上海团市委想搞一个捐赠仪式，让这些孩子们从我手里领奖学金。我跟我先生商量以后，拒绝了这种方式，因为感觉这种方式可能会让孩子产生一种不好的感受，最后还是直接把钱给了孩子们的家庭。

其实，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价值。也许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因为你做的一点点事情而让一个生命重新有了生活的勇气更让人满足的了，这种满足感不是能用节目收视率去衡量比较的。

《中国慈善家》：你在传媒界、商界、公益界同时做这么多事情，你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特别忙。你在事业、家庭、公益之间是怎样协调的？这可能是那么多粉丝最佩服你的一点。

杨澜：这其实并不难。刚开始我常常帮助慈善基金会做事。成立了自己的专项基金之后，我特别看重聘请专业的管理人。现在我们公司的管理人，一方面由公司的员工担任，另外我也邀请了哥大的校友，他们是专门学公益管理的，比如高广深老师。他们做慈善有理论、有实践、有爱心，我特别放心。

“巴比晚宴”的诞生源于信任

《中国慈善家》：关于“巴比晚宴”的缘起，外界一直语焉不详，只有请你亲自道出原委了。

杨澜：2009年，我和比尔·盖茨先生吃过一顿晚饭，相互交流了一下彼此做慈善的理念。我告诉他我在做中国的公益管理者教育，开展对慈善家的培训，他很感兴趣，后来他的基金会开始跟我不断沟通，相互了解，最后决定将我们作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举办“巴比晚宴”。

《中国慈善家》：当时没有想到会产生这么巨大的社会影响吧？

杨澜：我一开始就告诉比尔·盖茨先生，在中国做慈善不是简单的捐赠承诺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捐赠的环境和运作机构的效率。美国和欧洲都已经有了非常完备的社会机构和体系，能很好地使用善款，而在中国，懂得有效使用善款的机构不多。所以，如果达不到很好的社会效益，还不如让资金留在企业里，这样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巴菲特先生很同意我的分析，所以我们没把基调定在怎样认捐，而是探讨怎样把慈善做得更好。

这是我想坚持做下去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你近几年的“两会”提案都与慈善公益有关，2011年的提案会是什么？

杨澜：我还没想好，所以不敢乱说。应该和民生问题相关吧。（注：本文采访时间为1月26日）

《中国慈善家》：希望看到更多促进民生的“阳光”提案。我们关注到你去年的提案跟青少年成长有关。

杨澜：对。而且我们直接操作的具体慈善项目，就是“阳光下成长”，主要是给缺少教育机会的青少年提供艺术教育。艺术是一种非常好的启迪心灵、疏导青少年情感表达、建立尊严和自信的方法。过去我们比较看重给孩子们提供基础教育，但艺术教育普遍缺乏，贫困地区的孩子往往就更缺这方面的修养。其实这是一个眼界问题，就像世博会，孩子们看到了一些东西，他们的小脑瓜里肯定会产生一些想象，对他们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从 2007 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做“阳光下成长”。

2010 年，我们刚刚做了慈善晚宴、慈善舞会，巴菲特先生也给我们发来视频，筹到了 1300 多万的款项。通过这些活动，大家对于慈善的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的认识更加具体了。很多艺人和歌唱家，比如郝蕾、濮存昕、戴玉强和吕薇等，事后都给我发短信表示非常乐意做志愿者，我挺感动。

《中国慈善家》：你未来的慈善行动应该是以你的基金会为依托了，那阳光文化基金会未来有怎样的规划？

杨澜：实际上我们现在有点双轨制。一方面香港的基金会继续在运作，每年接受香港政府的督察和审核；另一方面，在内地我们和红基会合作，具备筹款的资格，同时也在红基会的监督和管理之下。

我们有个最大特点：我们的项目都会邀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比如清华大学和北师大这样的专业学术机构。我们觉得过去做慈善有点儿稀里糊涂，糊里糊涂地捐，糊里糊涂地用，缺乏效果评估。比如我们在一些乡村建了一些学校，但由于生源的流失，学校最后变成了养猪场。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开展项目时，会拿出一部分经费请专业的机构进行第三方的跟踪评估。

《中国慈善家》：今后会更重视慈善机制的建设？

杨澜：我觉得，这种慈善机制和行为方式的建立，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很有好处。比如，一些孩子接受艺术教育之后，到底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有没有效果？还有就是，在接受慈善培训之后，机构管理和治理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自己进行反省，然后推动慈善行业发展。这是我想坚持做下去的事情。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html/view_335.htm

[【返回目录】](#)

◎行业动态

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区发布会在京举办

3 月 15 日，北京--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于今天在全球同步发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京举行该报告的中国区发布会。由联合国编写的人类发展报告是记录全球人类发展进程的年鉴，报告包含大量翔实数据，其中，人类发展指数对包括经济指标在内的一系列人类发展指标进行了全面考量。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黛琳女士向到场媒体介绍了该报告。出席发布会的嘉宾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白桦先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主任李文博士。

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史无前例的发展进程及其为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根据该报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摆脱贫困，预计到 2030 年，超过 80% 的中产阶级人口将生活在南方国家，其中三分之二的新增中产阶级来自亚太地区。三大领先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产出将在十年之内超过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这六个传统北方工业强国的总产出。

南方的崛起之势和其对全球关系动态造成的深刻变化不容小觑。该报告还就世界如何应对人口结构重组和如何使这些变化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提出一系列问题。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黛琳女士在该报告的北京发布会上表示：“推动全球发展的这些新兴力量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减轻贫困并增加人民福祉，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每个国家都能从中学习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方式途径，并使社会更具韧性与应对能力。”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地址：

<http://ch.undp.org.cn/modules.php?op=modload&name=News&file=article&catid=14&topic=11&sid=5236&mode=thread&order=0&thold=0>

[【返回目录】](#)

《中国非营利组织法专家建议稿》出版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于 2013 年 1 月出版了《中国非营利组织法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自 1998 年成立以来,一直以非营利组织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研究为核心,深入研究和挖掘社会法、非营利组织法和慈善法的基础理论,梳理非营利组织法及相关法律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和脉络,比较研究各国慈善法与非营利组织法并以制定一部统一的《中国非营利组织法》作为主要目标。经过了十多年的认真研究,该中心终于出版了《中国非营利组织法专家建议稿》。

《建议稿》以我国非营利领域的基本法与组织法为定位,是一部确定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以及相关监管原则的综合性法律。其基本的目的是保护公民的结社自由,促进非营利事业的规范发展,促进社会建设以及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自由、规范的社会环境。

《建议稿》的主要内容包括非营利组织法的基本原则、非营利组织的设立、组织机构、变更与终止、财产、财务与会计、非法人社团、外国非营利法人的分支机构、非营利组织的监管与法律责任等方面。

中国非营利法律制度建设,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话语,是中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建议稿》仅仅是从学者的视角提出的一种选择,提供的仅是最基础的知识资源,是一种倡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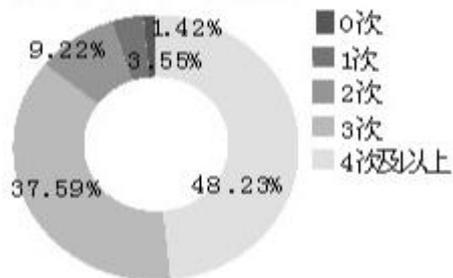
来源: 中国社会组织网

地址: <http://www.chinanpo.gov.cn/1938/62285/index.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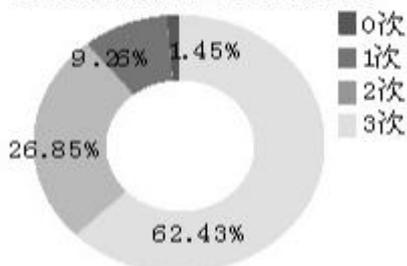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才现状调查报告》在珠海发布

民非：过去3年晋升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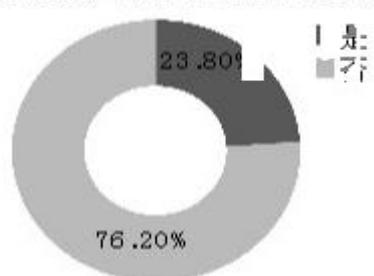
基金会：过去3年晋升的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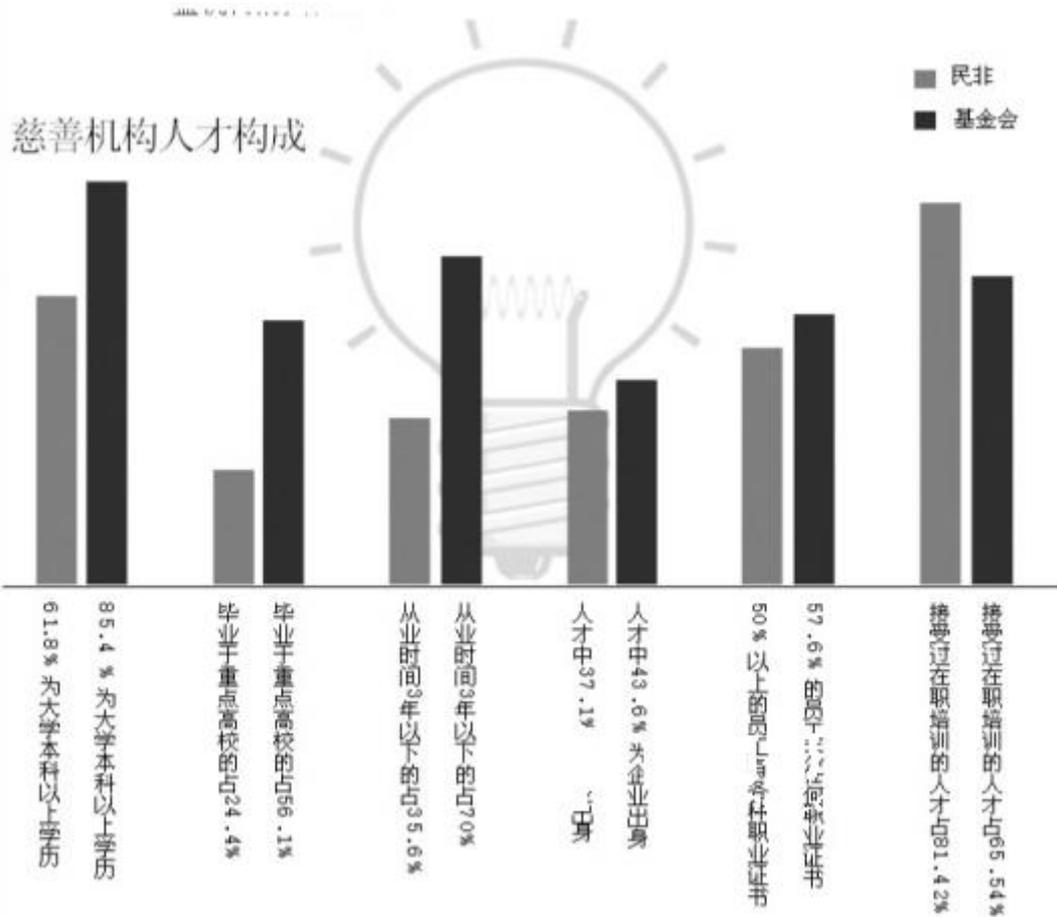


民非：未来1-2年是否有离职打算？



基金会：未来1-2年是否有离职打算？





“晋身空间狭小是阻碍公益人才成长的最关键因素”。18 日，记者从北师大珠海分校举办《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才现状调查报告》发布暨中国公益慈善专业人才培养高层论坛获悉，目前中国各类基金会公益人才缺乏。

论坛现场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才现状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晋身空间狭小是阻碍公益人才成长的最关键因素；价值认同、工作经验和外部交流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公益人才专业度提升的三种方式；公益人才满意度呈区域差异；公益人才整体职业满意度高于公务员和私营部门；公益人才职业队伍基本稳定，未来 2 年内有离职意愿的公益人才不到两成。

该份《报告》由清华大学 NGO 所进行全行业范围的专业人才现状调查，全文 4 万多字，内容涵盖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状况、公益组织管理人才胜任力研究、公益人才职业满意度的跨地区比较等方面。

据调查，当前中国各基金会公益人才的“专业从业经验非常不足”，基金会员工中工作经验在 3 年以下的占了近 70% 比例，工作经验在 10 年以上的仅占比例 3.7%。

北师大珠海分校副校长、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副理事长吴忠魁表示，这组数据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时间历程相吻合。据其透露，该校去年 5 月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合

作成立中国首个高校慈善专业人才培养机构，面向国内的公益慈善组织和机构实行订单式人才培养，目前已有三十多名学生选择了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

清华大学 NGO 所所长王名教授认为，这份《报告》反映了人才供求、发展趋势、政策解读等备受关注的内容，对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以及社会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次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清华大学 NGO 所、基金会中心网共同主办，北师大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承办目的是探讨公益慈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与途径，促进尚处在萌芽阶段的中国公益慈善专业人才培养领域健康发展。

来源：广东新闻网

地址：<http://www.gd.chinanews.com/2013/2013-03-19/2/237752.shtml>

[【返回目录】](#)

《贫困地区小学生缺鞋状况调查报告》正式发布：天真遭“无鞋”之苦 公益模式亟待创新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公域合力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贫困地区小学生缺鞋状况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2013年3月20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公域合力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贫困地区小学生缺鞋状况调查报告》【暂名】（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细分性强、针对性强、专业性强”的特点，在国内公益领域开创了先河，有望为中国公益模式的创新提供重要思考启迪。

同时，该报告的出台也被业内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尝试，被看作是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精细化、专业化的发端，填补了相关方面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公益事业走上专业化之路，采用更科学的运作、管理模式，以及有效解决“供方”、“需方”的信息和物资相匹配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

公益窘境亟待破题

长期以来，国内的公益慈善捐赠存在着“不问所需，我有啥我捐啥”的现象。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很多迫切需要得到援助的贫困地区的人们，往往一下子收到很多本根本用不完的字典，收到很多不合身的衣服、不合脚的鞋子……通过“报告”，我们也了解到这样一种无奈的现实：N县受访

的两所村小的小学生们获得的少量鞋类捐赠，捐赠者直接将鞋子寄到学校，由学校安排发放。该村小的校长谈到此事时说说，“去年（2012年）收到过一批鞋子，我们看情况就发下去了，有的孩子给了2-3双，有的一双都没有，因为没有适合他的尺码的鞋子”，甚至“（以前）曾经有小学生领到的鞋子是40多码的，根本没法穿”。

长期以来，全社会整体的捐赠量十分可观。但很多慈善捐助往往停留在“一次性、运动式”的模式上，灾情来了，你捐、我捐、企业捐、个人捐……不可否认，这些集中捐赠解决了困难群体的燃眉之急，但更广大的因病返贫、因灾返贫的贫困人口在那之后的长期生活里却得不到足够的帮助、有针对性的帮助。另外比起定向、定点、定人的专项捐助，这种“项目筹措”式的捐助，一方面体现了我国民众的公益心，但另一方面，随着新闻话题不再具有热度，民众的关注也就很快减弱甚至消失。全社会“一次性”地把热情投入进去，进行了一次性的捐助后，对接下来进一步的救助需求，往往就没有下文。再加上国内很多公益组织在运作方面欠缺科学的经验，捐赠物资分配不均、不科学的现象也偶有发生。

而由于贫困人口聚居的地理位置通常较偏远，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便等诸多客观因素，爱心企业或爱心人士个人往往既没有精力、物力和人力去做针对性的先期调查，也就无法确知待捐助的人群的具体需求，进而整个社会也就无法做到“缺啥捐啥，按需而捐”。

种种窘境，敦促公益领域——甚至催促全社会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模式，既能解决需要帮助的群体的具体需求，又能让全社会的公益资源、慈善物资得到最高效、最大化的利用？

先期调研或是良策

根据《贫困地区小学生缺鞋状况调查报告》【暂名】的实地调查，贫困地区仍有大量的儿童缺鞋穿，“两年只有一双鞋、与兄弟姐妹合穿一双鞋、鞋穿得实在无法穿了才能有新鞋”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要给孩子们捐鞋，应该怎么捐？这里面可能就涉及诸多琐细、但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每个孩子鞋子的尺码是多少；长年在山里行走，他们平均多久就需要换一双鞋；正在成长期的他们，多久需要换一双更大的、具体多大尺码的鞋……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有针对性的按需而捐就是一句空谈。而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在启动捐助之前“先问所需”——做针对性的需求调研、调查工作。

前端的问题解决了，后续的捐赠才能、就能顺理成章，同时也容易形成全社会的持续性捐助。

公益慈善更需精细与专业

既然仍有为数众多的贫困地区的孩子的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那么是全社会做得不够多？还是做得不到位？

答案或许正是，公益慈善需要做得更精细、更专业、更具针对性。

据《2012 慈善蓝皮书》显示，中国捐赠总量虽已达亿万级，但在多个领域的捐赠结构中仍存在失衡问题，许多需要得到社会资源的领域获捐数量严重不足。比如我国全国服装鞋帽捐赠就缺乏统计数据。据《2011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1 年全国款物捐赠总额达 845 亿元，其中物资捐赠总价值 159 亿元，物资捐赠主要领域为教育和扶贫，而围绕鞋、帽、衣、袜的捐赠则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本次“报告”还对我们起到了另一个提示作用：在我们的捐款额不断攀高的今天，仍有很多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儿童亟待得到帮助。这些艰难生存在社会关注之外的儿童，由于长期没有得到关注，于是便被社会“集体无意识”地忽略。这说明如果慈善行为没有最终落实，再多的钱物也起不到大的效用。

公益慈善应该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爱心付出，相比“一掷千金”，慈善捐助需要的是可持续的“精细化、专业化、针对化”创新流程。在捐助之前，是否能够出现更多的“先期调研报告”，不再是“一次性的、不问所需”式的捐助，而是“先问所需”，做好先期调研、调查，进而后续确保受助人得到真正所需的关爱。这样的公益，才是物尽其用的公益。这样的慈善，才是人人参与的慈善。

来源：搜狐网

地址：<http://roll.sohu.com/20130321/n369744977.shtml>

[【返回目录】](#)

支付宝发布数据显示,2012 年网络公益捐赠同比 2011 年增长 70%, 67%善款选择捐给助学求医

尽管一些公益组织遭遇了公信力危机，但在互联网上，人们并没有丧失对公益的热情和信任。恰恰相反，通过互联网信息与支付技术融合，在一个更便捷透明的公益捐赠环境下，人们对待公益的态度和行为变得更加成熟和有效。

国内最大的网上支付平台支付宝日前发布的网络公益数据显示：2012 年网络公益捐赠同比 2011 年增长 70%，网名单笔网络捐赠额超过 53.7 元。而在各项公益求助中，教育、医疗最受网民关注，67%的善款定向选择捐给助学和求医。

300 多家公益机构“触网”

公益事业，不在于一个人做了很多，而在于大家参与一起出力。支付宝表示，2012 年网络公益捐赠额比 2011 年增长了 70%，捐赠总金额超过 3510 万元，显示网民对网络公益捐款积极性越来越高。

与传统的公益捐款形式相比，网络公益捐款主要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捐款渠道，由于便捷、安全性等优势，且整个捐献流程开放透明，于是日益受到网民认可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捐款方式。

支付宝方面表示，一直以来，包括支付宝在内的网上支付渠道对所有网上爱心捐赠均采取零手续费政策，1 分钱都可以献爱心，这为更多人参与网上公益提供了可能。

据悉，除了网民外，社会公益组织 2012 年参与网络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截至 2012 年年底，包括希望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壹基金等 300 多家企业、公益机构都面向社会推出了网络公益捐献服务，数量比 2011 年增加了 52%，公益服务范畴涵盖了教育、医疗、环保、扶贫等各个领域。

目前，社会公益组织与第三方支付已形成开放式的公益生态圈：第三方支付为社会提供开放捐款平台，平台把公益组织、被救助人和捐献人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公益生态。用户不仅可以查实自己的捐赠记录，公益项目的已募善款、参与捐赠人数以及善款的去向都可第一时间了解、监督，确保善款可在一个完全透明的环境中顺畅进行，并输送到需要帮助的人群里去。

广东网友捐款全国第三

从地区捐款额来看，上海网民捐助金额占到全国的 17%，排在上海后面的是北京和广东，网上捐款的全国占比分别是 12.8%和 10.9%，而紧跟其后的是浙江、江苏，分别为 8.6%和 8.1%。

支付宝方面介绍，2012 年广东网民在网上的爱心捐赠接近 10 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也体现了广东网民对网络公益捐赠的信任和支持。

逐步向理性参与公益转化

中国网民最希望首先帮助解决哪些社会问题？答案是医疗和教育。

2012 年，网民将 67%善款都捐给了助学、求医的公益项目，这两个类别分别占善款总额的 33.9%和 33.1%，反映出医疗、教育仍然是现阶段最受国民关注的两大话题。

此外，2012 年，二次及二次以上捐赠用户数，相较于 2011 年增长了 12.5%，这显示网民参与公益开始从基于突发情感的非理性参与逐步向理性参与转化。

来源：南方日报

地址：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3/19/content_7174335.htm

[【返回目录】](#)

一份环保提案背后的公益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万捷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实施重点污染源信息公开提案》。这份提案背后，是众多环境公益人士和机构的努力。

万捷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这份提案源于2月底的亚布力论坛，企业家们在讨论环境问题，认为环境信息公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

万捷希望为公众广泛参与环境保护监督工作代言，希望能为公众争取一个改变当下环境的权利。

污染信息搜集的民间志愿者

公众的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知情才有行动。

如果毛建伟不是亲眼见到一些企业的排污口涌出的污水，他可能仍不会对环境污染采取行动。

毛建伟只是众多环境志愿者中的一员，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搜集环境污染信息，这些信息成为后来环保组织绘出的中国污染源地图的基础信息，而这个地图，是万捷提案最重要的证据支撑。

毛建伟是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的一位个体户，距湘江不到600米。

以前，湘江边上的人喜欢下江游泳，但现在游泳的人一上来就浑身刺痒，皮肤上挂着油污。

湘江水“脏”了，但没人告诉毛建伟，湘江到底是怎么“脏”的？

2008年底，成为湘潭市环保协会志愿者的毛建伟加入了绿色潇湘守望湘江的公益项目，他决心自己寻找答案。

第一次看到企业排污口时，毛建伟震惊了。

他看到污水正从一个混合排污口中涌出，大量的泡沫漂浮在水面上。

毛建伟取了污水，送到专业检测部门，结果是重金属镉超标。

而距此地几百米就是湘江，毛建伟和住在附近的人的饮水就取自这条江，工业污水正威胁着饮水安全。

湘江有多少这样的污染源？地方环保部门网站上的信息少之又少。

毛建伟决定沿江考察，自己动手定位排污口，监督企业的违规排污。

暗访企业违规排污并不容易。一方面，一些企业会千方百计地埋设暗管，将排污口放在距离企业几公里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环保执法部门无法获取确凿证据，而对违规排污工厂束手无策。

为了取证，毛建伟曾和其他志愿者24小时监测一家疑似违规排污的工厂，用摄像机拍下整个过程，并向相关部门举报。

这样的方式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湘潭市内，已经有超过30余家污染源被定位，湖南省有两三百家左右”，毛建伟说。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自2011年起，湘潭市的很多企业排污口都竖起了公告牌，上面写明了排污口的归属、污水含有的重金属元素等重要信息。

毛建伟将改变归功于知情，“公众的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知情才会行动，行动会带来改变。”

地方政府拒公开污染企业名录

在环境监管较弱地区，污染企业能为当地政府创造利税。当公开环境信息影响该企业发展时，环保部门会遭到上级干预，停止公开信息的行为。

自2008年起，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推出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测评，希望借此推动全国各地环保部门的环境信息公开。

评分涉及中国113个城市，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回忆，首次评分后所有城市的平均分仅为31分，四年后虽有大幅提升，但平均分数仍未及格，仍有城市在总体评分后，得分为零。

在进行评分的过程中，马军曾试图让自己的工作人员与各地方环保部门取得联系，依法申请公开一些企业的信息，但答复通常并不友好。

“你是谁，哪个单位的，要企业的名单做什么？”“你申请地方的受处罚企业名单做什么？”“环保局要对企业负责，这些名单不能随便给”“要请示领导，领导批准才能答复”等等，马军说，甚至一些地方环保局还会为污染企业辩解。

一些地区的环保部门直言不讳地表示，领导说了就是不能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马军分析，大部分城市分数如此低的情况，大多缘于大部分城市的环保部门在日常监管信息公开、公众举报确认后的信息公开以及公众依法申请污染源信息公开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马军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各地方环保部门在信息公开的认识上就有缺陷。

一些环境监管相对弱的地区，由于污染企业能为当地政府创造利税，环保部门夹在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当公开环境信息有可能影响污染企业发展时，环保部门就会遭到上级的干预，停止公开信息的行为。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环境信息的公开工作在很多地区没得到重视、人手不足资源有限，造成各地公开的情况并不完善。

马军觉得，需要在更高的污染信息公开的制度层面推动。

当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找到马军，希望他能在这个提案做些工作时，马军非常乐意地参与了。

排污信息公开是空白

许多国家都有污染物排放登记制度，包括排放、处理和运输污染物的情况，企业都要向政府报

告，并且都是公开的，但这在中国仍是一片空白。

马军说，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国家都有污染物排放登记制度，包括排放、处理和运输污染物的情况，企业都要向政府报告，并且都是公开的。”但这在中国仍是一片空白。

环保部门努力的同时，民间环保机构志愿者则制作了中国污染源分布地图。

毛建伟的调查也汇集在地图上，地图涉及了 15000 多家企业的排污情况。这些企业排放了全国 65%以上的废气、废水及重金属污染物。

“如果有法律规范公开污染源的信息，更多的公众关注身边的河流，盯着排污企业，他们就无所遁形了。”毛建伟说。

这个愿望有望被实现。

2月22日至24日，民间环保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们在黑龙江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中国环境危机的担忧。

众人发现，去年在公众推动下，尽管一些城市迅速推进空气质量监测信息的发布，但是雾霾天的情况仅停留在信息公开上并不能根治，那治理方式是什么？答案是减少污染源的排放。

可这并不是短期能实现的，很快有了反对的声音。

减排要了解什么是污染源？排放量有多大？

“顺着这个思路，污染源信息公开的议题很快被确定了。”阿拉善SEE的项目主任郭霞说，这表明环境信息公开对政府来说并非难事。

作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万捷当天也在讨论会上，他已为环保工作呼吁了3年。

他认为如果由政府进行重点污染源的信息披露，就能把它制度化、法律化。

《关于尽快实施重点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的提案》就这么出现了。

同时，另一名理事王石也找了人大代表李东升。万捷和李东升分别在政协和人大提交了提案和建议。

虽然对这份提案甚是期待，但环保人士认为，即使这次不成功，他们也将继续推动污染源信息公开，只有公众知情，方能参与到环境保护中。

来源：京华时报

地址：<http://beijing.jinghua.cn/c/201303/18/n3845366.shtml>

[【返回目录】](#)

“红丝带”召开理事会展示“造血”项目，白岩松建议重视软捐赠

“目前社会对于慈善的理解存在某种误区，单纯地把做慈善看作物质捐赠。而实际上，在做慈善的过程中，除了物质帮扶，很多软性捐助也非常重要。”3月13日，在中华红丝带基金二届四次理事会上，形象大使白岩松阐述。

他建议中华红丝带基金在关注流动群体的过程中，增加一些软捐赠。“比如知识的普及、励志人生的培训、情感的辅导等等，软慈善和硬慈善同样重要，就如同精神的力量和物质的改善同样重要。”

白岩松说：“农民工在打工的过程中，相当多已婚农民工两地分居，甚至同城分居，所以临时夫妻的现象非常严重，对家庭的挑战极大。现在官方提供的数字，农民工群体有2.62亿，临时夫妻大量存在，我们不能装作没有看到。红丝带此前做了很多工作，但在这个大的形势背景下，完全可以从更高的层面做新的工作。不仅从防艾的角度，还要从爱的健康的角度，不光增加物质的投入和健康包的投入，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情绪。”

据了解，中华红丝带基金2012年捐赠收入超过3000万元，2013年除持续做红丝带健康包、凉山州项目之外，还将赴新疆伊犁针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村级卫生体系开展救助和支持项目，同时在凉山探索“造血”型项目，帮助困难群体自我发展。

当天的理事会上，针对凉山“造血”项目，基金举办了“彝绣”项目推介活动。现场，身着彝族传统服饰的妇女用传统的手工刺绣的方法织绣着色彩艳丽、图案新颖的绣片，身边还展览出一些手工刺绣的服装、饰品、箱包等有民族风情的产品。这是中华红丝带基金2013在四川凉山州开展的受艾滋病影响妇女手工刺绣项目的第一次亮相。

中华红丝带基金常务副理事长谷彦芬介绍说，彝族妇女世代相传的手工刺绣技艺一方面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在商业化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又是他们可以脱贫致富的途径。但目前凉山彝族手工产品开发面临产品档次低、品种少、样式陈旧、缺乏时尚元素等问题，只在本地零散销售，不能进入大城市和国外市场。中华红丝带基金将邀请香港女工商专联与凉山州总工会一起合作，通过妇女技能培训、丰富产品、优化设计、创立品牌、铺建销售渠道等手段，帮助受艾滋病影响严重地区彝族妇女生产自救和再就业，进一步帮助当地群众提高生活水平，改变贫困面貌。

“这是中华红丝带基金创立8年来第一次尝试‘造血’型扶植项目，前期还需要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个人积极认购，能够帮助这个项目实现循环发展。”谷彦芬说。

据悉，此次推介会上已经有十几家企业签署了认购意向书。

针对该项目，白岩松提议除了企业外，还应该吸引渠道、宣传和设计的捐赠。“这三个捐献一旦做好，将吸纳更多的硬捐献。”

链接

2005 年 4 月，中国工商联和 20 余家会员企业共同倡议发起了致力于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中华红丝带基金。基金的宗旨是动员社会力量，配合政府艾滋病预防控制规划的实施，重点支持和促进偏远、贫困地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如今，中华红丝带基金的公益事业以艾滋病防治为切入点，延伸到受艾滋病影响地区的教育、卫生体系建设，扩展至帮助受影响群体发展、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推进慈善奉献的公益领域。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3-03/19/content_5475.htm?div=-1 [【返回目录】](#)

京城农家女“嫁”到广东——国内首家乡村妇女基金会诞生记

3 月 6 日，中国首家专职从事乡村妇女发展的民间公益基金会——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中大中国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兴奋地在微博上报喜：绿芽基金会就是中国最早关注打工妹的公益组织“农家女”的南方注册版。北京一直注册不成，在广州成了！自去年 7 月 1 日广东在国内率先全面放开社会组织注册登记起，这片经济改革的热土，在社会改革领域又再次占得先机。对此，一名业内人士评价为：过去是“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现在是“东南西北中，注册到广东”。

NGO 竞相到广东注册的现象背后，是民间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满腔热情。可喜的是，仅仅在“农家女”落户广东四天之后，3 月 10 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人代会的报告中提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一个小小的开放，在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眼中，“意义远超过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大部制’改革”。朱健刚则期待，广东能在向民间组织开放的路上走得更远，成长为中国社会组织发育的总部。

现任绿芽基金会理事的谢丽华，早于 1993 年便创办了全国第一本面向农村妇女的综合性月刊《农家女百事通》，此后，意识到刊物服务有限，谢丽华开始依托杂志执行项目，先后创办了“打工

妹之家”和“农家女”实用技术培训学校，前者为流动妇女提供服务和维权，后者则为贫困妇女提供免费培训机会。

随着项目越做越大，谢丽华意识到，将项目放在杂志社里运作，无论是在财务流程上，还是战略发展上都不够规范。

2001年，谢丽华决定为农家女寻找合法身份。虽然此时，从事非营利性质的社会服务组织可以注册成民办非企业性质，因为公益性，农家女学校顺利地注册成了民办非企业，隶属十大类中的教育类别。

但可注册的十类组织并没有妇女工作的类别。在当时的社会管理体系下，妇女工作均由妇联主管。谢丽华也曾考虑，是否在妇联的基金会下成立一个分支机构，但如此一来，财务需由妇联管理，机构不能聘请独立的项目官员和工作人员。

左右权衡之下，农家女迈入了最早一批申请工商注册的NGO行列。2001年，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成立，定位为社区发展服务。

然而，2008年伊始，由于国家出台新的外汇管理规定，工商注册的NGO无法接受海外资金，长期与一些海外基金会有合作项目的农家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也陆续出台，但准入门槛都必须是民办非企业，从事社区服务工作的社工师的待遇和评级也逐渐规范化，让工商注册的农家女再次被排除在外。

此时，农家女因广泛的影响力，已经成为首都慈善联合会的会员，谢丽华便想，是否可以让首都慈善联合会作为主管，尝试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为了能名正言顺地获得合法身份，谢丽华再次递交了申请资料，但经过一年时间的漫长等待，最终仍然没能成功。她从侧面打听到，注册失败的原因可能在于农家女有海外资金的支持。

去年7月1日，广东社会组织开放登记在全省铺开，除法律规定的前置审批外，社会组织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谢丽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9月初，在朋友的引荐下，她拜访了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王世国，希望能在广东注册一个服务型的组织。王世国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并表示非常希望服务乡村妇女的组织扎根广东。考虑到广东省民非注册已下放到各个区县，他便建议她们以自然人的身份发起成立基金会，甚至还建议她们将“绿芽农村妇女发展基金会”改为“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一字之差，扩展了农家女所关注的领域。

谢丽华兴奋极了，回去之后便立即填写申请表格。9月24日，基金会成立的下发文件便批复下来。“只用了一个星期！”绿芽基金会秘书长、前农家女中心秘书长吴治平称赞道。然而，审核时她们才发现，原来发起人需要出注册资金，不能用原先工商注册的农家女中心的项目资金。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关键时刻，几位本土的企业家及时伸出援手，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资深

合伙人颜俊、企业家蔡文方号召朋友一起为绿芽基金会筹得了200万元的注册资金。

如今，新成立的绿芽基金会和农家女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两家机构为互相独立的平行机构。“我觉得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希望农家女二十年运作的模式和经验能够在广东做一些链接和创新，希望绿芽基金会有更广阔的社会性和资源，让更多人关注农村妇女，让更多农村妇女受益，”谢丽华说。

专家视点

朱健刚(中山大学中国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

广东可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发育的总部

南都公益周刊(以下简称“南都”): 国家将放开行业协会商会类等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你如何评价这项政策的意义?

朱健刚(以下简称“朱”): 开放登记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地都先行开展地方实验，去年，广东更是有八类社会组织全面落实降低登记门槛。

发改委发布这一消息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从国务院的层面为社会组织正名，体现了官民逐步形成共识，以及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这表明，政府也期待社会组织未来可以更好地担当社会建设的主体角色。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开放登记，此类组织相对而言具有更多的民间色彩。有学者将其视为公民公益的持续发酵后，公民社会悄然形成的标志之一；也有人对此持审慎乐观态度；还有人担心在实际注册时会不会另有额外条款制约；更有人呼唤有效监管，以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南都: 对于民间组织而言，应该如何应对这项政策以及接下来的挑战?

朱: 坦白说，这些社会组织如何发展，将取决于他们在被正名之后有着怎样的策略和实力。最需要警惕的，是重蹈前些年社工机构注册飞速发展继而又沦为“二政府”的覆辙。有些地方为了扶持社工机构的成长，支付每个新开设的机构数十万元的补贴，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不少新兴的社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其中相当多的机构缺乏素质过硬的专业人才，同时又因为过于依赖政府的资金而放弃了自身的坚持。现在，社会组织们应该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个出色的社会组织首要任务是要保持其民间性，一个前提是筹措资金的多元化。除了常见的政府购买之外，还要善于利用跟基金会合作开展项目、通过企业购买服务、自筹项目等机会。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在业务能力上要坚持走专业化与规范化的道路，把自己打造得更具实力。

相似的社会组织之间也应学习如何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形成联盟式的合作平台。这样可以减少每个组织单打独斗的交易成本，规避垄断风险，同时又促进合理竞争，以保持创新动力。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还需要积极探索如何有效地与政府、企业和社区合作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跨界合作是

当前社会组织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关键能力。

南都：这次放开登记的不包括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设代表机构。有人认为，目前放开这些组织登记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你怎么看？

朱：在一些地方应该已经成熟，比如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在华开设代表机构。不简化登记程序，鼓励他们注册，不便于管理，也无助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

南都：在当下，社会建设仍处于摸索阶段。为了促成更为扎实的改革，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朱：社会改革要特别和社会开放结合起来，社会改革还要更多关注基层民主，地方自治，言路开放以及公民文化的培育，这些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推动社会改革。

南都：你对广东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何建议？

朱：加强枢纽型组织建设，允许劳工服务组织能够全面登记注册，化解劳资矛盾，引入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社会组织进入广东，带动广东建设，广东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发育的总部。

南都：社会组织开放注册，广东一直走在改革前沿，对于全国，是否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朱：知名 N G O 的引入可以帮助广东提升社会建设的影响力，广东需要一些有全国影响的社会组织和公益领袖。广东的经验在于党政一把手重视，降低登记门槛，扩大购买服务领域，基金会登记权下放，大力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扩大公募权。

来源：南都网

地址：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3/18/content_1822816.htm

[【返回目录】](#)

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颁奖典礼举行

2013 年 3 月 19 日，2012-13 年度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当晚揭晓了高达人民币约 240 万元的现金奖以及非现金奖项的获奖名单。本年度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的奖励资助计划在形式和评选方式上都更具多样性。现金奖项包括“南都社会企业自我突破资助奖”60 万元，资助 3 家在初创期或成长期的有潜力的社会企业开展一个对机构发展能起到突破性作用的项目；“南湖社会企业创新奖”60 万元，资助 3 家创新型社会企业项目；以及“增爱社会企业创新奖”，资助一家具有高度社会意义、运行机制合理、发展前景广阔的社会企业胜出，获得连续 3 年，每年 20 万元

的资金支持；绿色生活行动项目提供 18 万的启动基金，支持年青人将关于环保和生态的创意发展为有影响力的生态社会企业。

除专家评审之外，今年的资助项目也借助了广大网友随手做公益的力量。腾讯 BC 微爱奖专门面向“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学员，通过腾讯基金会出资，网友参与做主的机制，将资金捐赠给网友希望支持的公益项目，最终有 17 个项目得到逾 82 万人民币的支持。

在非现金资助奖项类，新湖育公益创投奖选出 2 家具有高成长潜力的社会企业，由深德公益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为期一年的战略咨询和孵化服务，并和深德公益的企业社会责任伙伴建立业务合作。

具体获奖名单如下：

南都社会企业自我突破奖获奖名单（3名）	
付京平	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徐健	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
周贤	上海聚善助残公益发展中心
新湖优秀社会企业奖获奖名单（3名）	
陈婕	上海奇翔儿童发展中心
兰亚军	贵州高远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周丽	益云（公益互联网）社会创新中心
增爱社会企业创投奖获奖名单（1名）	
温少波	杭州携职大学生求职旅社有限公司
腾讯-BC微爱奖获奖名单（17名）	
陈乐丛	上海乐创益公平贸易发展中心
宋克明	长垣县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
刘梅	济南市明天儿童康复中心
陈婕	上海奇翔儿童发展中心
陈进	南京市秦淮区海勒之家特殊儿童康复服务中心
韩淑燕	天津市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
张立芳	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
刘淑琴	深圳市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徐进	青岛你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樊晓莉	宝鸡青青草障碍儿童康复教育园
张世盾	宁夏西吉县清源和谐社区服务中心
林士懿	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韩克勤	斜桥社区残疾人协会
吴含章	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
李元	阿布低碳创意设计工作室
李旻	榕树根

于黎	深圳市橄榄树残友互助中心
新湖育公益创投奖获奖名单（2名）	
孙恒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肖亮	上海小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
绿色生活行动获奖名单（6名）	
常天乐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崔馨月	绿行家园
晏路辉	企业碳排放管理平台
汪剑超	绿色地球垃圾分类行动
韩也豪	Doroq Garden几案上的花园
宋蕾	大学二手书市场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担任奖励资助计划的资深评委，他表示：“经过5年来的观察，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获奖项目的水准变化很大，从‘勉强凑数’、到‘说得过去’，到‘忍痛割爱’，可见培训很有成效，也反映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与发展总监马湄丽说：“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合作伙伴对于共同促进中国的社会企业持续发展的大力支持。我同时想强调这些奖项对获奖社企的重大意义。前几届获奖的学员和其企业每年的收益都有30-40%的增长，其中的大部分在获奖之后赢得更多顾客、媒体报道和外界的支持。”

此外，社会企业投资案例研讨会也在当日下午举行。会议邀请到三家成功获得社会投资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学员机构及其投资方从不同的角度分享研讨社会投资的案例，这三家社会企业分别是关注儿童读写困难的乐朗乐读学习潜能开发中心、通过艺术手段帮助自闭症儿童的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以及致力于打造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福州市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英国社会投资回报网络首席执行官 Jeremy Nichols 以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进行现场点评和总结，为更多希望获得社会投资的社会企业家提供切实的帮助和指导。

来源：英国文化协会网站

地址：http://dsi.britishcouncil.org.cn/zh/sfse/sfse_new/20130321/1131.shtml

[【返回目录】](#)

微博曝红社会企业网店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陶然的一条关于“爱德面包坊”的微博迅速串红网络，仅两天内转发就超过两万次，网友们被爱德面包坊智障师傅们的励志故事所感动，纷纷前往其实体店购买或网店下单支持。据悉，这家社会企业网店去年一年成交额是10.8万元，而经微博事件的一周成交额就突破了去年一年。

据悉爱德面包坊是中国首家为智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和庇护性就业的面包坊。二十来个工作人员中，智障学员占到三分之一。作为爱德基金会旗下的非营利机构，爱德面包坊是爱德慈佑院为智障青少年进行职业训练的工作坊。据爱德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之前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来帮助智障人士，因为很多盲人可以去做盲人按摩、做调音师，但对于智障人群，他们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不知道该去哪里就业。后来才发现他们可以从事面包房、饼店一类的工作，这些简单重复的工作也很适合他们。

作为一家典型的社会企业，爱德面包坊在缺乏相关政策支持下，其纯手工产品其实在价格上相较同类产品并无优势，而在电商模式和新媒体的帮助之下，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新媒体营销的成功案例，而是在讲述一个新媒体+电商+慈善的感人故事。

【相关链接】

台“喜憨儿”有尊严地赚钱

在台湾，有这么一群“喜憨儿”（智障儿童，也是“心智障碍者”的代名词），他们曾经是“三不要”的孩子——学校不要，医院不要，有的甚至连父母也不要……

这些年，通过台湾社会的各种努力，他们开始“自食其力”，从资源消耗者转变为资源创造者，从被服务者变成服务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价值。二手卖场 卖捐赠品让孩子们自豪

拐进台北忠孝东路三段的一条巷子，“光仁二手商品馆”就在这里。走进店里，大到家具，小到塑料杯子，应有尽有，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卸货，另一位正在擦拭商品，还有一位正在收银、开票……如果不是与他们四目相对，你绝对看不出来，这里的10位员工，都是智障人士。

“相处久了，我觉得他们跟我們没有任何差别！”光仁主任何素珍从事多年特殊教育，她说，早年台湾也是把这些孩子关在家里，或者送去康复机构，后来发现让他们进入社会，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可能对康复更有帮助，“在这里，他们可以交到朋友，可以凭自己本事赚到钱”。

何素珍介绍，“光仁”隶属于光仁社会福利基金会，目前有六家分店和一个仓库，共有61位智

障员工，商品里的东西，统统来自于市民的捐赠。店内员工月收入平均在七八千元（新台币，下同），全部都有劳保和健保。一些从事搬运等重体力劳动的员工，每个月能拿到超过2万，这已经接近台湾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据了解，根据台湾法规，只要达到法定年龄，在劳工局的职业辅导评量窗口进行测试后，一些条件稍好的智障人士，都可以到光仁二手馆这样的“庇护工场”工作。而更让她骄傲的是，不少员工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实践后，可以进入正常职场，担任超市清洁工或医院护工等。烘焙饼干 让孩子们自己动手赚钱

除了“光仁”这样的“庇护工场”模式，台湾成年智障人士从“被服务者变成服务者”的转变，更多的是从“烘焙”开始的。

台湾知名的“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1995年由一群心智障碍的家长共同组成，便是以烘焙屋的设立为起点，改变心智障碍者的价值。“喜憨儿”温馨自立的形象，在台湾也成为“心智障碍者”的代名词。

在喜憨儿基金会旗下的25家烘焙坊，遍布高雄、台北、新竹。在那里，智障人士与普通的面包师傅并无两样，甚至手艺更为精湛，你能吃到他们亲手做的西点面包、下午茶、午晚餐等，价钱不贵，味道也很好。

在台湾类似的基金会还有不少，另外一家由基隆智障者家长协会创办的“熊米屋”，每天都会把自制的烘焙糕点，送到台北繁华区的街头，沿路叫卖。负责人黄雪如说，来10个智障员工，就得有10个志工跟着，帮忙拿糕点，连叫卖也被他们谱成了RAP：爱心手工饼干，请帮帮我们建家园！抑扬顿挫，等红灯的民众通常会掏100元买一份。“所有的辛苦，都为了让孩子们相信，这些成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除此自行销售之外，台湾许多单位也会与基金会合作，通过各种活动来帮忙销售烘焙产品。例如台铁，最近就与基金会合作，推出“自强号手工饼干”礼盒，每盒有原味和巧克力两种口味的喜憨儿笑脸饼干。而不少大型网站，例如PChomeOnline等，也有专门的“喜憨礼购物城”专区，帮忙销售烘焙产品。政府关怀 给孩子们最稳妥的照顾

除了提供智障人士工作机会、接受捐款之外，现在各个基金会还会利用各种机会为心智障碍者与企业之间“牵线搭桥”，提供一份工作机会。

而台湾各地政府对于心智障碍者的关怀也很“给力”。台北劳工局身障就业科负责人介绍，类似“光仁二手馆”和“熊米屋”，都可以定期向劳工局提交各种计划，请求发放补助。原因很简单，尽管全社会都很帮忙，但智障患者能力所限，真想“自食其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政府补贴。比如，“光仁二手馆”所在的地方就在台北传统富人区，若非店租比同地段的少了许多，真的开不下来。

此外，台北劳工局身障就业科还会对智障人士做职业考评后，根据其康复情况，细分后者要接受的照顾程度。比如教养、教育、就业等。像光仁二手馆里的所有智障员工，都是在台北劳工局审定后，才允许上岗就业的。“相当于我们委托庇护工场来照顾患者，类似于购买服务。”该负责人称，“我们还会监督他们，工作时间会不会太长、各种保险有没有健全等。”记者手记喜憨儿的自信源自“心照不宣”的关怀

“让智障人士从被服务者转变成服务者，让他们可以更加自信，回报社会、成就自己。”这句放在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网站上的标语，看起来似乎简单，背后却代表着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心照不宣”的关怀。

以光仁二手馆为例，智障员工也许因为生意越来越好而自豪着，但是他们不会知道，店里面商品五花八门，大到沙发电器，小到皮包文具小摆件，捐赠者中不乏像伍佰和钮承泽这样的明星，而且所有的商品几乎都很新，质量本身或许根本就超过了标售价格。

智障员工也许因为市民们的天天光临而越来越自信，但他们不会知道，除了便宜和环保，吸引市民们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知道这些钱都会变成智障孩子们的工资，所以，才会曾经有过标价 100 元的商品，客人放下 500 元，拿了东西就走。

智障员工也不会知道，店里面的技术辅导人员，除了教大家给商品分类、贴标签，还得监督员工定时吃药，万一突然发作时，还得把他拉到店后的专门小房间里，跟他聊天，直至心情平复……

他们，让智障人士有尊严地活着。

（喜憨儿 <http://www.c-are-us.org.tw/style/front001/bexfront.php>）

来源：科技日报

地址：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3-03/20/content_195108.htm?div=-1

[【返回目录】](#)

盘点 2013 全国各电视台慈善公益节目之最

公益节目做好也不是容易之事，而以下公益节目排行榜更让我们看到公益节目的各有千秋，没有回报只有付出。

最大张旗鼓的公益节目：梦想合唱团（央视综合频道）

大型公益节目《玉兰油梦想合唱团第二季》至2013年除夕前夜落幕，共筹集到1.3710亿元八个梦想公益基金，八个城市的明星代表和他们的团队经过近四个月的打拼，完美谢幕，而吴克羣代表的宁波队通过重重闯关，一直保持旺盛的人气，最终获得总冠军，同时个人也捐献出50万元作为公益基金。而其也顺利在春晚舞台唱响公益梦想。通过央视的号召力和明星团队的共同努力，此公益节目虽然不能在同时段收视率夺冠，但其影响力却是深远的。当之无愧成为公益节目的带头大哥。

最烧钱的公益节目：中国梦想秀（浙江卫视）

浙江卫视的大型公益节目《中国梦想秀》，巨资打造的一档由明星给平民惊喜、帮平民圆梦的大型公益活动。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身上感人的故事和执着的梦想打动了他们。大牌明星亲临现场，为平民追梦人送上真诚的祝福，节目让无数幸运的观众美梦成真，获得享用一生的舞台体验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该节目每季仅圆梦就要烧掉一千多万元，作为声名不断崛起的浙江卫视能够顺利走过四季，而且《中国梦想秀》第五季节目开播在即，怀揣各种梦想的人们再次为圆自己的梦想而出发，据说这次规则更有大调整，几十家助力企业每家怀揣100万入驻，力争帮每一个追梦人现场圆梦。而更多名人纷纷向《中国梦想秀》抛出橄榄枝，目的就是将这台公益节目做到极致。

最综艺的公益节目：开门大吉（央视3频道）

《开门大吉》节目的宣传口号是“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有梦想的人就有希望，节目零门槛参与的全新益智游戏，融合欣赏性极强的综艺元素，给选手带来惊喜的同时，也使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受到美好和快乐。作为今天新开张的益智类游戏综艺节目，有《开心辞典》班底给力和中国正宗凉茶王老吉独家冠名，每个成功的选手最终获得自己的梦想基金，虽然基金数目不多，但对于参赛选手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人生财富，足以开启一扇希望的窗子。

最专业的公益节目：舞出我人生（央视第3频道）

该节目是大型励志舞蹈公益活动，也是继《梦想合唱团》之后的大型真人秀领域的大胆尝试。同样是今年才开播，节目邀请撒贝宁和张柏芝加盟，而重量级影视明星陈冲和王姬也倾力加盟。节目自开播起选手们将经历初选赛、淘汰赛、复活赛和总决赛共11场激烈角逐，最终获胜的草根选手将完成舞蹈梦想。节目将成立“红舞鞋艺术教育公益基金”，用于帮助更多怀有艺术梦想的人。

最斗智斗勇的公益节目：芝麻开门（江苏卫视）

江苏卫视今年全新公益游戏闯关节目《芝麻开门》该档节目是引进索尼影视打造的全新节目《Raid the Cage》的版权，而这档节目是全球范围内最新鲜的节目模式，江苏卫视的播出更是全球范围同步首发，开创国内节目版权引进先例。选手通过能否成功，靠的不只是智力，还有勇气，能否“芝麻开门”实现自己的梦想依然是颇具诱惑力。足够胆和智慧，那就让芝麻开门吧！

来源：新华网

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13-03/22/c_124490524.htm

[【返回目录】](#)

◎公益人

杨文庄：现在没有太多乐观的资本

2009年，杨文庄的事业发生了一次不小的转变。从政坛走进公益领域，不论是角色转换、工作方式方法，还是本领所长，“说句心里话，落差真的挺大的，适应了好久”。五年的工作经历，他已然褪去了官场气息，从思想到行动，实实在在成了一名公益人。

“近五年是最苦最累的。”同样是下基层考察工作，以前更像个将军，回来后布置任务、安排工作，最后验收检查。而进了公益圈，“更多的是协商、是劝说，甚至祈求”。

但当他看见因为金钱或技术上提供一点点帮助就能为贫困家庭改变很多，甚至是改变很多孩子一生的命运的时候，纵使“做慈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做每件事都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非常令人感动的”。一连几个“非常”，并不像他平时一贯的谦和谨慎，言由心生。

这几年，也正好赶上慈善事业戏剧性发展的几年。他和《公益时报》记者谈起感受，话语中没有透露出太多乐观，冷静谨慎的审度多过意气风发的感慨，“现在整个公益慈善事业，包括我们自己的现状，都没有太多乐观的资本，也没有必要说得太漂亮，还是要过苦日子、过紧日子，一方面慈善事业的资源没有很好地在社会上流动起来，另外一方面社会对我们还在问责声不断，我们自身的内功和本领，包括队伍素质、品牌建设、管理规范、法规制度健全等方方面面，还有很大差距。”杨文庄如是说。

《公益时报》：你进入公益领域这几年正赶上公益事业蓬勃发展也不断出现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杨文庄：我在公益领域这几年，刚好看见公益经历了春天蓬勃发展，接着是一个“倒春寒”，这

个寒意至今还丝丝入骨、寒意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中国慈善事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先天不足，一定会积累和反应出一些问题，以前还是比较孱弱，在人力资源储备、整个从业人员规范运作、资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不足，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偶然，是必然现象。但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在几家大型的基金会，而是整个慈善系统，在各个组织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出现。

从“郭美美事件”，到天使妈妈受质疑，公众问责越来越细了，说明这些问题也是全面的、系统的，这对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来讲都是好事，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担当、责任和勇气，在这种批判和质疑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了政府的变化，那么主要在什么地方？

杨文庄：在公众问责之初，个人觉得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有一种很无措、有点畏惧的状态，所以采取逃避、回避的方式，但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出现问题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不是一家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没有站出来回答一些公众的问题，来澄清一些社会的误解，以及为单个的组织承担一些管理方面的责任。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也需要一些政府的参与和回应，在社会的问责中，也需要完善和改进工作，使公益慈善的市场更好运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主管部门，也要进一步建立一个有利于民主法治社会或者市场体制下的，和社会组织、公益慈善事业打交道的新型关系，比如管办分离。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竞争市场，在管理的同时提供必要的扶持，在管理的同时匹配一些社会资源来更好地促进发展，也包括为民间组织、草根组织更多地呼吁，争取一些权力和社会地位。

《公益时报》：你的身份具有政府背景和公益实践者的双重色彩，那么你怎么看待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角色？

杨文庄：政府和慈善部门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工作方法有时候不一样。政府更多是通过制定一个政策、推动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利用公共财政的资源，来推动问题的解决、社会的发展，比如新农合、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等等。当然政府部门手里可动用的资源都是在法定或是有限定的，很多时候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的，至于怎么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的问责，把政府的资源更好地配置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缺陷和差距。

对于我们公益基金会的定位，有的说是 NGO，有的说是 NPO，我个人更倾向于 NPO 非营利组织。如果说公益组织认同全民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国建设成和谐社会这个理念的话，那么应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重要的协调者、桥梁纽带这个角色，做一些政府还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应该是群众的代言人，政府工作的监督批评者，因为这样的定位，应该将公众的愿望和诉求，通过一个更合理的渠道反映解决。

《公益时报》：2010年公益领域受到质疑声强烈的时候，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筹款受到影响了吗？

杨文庄：我们影响不大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基础比较低，前几年还在几千万的水平，第二方面是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在自身管理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项目的管理、信息披露等等，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福布斯披露和中民慈善网的披露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公募基金会里面是比较好的，我们在抓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为增长创造了条件。另一个就是近几年在引进人才方面加大了相当大的力度，我记得2009年我刚来时候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现在是34岁左右，有一大批人才进入为项目筹资、拓展、扩大影响，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也是增长的原因。

《公益时报》：人才引进时候遇到什么实际问题吗？

杨文庄：坦率地讲，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才在社会中地位和认可度并不高。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考到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可能会有北京户口、有各种福利，到了公益慈善机构，有理想但依然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在符合一定条件和规定的公益组织内解决一批人才落户，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留住人才，提高他们的社会荣誉感、职业荣誉感，会有很好的效果。有时候是支持的话说出来了，但是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行。理想照进现实，就会冷冰冰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现在在这样的机构工作是很困难的。

《公益时报》：你觉得公益领域现在的发展阶段除了人才建设，还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杨文庄：我一直习惯于保持一种谨慎悲观的态度，现在公益领域没有太多竞争，项目的同质化很明显，因为市场非常大、需求量太大，公益组织还是不够多。2008年慈善风暴之后很多副产品也随之增多，甚至是“零成本慈善”这样的伪概念也有市场，很多不利于公益发展的事物大行其道，说明很多人对于公益的理解幼稚不成熟，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误解、偏见还很多，从整个业内人员的整体素质，各个基金会管理规范、创新产品还很弱，好比市场没有太多像样的企业，哪有像样的竞争。

国际表现方面也不理想，在其他的欠发达国家，还没有我们公益组织的足迹，我们并没有走出去，缺少很成熟的一代一代在国外传承的项目。现在就是刚刚破了个题，至于要做的文章，还很多很多。

《公益时报》：对国际的援助有可能会遭到公众的不解和非议吗？

杨文庄：有这个可能，做慈善公益并不是要等到富裕了才开始做，而是一种相对性。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裕的时候，父母会帮助邻里之间，给点粮食借点钱，但那时候孩子可能会不理解，说我们还没有呢，并不是说你我都满足了，而是说可能他比你更需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中国公益和公众要有这种胸怀，我们和欠发达国家比可能还比某些地方好，那么作为

大国，并不是单比经济实力，有时候比的是人情味儿。我还是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不然国际上也会对中国有些质疑，你的产品去了、你的工厂去了，但是你的善、你的文化、你的价值观并没有跟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国。

《公益时报》：你进入公益领域这几年正赶上公益事业蓬勃发展也不不断出现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杨文庄：我在公益领域这几年，刚好看见公益经历了春天蓬勃发展，接着是一个“倒春寒”，这个寒意至今还丝丝入骨、寒意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中国慈善事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先天不足，一定会积累和反应出一些问题，以前还是比较孱弱，在人力资源储备、整个从业人员规范运作、资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等方面都有很多不足，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偶然，是必然现象。但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在几家大型的基金会，而是整个慈善系统，在各个组织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出现。

从“郭美美事件”，到天使妈妈受质疑，公众问责越来越细了，说明这些问题也是全面的、系统的，这对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来讲都是好事，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担当、责任和勇气，在这种批判和质疑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了政府的变化，那么主要在什么地方？

杨文庄：在公众问责之初，个人觉得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有一种很无措、有点畏惧的状态，所以采取逃避、回避的方式，但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出现问题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不是一家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没有站出来回答一些公众的问题，来澄清一些社会的误解，以及为单个的组织承担一些管理方面的责任。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也需要一些政府的参与和回应，在社会的问责中，也需要完善和改进工作，使公益慈善的市场更好运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主管部门，也要进一步建立一个有利于民主法治社会或者市场体制下的，和社会组织、公益慈善事业打交道的新型关系，比如管办分离。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竞争市场，在管理的同时提供必要的扶持，在管理的同时匹配一些社会资源来更好地促进发展，也包括为民间组织、草根组织更多地呼吁，争取一些权力和社会地位。

《公益时报》：你的身份具有政府背景和公益实践者的双重色彩，那么你怎么看待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角色？

杨文庄：政府和慈善部门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工作方法有时候不一样。政府更多是通过制定一个政策、推动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利用公共财政的资源，来推动问题的解决、社会的发展，比如新农合、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等等。当然政府部门手里可动用的资源都是在法定或是有限定的，很多时候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的，至于怎么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的问责，

把政府的资源更好地配置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缺陷和差距。

对于我们公益基金会的定位，有的说是 NGO，有的说是 NPO，我个人更倾向于 NPO 非营利组织。如果说公益组织认同全民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国建设成和谐社会这个理念的话，那么应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重要的协调者、桥梁纽带这个角色，做一些政府还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应该是群众的代言人，政府工作的监督批评者，因为这样的定位，应该将公众的愿望和诉求，通过一个更合理的渠道反映解决。

《公益时报》：2010 年公益领域受到质疑声强烈的时候，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筹款受到影响了吗？

杨文庄：我们影响不大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基础比较低，前几年还在几千万的水平，第二方面是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在自身管理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项目的管理、信息披露等等，所以我们在 2011 年的福布斯披露和中民慈善网的披露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公募基金会里面是比较好的，我们在抓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为增长创造了条件。另一个就是近几年在引进人才方面加大了相当大的力度，我记得 2009 年我刚来时候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是 45 岁，现在是 34 岁左右，有一大批人才进入为项目筹资、拓展、扩大影响，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也是增长的原因。

《公益时报》：人才引进时候遇到什么实际问题吗？

杨文庄：坦率地讲，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才在社会中地位和认可度并不高。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考到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可能会有北京户口、有各种福利，到了公益慈善机构，有理想但依然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在符合一定条件和规定的公益组织内解决一批人才落户，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留住人才，提高他们的社会荣誉感、职业荣誉感，会有很好的效果。有时候是支持的话说出来了，但是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行。理想照进现实，就会冷冰冰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现在在这样的机构工作是很困难的。

《公益时报》：你觉得公益领域现在的发展阶段除了人才建设，还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杨文庄：我一直习惯于保持一种谨慎悲观的态度，现在公益领域没有太多竞争，项目的同质化很明显，因为市场非常大、需求量太大，公益组织还是不够多。2008 年慈善风暴之后很多副产品也随之增多，甚至是“零成本慈善”这样的伪概念也有市场，很多不利于公益发展的事物大行其道，说明很多人对于公益的理解幼稚不成熟，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误解、偏见还很多，从整个业内人员的整体素质，各个基金会管理规范、创新产品还很弱，好比市场没有太多像样的企业，哪有像样的竞争。

国际表现方面也不理想，在其他的欠发达国家，还没有我们公益组织的足迹，我们并没有走出去，缺少很成熟的一代一代在国外传承的项目。现在就是刚刚破了个题，至于要做的文章，还很多

很多。

《公益时报》：对国际的援助有可能会遭到公众的不解和非议吗？

杨文庄：有这个可能，做慈善公益并不是要等到富裕了才开始做，而是一种相对性。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裕的时候，父母会帮助邻里之间，给点粮食借点钱，但那时候孩子可能会不理解，说我们还没有呢，并不是说你我都满足了，而是说可能他比你更需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中国公益和公众要有这种胸怀，我们和欠发达国家比可能还比某些地方好，那么作为大国，并不是单比经济实力，有时候比的是人情味儿。我还是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不然国际上也会对中国有些质疑，你的产品去了、你的工厂去了，但是你的善、你的文化、你的价值观并没有跟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国。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rwzs/201303/8818dcd88db04d3798cf28dfd122cc83.shtml>

[【返回目录】](#)

“世界社工日”看世界各地社会工作者的辛苦与满足

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专门从事服务他人和社会的工作，他们被称作“社会工作者”；在一些国家，他们的工作虽然平凡，但具有极高的美誉度和社会地位；在我国，这个群体人数超过 30 万，但并不为广大公众所了解，甚至有时似乎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今天是他们的节日，每年 3 月份的第 3 个星期二，是“世界社工日”。

安娜，2012 年初开始在北京西城区仁助社会工作事务所从事社工工作，服务方向是青少年教育支持。

安娜：我是毕业于北京青年志愿者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02 年级的学生，05 年毕业。一直在从事青少年社会公共服务，但是并没有去做社工，是因为早年人们对社工这个专业，甚至对于社工的身份是没有任何认可。而近几年我国各种政策的实施跟推行，使我们社会工作队伍在不断的壮大。经过学校的一个推荐，我成为了仁助社工事务所的总干事，使我作为学习这个专业的人有了一个栖身之地。

今年两会期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答记者问时表示，我国从事专业社工的人员已超过 30 万，但

是跟国际相比，我们还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安娜说，30万的数字涵盖多层面社工群体，但实际工作中这个队伍依然薄弱。以北京为例，如今北京拥有社工机构五六十家，但加起来专业的社工人员不过两三百人：

安娜：可能既有转制社会工作者也包含我们广义上理解社区工作者，还有一些是持证社会工作者，以及我们国家相关服务行业一些工作人员都被编入到社工这个行业队伍里来。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社工队伍还是很薄弱的，特别是专职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北京这样的专业社工机构目前已经达到了50多家，甚至在向步入60家的进程中迈进，60家的专业社工机构里面做我们这一类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专职社会工作者2、300人，队伍其实还是很薄弱的。

社会工作在美国有着百年历史，美国人对社会工作的核心定义是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帮助穷人和受不公正待遇者；帮助酗酒和吸毒者；保护妇女儿童；改善少数民族受压迫的状况等等。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庞哲介绍：

庞哲：纽约市在1736年开始了第一个收容所，接待无家可归的人，而当前的美国社工则是要有学位、有执照的受人尊重的职业，其中种类也很多，有流浪者社会收容所、儿童福利保护组织等等。有执照社工薪水在美国平均是5万美元左右，只要有热情、有志向的人基本上都能有机会申请社工的职位。但是社工也存在一点的危险性，比如说在对一些有智障或者是有精神失措还有对儿童福利当中遇到一些父母不满意的情况，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暴力行为。

在美国，社会工作者收入相对较低。究其原因，社会福利机构多依靠国家拨款，并且社会工作者的“产品”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社会工作虽然很平凡，但很多美国人非常倾心于此，选择这一职业的人往往都很执著，有使命感和奉献精神。

在亚洲，中国香港的社工组织很发达。中国日报驻香港记者李涛告诉我们：在香港，每400人中就有一名社工。

李涛：香港的社工管理模式和运作经验都非常的成熟。根据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香港具有社工资格的人数为17590多人，在这个人口只有7百万的地方，平均每400个人就有一名社工，比起社工起源的西方国家平均每一千人有一名社工的比例来说，香港社工的发展程度也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的。在香港，社工是一个必须经过严格资格认证的职业，法律规定对社工采取强制注册管理，未注册及登记者不得从事社工工作。香港社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也比较高，超过9成的社工都具有社会工作的学位或者是学历。香港知名院校包括香港大学或者是香港中文大学，都开设了社会工作系等相应的学科，保证的相应人才的供应。

社工的工作繁琐并且辛苦，超过9成的香港社工工作都是帮助老人、小孩、智障人士等社会上相对弱勢的群体。尽管如此，香港人对做社工的热情不减，这同时也是因为在香港社工的工作是一

份比较体面的职务，即使在民间机构任职的社工，刚入职的年轻人的收入也与其他商业公司同等人员的收入差不多，高级的社工月收入甚至可以达到5、6万每个月。

而在日本，想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并非易事，必须进高等学府接受社会工作学专业教育，毕业后参加严格的资格考试，合格者才有机会从事这种工作。全球华语广播网驻日本特约记者黄学清：

黄学清：日本有400多个非政府组织，日本人一般直接称呼它的简称NGO，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从国际支援到援助社区里有困难的群体，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而且随处可见。日本很多NGO起源于社区，看到身边出现问题一些人会联合起来开展一些活动来解决这些问题，团体就渐渐形成了。也正是因为起源于社区，所以他们做事都非常实在，无论活动的规模怎样，服务领域是什么，都有人支持他们，也就是NGO的会员。在日本的NGO里工作的人以中高年龄的人居多，他们大多有着丰富的社会和人生经验，有较强公益意识，要应聘NGO的工作并不比应聘一些大企业容易，需要有很强的责任感、积极性和协调性，NGO由于没有资金和时间慢慢培养人才，所以比较少录用新的毕业生。那么在NGO里工作的人有报酬的固定员工，还有很多是义务的工作人员，400多个NGO中有报酬的只有180个左右。

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温暖支持和正能量的传递。与此同时的，这种温暖与满足也需要必要的社会支持，给他们更多平台。

同时建立社工行业薪酬保障制度等等，这些对他们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有了这些可敬可爱的社会工作者们，他们的工作无关利益，只为使命。

来源：中国广播网

地址：http://china.cnr.cn/kanzhongguo/201303/t20130319_512184410.shtml [【返回目录】](#)

王克勤：士不可以不公益，任重而道远

王克勤说自己是个受“士文化”影响颇重的人。在漫长的历史银河中，“士文化”不仅作为横坐标以时间长轴的形式被延续了下来，同时也作为纵向标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朝着人格的更深、更高处探索与进取。时光伴随尘埃飞扬而过，历史的光影照在“士人”之上，我们看到“士”的种类着实缤纷：昨有著书立说的“学士”，亦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还有通晓阴阳历算的“方士”，以及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而如今，看见王克勤的所为所行，才猛然发觉，“士”的文

化已随时光辗转，相容创新。“我就是个热爱公益、捍卫公益、践行公益的‘士’。”王克勤如此说道。这个以“中国第一调查记者”身份名满天下的“士”，在犀利和凛冽的无疆新闻中行走，虽砥砺于诸多风雨险阻，但仍深秉毅持着“为他谋福”的思想，延续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中华民族公益思想。

“其实公益之念，从来不曾走远。”王克勤坚信：每一个中国正士的身上，一定充溢着公而益众的铁血雄魂和慈悲柔情，只要在这个时代敢于坚持，中国公益之士的能量就会被唤起、被汇集，终成大势。

好人好报是内心的安宁

王克勤的记者生涯已有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来，王克勤因为其持恒的职业操守、卓越扎实的新闻调查功底、与恶势力死磕到底的坚毅精神、对弱势底层群体的不吝关怀，以及对公益事业的热忱付出，使默默无闻的自己变成了新闻行业中的标杆型人物。

王克勤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会观察者、调查者和参与者。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处于社会的何种时期，他对社会的热点、难点，总能把握精准，认知独到。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能耐”，让王克勤在从事公益事业之时，总能找到社会之中最迫切待解且对未来影响深远的公益聚焦点。2011年6月15日，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他将公益的帮扶群体聚焦在了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缺少医药、最苦难、最底层的6000万尘肺农民，这其实就是王克勤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认知延展至公益项目的最好体现。

然而，尽管调查记者和公益项目策划人之间有着非常接近的社会特性，但这两种身份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凛冽直接、锐利若刀，而后者则更需要温情与调和。置身于这两种不同之中，王克勤自己有着怎样的辨别？

王克勤告诉记者：“其实，做公益也需要调查的本领，要像调查记者似的，不怕艰难险阻地收集材料，倾听需要帮助之人的疾苦，同时也需要用事实说话。虚假的求助信息绝对不能被容忍，因为这样会深深伤害公益事业的整体公信力。”

“但因为公益的信息时常来自民间，苦而难的形式又不只一种，政府在面临很多不熟悉或者闻所未闻的苦难之时，一定会有暂时不适的感觉。如果此时公益人和政府出现正面冲突或者情绪用事，放弃坚持已久的救助，只能徒增矛盾，无法解决问题中最真切的部分。”王克勤说道。

王克勤回忆起“邢台艾滋病事件”时说：“那时候，人们对艾滋病的认知非常少，于是很多人把艾滋病妖魔化，地方政府更是‘谈艾色变’。因此我就一条一条资料收集给政府看，思想是一步一步转变的，有时候，做公益、启思想，是不能着急的。公益人，就是要收集详实的事实资料，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才可推动地方政府的公益事业和政策。”

“公益事业可能更需要学会‘合作’，特别是学会和政府合作。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我现在也在学习和改变的道路上前行。”王克勤说。

事实上，正如王克勤所示，民间公益组织实为政府强有力的补充，政府和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搭建平台、共同成长。

“无论是调查记者，还是公益人，我对于这两种工作的感情都是深厚的，极其热爱它们。因为它们都能让我收获内心的安宁。”王克勤表示，“有的人可能为了生存做着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有的人做一份有钱但是很枯燥的工作。我能做既喜欢又有意义、做再多次也不觉得疲倦无趣的工作，是非常幸福开心的。”说到这里，王克勤喜悦难掩。

“而在这个社会中，好人是否能及时获得相匹配的‘好报’，其实是一个一时间无法很好回答的问题。但我始终坚信，好人的‘好报’，其实就是内心的安宁。”王克勤对记者坦诚道来，“获得内心的安宁着实是一种人生的莫大幸运，因为事实上，很多的酸涩与苦痛，是可以被内心的安宁感消解的。而让人心满足本就很难，它是个世界难题，但幸运的是，这种安宁的来源可以通过不停地行善来制造。”

士与公益人之间的自我拉扯

“我身上传统的影子非常浓重。”王克勤不掩自豪，受传统士文化影响，王克勤乐善好施，轻财好士。如果你仔细体会的话，其实这个外在文秀的公益者，心中活着一个传统形象鲜明的“大英雄”。

古训云：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王克勤铭信，与钱保持距离，不贪钱、善分配，是公益人所遵循的基本理念。

然而，无法忽视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追逐经济成就的时代，像王克勤这样遵循“士”之善道、轻财尚义的人，多少会面对这样的心理纠结：一方面是士的文雅和坚守；另一方面，面对尘肺病人几近绝望的求助，想到救助资金捉襟见肘的尴尬和无奈，还有那么一丝不甘和心酸。

“我很多时候会陷入扭曲的心理状态，不断地出现自我拉扯，感到很苦恼，也很困扰。”王克勤真诚地表示。

一名老调查记者不媚权利资本的为人准则和公益筹款的艰难现实，形成这个“只为苍生说话”的风骨之人心中的软肋，也催生了行动之上的尴尬。

“别人能为一个公益项目的筹资去应酬，这方面，我好像却不太能行。”王克勤笑着告诉记者，“但也正因为如此，深觉善款的宝贵，对于救命的公益钱，定当毫厘珍惜。”

去明星化的公益“明”人

王克勤早已是个名人，如今的他更因公益事业上的风生水起，俨然有向“公益明星”发展的势头。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年，王克勤拿公益类的大奖拿到手软，更受到了媒体圈和公益圈人士的“热

捧”。人们甚至在各种颁奖晚会上欣然发现，王克勤出现的频率不比演艺明星小——2010年度时尚先生盛典的年度时尚先生、《新周刊》“2011中国杯帆船赛蓝色盛典晚宴”颁发的“时代骑士‘爱骑士’”勋章、《南方都市报》“责任中国”2011公益盛典颁奖礼的“2011公益行动奖”、“2011网易公益行动奖”、“腾讯网思享之夜”2011年度公益记者……种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然而这些给予和称赞却没有让王克勤失掉最本色的东西，比起明星，王克勤好像更热衷于做一个公益“明”人。

即便走“明星化路线”能为公益项目带来迅速的资源 and 名声，王克勤却仍不选择做一个明星公益人。他觉得他永远是那个在田间地头，满脚泥泞、一卷裤腿儿席地而坐、与农民兄弟唠家常的人。在躁气十足的“浮时代”，他希望用自己的“沉”的方式，将朴素的公益模式树立成一种品牌。

“我觉得做公益要把身段低到尘埃里，这种‘低’不是自卑，也不是恐惧，对于我自身而言，做公益其实是需要谦卑和踏实的。踏实、‘亲人’的公益模式，也许在很多方面的发展上并没有那么成效显著、一步千里，但它是值得推敲，可持续、可延伸的。”王克勤说道。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对于‘明星’是反感、排斥的。”王克勤补充道。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对于名气不迷信、不依赖、不刻意、不拒绝的王克勤，却获得了无数名人朋友的热情相挺。

2011年11月12日，著名影星陈坤携手大爱清尘基金举办了“爱、自由呼吸”徒步活动，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尘肺农民。2011年12月10日在四川，陈坤再次支援王克勤义举，举办了“爱、自由呼吸”制氧机捐赠活动。陈坤及部分网友捐资购买53台医用制氧机，赠送给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尘肺患者。

“在‘大爱清尘’最开始的时候，捐款人寥寥无几，我当时想着，‘大爱清尘’可能办不下去了。没想到的是，姚晨帮‘大爱清尘’转发了微博，捐款一下子就多了起来。”王克勤言语中流露谢意。

翻开王克勤的履历，你会惊奇于他经历的转变：农家子弟出身的王克勤曾在市委机关从事过文秘宣传，在外贸进出口公司从事过商贸业务，而且还在一家国企担任过一年多的副厂长。1989年从业媒体开始，至今先后在《甘肃经济日报》、《西部发展报》、《西部商报》、《中国经济时报》从事记者编辑、专栏负责人、部主任及执行总编等工作。而他如今的身份，则是一名真真切切的公益人。从过政、经过商、事过文，风景看遍，此时此刻，他听从本心，拥抱公益。“杜鹃啼血，精卫填海。我们是平凡人，也许我们没有拯救世界的力量，但我们固守爱与善良，坚持行动与呐喊。”王克勤这个现代之士从未忘却古老的善之初心，他知道他的未来，定会与公益紧紧捆绑，用真切的呐喊和真心的行动与民众紧紧相连。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3-03/19/content_5472.htm?div=-1 [【返回目录】](#)

◎亮机构

阿里之家：帮灾区把特产卖到全国

青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白龙江下游，属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带，素有“鸡鸣三省”之称。全县幅员面积3269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4.69万。青川特色产品资源丰富，黑木耳、天麻、七佛贡茶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更有野生蜂蜜、野生灵芝等山中珍宝。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害，烈度达11度，地震起于汶川映秀镇，止于青川东河口。地震带来破坏之严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系青川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县因“5·12”地震死亡4697人，受伤15453人；全县直接经济损失500.8亿元。同时，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环境和珍稀动物栖息地环境等自然资源也在地震灾害中遭受严重破坏。

一场地震，一场巨殇，让无数人陷入绝望和恐惧。地震带走了无数生命，却带不走青川的财富。

“阿里之家”是汶川地震后阿里巴巴在当地设立的援建项目，主要针对灾区群众免费进行电子商务培训，帮他们就业创业。几年来，每月约有10名阿里巴巴员工去那里做志愿者。从2009年开始，常驻青川的阿里之家持续为当地2所学校400多名孩子提供免费午餐或营养牛奶，为青川竹园片区的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并先后将200台爱心电脑送进8所学校。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当地学校和农户将青川的土特产卖上淘宝卖到全国，为青川重新注入了希望和活力。

5年过去了，一座崭新的青川县城在原址上拔地而起，合理的规划、崭新的楼房、宽敞的街道，连穿过县城的河流也修葺一番。鲜有房屋印刻着地震带来的惨状，但在地震中受伤的群体，阴影依旧难以消除。

“被救出来后，我再也不吃炸酱面了。”唐莎拖着残疾的左腿，边走边说。这个28岁的小伙子，在网吧赶走最后一个玩劲舞的顾客后，被压在楼板下4个小时，“手机在身边响，手就是动不了。”

5·12地震后，各地政府救援的机构、组织，民间NGO，迅速赶往各灾区。青川作为重灾区之一，也有很多援建单位，民间NGO也都第一时间来到，帮助这座失血过多的城市输血，从城市的硬件设施到灾民的心理康复，帮其重生。现在5年过去了，大多数援建组织都已撤出，只有一些硬性的援建工程仍在继续；NGO组织也已不见。

目前，只有“阿里之家”仍在，帮助这里的农民如何通过网络，售卖他们这闭塞山区里的特产。

学校重生 学生凋零

三月时节，草长莺飞。下了公路，再走半小时的“沙尘暴”路，就到了坐落在青川县盘营乡乐元村的自然风希望小学，学校内的几棵桃树开得正旺，学校背靠山，学校前是一片开得正旺的油菜花。

地震前，这个小学曾有50多个学生。震后，这个几近坍塌的小学得到了民间近十万元善款，之后在原址上进行修建。由于人口的自然衰减，而今这里只有9名学生，两名老师，学校的班级也只有学前班、二、三、六年级。学校的右侧是阿里巴巴援助的爱心食堂，每天中午给孩子们提供一顿午饭，午饭是赵会英老师做的。学校的校长是贺仕明，赵会英是他的妻子，两人在此教学坚守已有30年了。贺仕明也表示，这里也曾来过一些教师和支教的老师，但是都没能留得下来。学生也从之前的50多人，自然萎缩到9人。男孩子外出打工居多，女孩子成年之后都嫁出去了，嫁进来的却很少，“近两年很少听说，有哪家生娃娃”，赵会英说，孩子少得很。

由于教育工作出色，赵会英老师1992年曾被调离过这所小学，到乡中心小学任教，那里的条件和待遇相对都要好一点，但“2个月后，我就又回来了”。当时乡中心小学的校长有些生气，告诉她，你5年内不要申请调动名额了。赵会英并不是很在意，一干就是近30年。她的儿子现在在深圳打工，“常年见不到孩子，看着这些娃娃就感觉很亲”。

上六年级的谢科扬，家住金洞乡长林村，今年12岁。他每天要走1个小时的山路到学校来上课，由于先天性视力问题，很早就戴上了眼镜。这个腼腆的孩子，曾到过北京，但从未到过自己所在的县城。地震救援期间，成龙在央视演唱“国家”时，作为灾区儿童，他出现在表演舞台上。

傍晚，记者跟随谢科扬来到他家。新盖的房子，家里有父母、爷爷奶奶、姐姐还有他。父亲严重近视，平时在村子周边打零工，母亲患神经性头痛，在家务农。爷爷患有甲亢，奶奶患腰椎间盘突出，常年靠药物维持，家庭过得艰辛而拮据。

谢科扬的邻居是同班的谢登娟家，也上六年级。这个6年級的姑娘，年幼时遭遇不幸，生父为了救她失去生命，而她也失去了右腿。后来，母亲承受不了沉重的家庭负担，选择再婚并生下了一个妹妹。“5·12”地震后，在四川电视台的帮助下为她装上了义肢。爷爷多病，只能放放牛。全家的木头房子，虽然很旧，但粗壮的大梁、立柱仍显结实。

2012年9月，地震期间靠政府扶持成长起来的川珍公司，积极参与了一些公益事业，在走访乐园学校后免费向这两个家庭提供了菌种技术。短短的几个月，两家各自种植出来的60斤香菇，各自增收近1500元，在农村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地震后 网商出现了

青川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黑木耳、天麻、七佛贡茶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更有野生蜂蜜、野生灵芝等山中珍宝。这也是地震后，阿里巴巴农村信息化工程启动，支持农村电子商务的缘由，通过网络把这里的农产品卖到全国，是一种战略性的援助。

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赵海玲，这个上学期间立志不给别人打工的青川女孩，曾有开酒吧和卖服装的经历。2009年大学毕业后，在家给父母的饭馆帮忙时，遇到了阿里巴巴培训第一期的乐橙，交

流没几句后，她就决定了通过淘宝，做山里面的山货。

三年时间，赵海玲很长时间都奔波在山里收山货，但她并不觉得累，用她的话说，因为我小的时候在这里，非常幸福，也有一种情结。现在在山上到处跑，感觉很享受，像是在寻找记忆中童年的感觉。

此间，外面的东西也走了进来，青川当地人的生活，因联网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赵海玲是第一批学习做淘宝的，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快递，还要稳定的和农夫之间的合作关系。回想起来，当时的确克服了很多困难。

到现在为止，她们的团队已有比较稳定的网络，和他们公司建立合作的农户应该有上千的散户。由于她的网店销售的蜂蜜比较多，她打算和农户建立蜂蜜合作社。因为之前收购蜂蜜都是零零散散的，就是去东家收一点，西家收一点，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今年她打算找一个有技术的一个农户，由他牵头，然后带领建立一个比较规范的基地，她今年打算建立个蜂蜜基地。

2010年，赵海玲的销售额超过100万元，同年9月更是当选“阿里巴巴全球十大网商”，地震新生榜样、大学生回乡创业典范、四川首届溢彩女人等。赵海玲已经成了青川网商中的明星，也是后期众网商效仿的榜样。现在她在成都和绵阳已开设实体店。

阿里的援建模式

哈佛商学院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曾将企业的慈善行为归为三个阶段：公共义务、博取好感，以及战略性捐赠。阿里很显然走的是战略性捐赠。

阿里巴巴从成立灾后重建小组那天就确立了利用公司优势开展灾后重建的方针，从紧急状态的网络募集资金和搭建灾区紧急物资采购平台，到现在的利用电子商务促进青川产业发展、培养年轻人网络创业和推动青川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2008年5月19日，阿里巴巴集团成立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小组，援建地点为青川县。2009年1月份，为更系统、专业、长期地开展灾后重建，阿里巴巴在青川县乔庄镇建立“阿里之家”，并派员工驻守青川开展长期的灾后重建工作。马云曾承诺对青川进行援建的时间为7年。

7月18日，阿里巴巴乐橙计划启动，11名员工志愿者前往青川县板房社区、山区农村，教授当地农民学习淘宝运作流程，并给加入培训打算从事淘宝生意的商家进行一些帮扶、支持的活动。

经过三年多的孕育和发展，青川网店已经发展到50多家，50家网店共直接带动100多人就业。其中受阿里资助的贫困生王亚丽，毕业后被青川网商赵海玲聘请为网店客服，实现就业。截止到现在，青川网商通过淘宝网成交金额也超过1千万，最早一批的网商的坚持有了收获，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川人加入网商大军中。

名为“青川父老乡亲土特产”网店店主吴启明介绍，他现在淘宝卖的东西，95%都是青川本地

老乡的一些东西，淘宝店名也是出于此。当时他从电脑怎么操作都不会，每天带着爱人骑1个小时的车程到板房（当时的培训基地）学习，到现在能顺利地跟顾客交流，把青川这么好的产品卖出去，为当地老百姓增加一点收入，他感到很高兴。

吴启明的爱人李女士仍记得，当时从网上获取第一单生意时，她高兴地一晚上都没睡，“真没想到，在网上跟人聊几句就能招来生意”，从未接触过电脑的她，曾和丈夫做过小的实体店，卖一些日用百货等。但没想到网店的生意来得如此轻松。

在阿里巴巴援建青川之初，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力主用商业模式扶持灾区经济发展，他的核心观点是“企业要做企业能做的事情”。因此，青川最终成为电子商务在农村发展的一片新的沃土，具备一定素质的灾民成长为新一代网商，进而拉动生产与就业；农户也因蓬勃发展的网销业而获得更多的收入，进而脱贫致富。在这个模式里，阿里巴巴的公益行为内生于企业，并与企业发展战略融为一体，在帮助灾民的同时也使得电子商务在当地得到发展。这样做，除了有持续性，也将产生利润。

竞争出现 物流发展

随着网店陆续开始赚钱，更多的网商也开始加入到淘宝中来。在目前的活跃网商中，3岁以下的网商又占到了80%以上。网商的来源也基本涵盖了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青川原生的小生产者、政府工作人员及大学生村官、外来的成熟网商等。另外，青川网购的兴起，物流也会应声而起。

青川电子商务的初始阶段，很多网商对网货的意识还比较单薄，基本以经营青川土特产为主，包括蜂蜜、菌菇、山货、茶叶等，也有部分农副产品。另外大部分网商们并没有稳定的供货渠道，也经常借鉴别家卖的比较好的产品，没有形成差异化竞争。今后随着青川网商数量的逐渐增加，网商素质的逐渐成熟，青川的网货产品也正悄然进行着升级。

2008年，青川县一共只有3家淘宝店。2009年，网店数量为28家，到2010年为62家，2012年则减少为57家。由此而看，青川县的淘宝网商已出现竞争的趋势。吴启明介绍，很多网商关门，是因为没能坚持下去。

关于固定产品供应渠道，赵海玲就是一个走得比较靠前的例子，她正在努力跟有养殖蜂蜜技术的农民进行合作，通过农户的技术，然后进行资金的援助来建立固定的养蜂基地，可以为她稳定地供应蜂蜜。另外她也给自己的公司进行注册，跟省内其他产品竞争，她必然会给产品进行升级。

地震前，整个青川县只有一家经营物流业务的企业，即邮政部门的EMS。价格昂贵、服务水平一般是当时青川物流业的状况，地震后随着阿里之家在青川县的推进，电子商务开始萌芽，物流业瓶颈就逐步展现出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2010年4月，申通物流在青川成立了分公司，标志着制

约青川电子商务发展的物流瓶颈，得到了质的改善。

吴启明介绍，刚开始做淘宝那段时间，青川的物流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很困难。但是随着物流的出现，他们收发网购物品的时间大大缩短。之后，再跟圆通快递打交道时，他加入了圆通快递。现在，网上当天卖出的货，他们能够当天都能够把货发出去，跟外面的速度是一样的。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目前青川县的物流企业共有5家，分别是青川邮政局、申通青川分公司、圆通、汇通、韵达青川代办点，已经改变了EMS一统天下的局面。大部分网商的物流都通过申通、圆通发向各地。2012年，青川物流发出快递量在200件/天左右，而进入青川的快递量高达600件/天。

青川网商从无到有，现在有57家，快递物流设施在渐渐完善，当地的传统品牌企业也在摸索电商，“网商+农户”这种社会经济形式通过市场的检验，已初步具备造血能力。

推动青川电子商务发展

据青川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杨宽勇介绍，“5·12”特大地震后，随着青川县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青川的电子商务开始出现。四年来，阿里巴巴集团将培训延伸到骑马、三锅、茶坝等农产品资源较丰富的乡镇，帮助青川共计举办了电子商务网络销售人员集中培训班12期，培训457人，全县现有57人完成网络销售注册开店工作。

青川县四举措推动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工作纳入了“十二五”期间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培养发展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上网商20名。

另外，青川需要加强流快递体系建设，目前青川县已有申通、圆通、邮政、汇通、韵达5家物流公司，改变了邮政一统天下格局，大部分网商的物流通过申通、圆通发向各地。

随着青川震后交通的改善，信息工业的不断发展，以及物流公司的递增，网络商品交易悄然出现，网商队伍逐步壮大，部分农民朋友销售更多了一个渠道。但网络商品交易其特有的隐蔽性和随意性，为一些不法经营者提供了空间，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发布虚假违法广告、欺诈消费者行为的案件，逐年递增。

青川县的工商部门已对此加强了监管，维护网络商品交易市场公平有序的环境，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展。主要包括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工商总局《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本着鼓励发展的思路，做好网上经营主体准入监管工作。对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督促在其网站首页醒目位置公开《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和加贴工商红盾电子标识；积极受理网络消费者维权诉求；提供合同帮助，从网商与农户签订合同到履约合同实行全过程跟踪指导，从源头上杜绝合同欺诈的事件发生，同时，对他们与农户签订的合同实行备案管理；引导他们都建立自己的基地，统一实行公司加农户的运作模式。

来源：云南信息网

地址：http://news.ynxxb.com/content/2013-3/19/N22707812723_4.aspx

[【返回目录】](#)

心目图书馆：打开心目和盲人一起阅读

心目图书馆是 2011 年 1 月 29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成立的民间盲人图书馆，是一个以盲人为对象，志愿者参与录音，通过光盘、盲文书籍、网络等途径给盲人朋友提供有声读物和电影的图书馆。

通过有声读物的制作和传播，补充盲人朋友因为视力障碍造成的信息缺失，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和获取信息的途径。同时，秉承红丹丹“残健同行，共享生命”的理念，倡导更多人参与录音，使社会更多人理解、了解残障人，关注残障人，帮助残障人。

庞大的阅读需求：

据了解，目前中国盲人有 600 万人左右，北京的盲人约有 12 万，但像这样的民间公益盲人图书馆在全国似乎也比较少见。国内的 2 0 0 0 多家公共图书馆中只有 1 0 0 多家设有视障阅览室，且有声图书数量极其有限，能接待的视障读者更是屈指可数。而在日本，30 万盲人却拥有 97 家盲人图书馆。在盲文书籍的出版方面，2010 年，中国盲文出版社全年的新书出版量仅为 285 种，近五年平均每年的盲文新书出版量仅为 260 种左右，而日本点字图书馆在志愿者的参与下，有声图书的录制总量能达到 300 种左右。相比而言，我们出版的盲文图书数量太少，根本不能满足盲人阅读需求。

先进的阅读技术：

心目图书馆位于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的北京红丹丹文化教育交流中心，拥有一间 30 多平方米的录制室，可容纳 4 名志愿者同时录制有声图书。还有一间 15 平方米的阅览室，为盲人提供图书借阅等服务。

在录制有声图书方面，“心目图书馆”采用了日本盲人图书馆提供的 Daisy 制作技术，对于有声图书的播放，也是由日本盲人图书馆提供 Daisy 播放机，轻松实现对有声图书的随意翻页、做标记，进而满足视障人群的个性化读书需求。

目前，馆内有 5 部阅读器，暂时还不能为视障朋友提供外借服务。Daisy 阅读器的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开启”按钮，听到书名后，按播放键，接着听到书的出版社、出版日期等基本信息和目录，再按播放键，就可以听到图书内容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听书还可以随意翻页、做标签，这

次听不完下次还可以接着听，而这是普通有声读物所不具备的，极大地满足了盲人个性化读书需求

Daisy 阅读器

“你是我的眼”——心目的志愿者们

前来参加有声图书录制的都是社会志愿者，这其中还包括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所有的工作都是无偿的，并且他们捐赠了一批图书给图书馆。目前心目图书馆的志愿者有几十人，主要是白领、教师、退休人员，他们喜欢读书，在心目，他们以朗读和讲述的方式带领盲人一起领略书籍的魅力。心目的培训师大伟说起志愿者来声情动容。盲人读者想“读”哪些最新的图书，志愿者也会想法尽快录制出来。2011年，“心目图书馆”计划在志愿者的参与下录制有声图书100本。

“心目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仍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到图书录音工作中来，制作更多新书音频，满足盲人的读书需求。热爱公益、爱读书、普通话标准的人们可以与他们联系。

心目图书馆任重道远

“心目图书馆”的成立对视障人群无疑是一大福音，同时，对公共图书馆开展视障人群阅读服务也是一种借鉴。通过录制和传播有声图书，可以使更多的视障人群能够分享现代文明的精神成果，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将对他们更好地共享社会平台、融入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然而，从“心目图书馆”实地考察的结果看，还存在一系列难题等待解决，比如，资金不足，没有足够的办公室、库房和录音室。在志愿者的招募环节，虽然志愿者的热情高涨，却受到培训和录音场地等诸多方面的限制。

在业务操作层面上，“心目图书馆”面临人才方面的极大挑战。据了解，该馆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原来“心目”系列的“遗老”或“遗少”，没有一个图书馆专业出身的，这对日后数字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长远发展势必埋下隐患。在数字资源建设的初期，由于有声图书的数量有限，一旦随着数量的与日俱增，制作环节和检索环节出现的问题也将逐步显现。

为此，从馆藏建设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引进专业人才参与有声图书的数字资源建设，严格按照学科分类，制定一套符合有声图书特点的著录标准，为日后“海量”数据的检索奠定坚实的基础。考虑到大部分资源都是音频，不妨在日后的资源建设中引入语音检索技术，搭建一套声音数据检索系统，实现“用你的声音来搜索你要‘读’的图书”。此外，由于不同的志愿者在普通话的把握上都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也就为日后的语音检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语音识别技术，模糊检索技术等。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心目图书馆还是在蓬勃生长。如同需要爱与关怀的孩童一般，他的成长依然需要更多人力、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爱总会创造奇迹。

来源：创思客

地址：<http://www.thinker360.com/page/3742>

[【返回目录】](#)

◎国际观察

Dan Pallotta：我们的慈善观，大错特错！

关于 Dan Pallotta

Dan Pallotta 今年才 42 岁，可是似乎已经经历过几个人生了一歌手、作家、创业家、人道主义活动家。如果你还不熟悉他，这么说吧，这个人神奇地集“离经叛道”的行为和深切的人性关怀为一身，不按常理出牌，不被很多人认可，可是他交出的成绩单，又不得不让很多人佩服。

20 年前，还在哈佛大学上学时，他就组织了 35 个学生，骑自行车横穿美国大陆，为乐施会筹款 8 万美元；后来他首创了以“挑战自我，为善因筹款”为核心的系列活动，如为支持乳腺癌研究，60 英里 3 日暴走（近 100 公里），为支持艾滋病治疗的骑行活动等，参与者们一边挑战自己的体力极限，一边为他们所支持的善因筹款。在短短 9 年之间，他的公司通过这些活动，为非营利机构筹集了近 6 亿美元的非限定性捐款。通过事件活动营销，进行慈善募款并不新鲜，但 Dan Pallotta 借助高超的营销和运营，以及对参与者心态的精准把握，把参与者的数量、体验和募款的战绩，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的公司，Pallotta Teamworks，是个专门为非营利机构筹款的营利性公司；2002 年，他们正处于巅峰时，被爆公司的运营成本高达 40%，而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募集款项，而他个人也因为领取约 35 万美元的薪酬，成为众矢之的。赞助商、客户扛不住压力，急流撤出。他的公司，一夜倒闭，声名俱裂。他并没有一蹶不振，2004 年成立了新公司 Advertising for Humanity，东山再起。他的这些经历被收入哈佛商学院案例，而他本人也是哈佛商业评论网撰写博客专栏。

2013 年 TED 年会上的演讲

Pallotta 很早就开始用商业方式去达成非营利机构的目标。时隔多年，慈善资本主义这样的词听起来似乎已经没那么刺耳了。可是，在刚结束的 2013 年 TED 大会上，Dan Pallotta 的 18 分钟，依然有语惊四座之效：我们一直被灌输、一直很推崇的那些慈善观念，其实是大错特错！这些观念，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百害无益！

庞大的社会问题与弱小的非营利部门

Dan 先抛出一个问题，商业领域创造的财富和实现的创新，大举推进了人类进步，现在还有不少人鼓吹商业和政府部门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有社会企业来接手了。

那么，非营利部门究竟有没有意义？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有二：无论经济怎么发展，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总有 10%甚至更多的人，是被排挤在社会财富之外，没法保证基本的生活；同时，即使是社会企业，它仍然是需要市场的。而事实是，很多生活的品质和生命的期望，根本没法完全用金钱量化或者通过商品来实现的。他用残疾人的需求来举例，除了基本生活，他们还期望得到欢乐，得到同情，得到关爱。这些正是慈善存在的意义，也是非营利部门不可或缺的原因。

那既然如此，非营利部门的现状又如何呢？捐款规模小得可怜，只占到 GDP 的 2%，而更要命的是，这个 2%的“市场份额”，40 年没变过；再看很多投入多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社会问题，譬如乳腺癌的研究、消除贫困，究竟改善了多少呢？一边是势不可挡的社会问题，一边是弱不禁风的非营利部门，实在很可悲。

观念桎梏 5 宗罪

为什么商业领域轰轰烈烈蓬蓬勃勃，而非营利部门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存在这么久，却一直“停滞不前”呢？Dan 一针见血的指出，目前的现状，是我们陈旧（甚至可以说虚伪的）观念一手造成的，我们习惯用双重标准来看待商业部门和非营利部门。这些双重标准体现在 5 个方面：

薪酬：

商业部门的信条是，你创造的价值越大，那你就挣得越多，而这一段，在非营利部门却是不可行的。你向青少年售卖暴力游戏挣个 5000 万美元，没人会拦你，而且你还会荣登“连线”杂志的封面；而在非营利部门，如果你的机构在帮助残疾患儿，你想要挣个 50 万，想得美，等着被骂成“寄生虫”吧。

这种观点，表面看来充满道义；事实上危害非常严重。商业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收入的差别不是一点点大。商业周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斯坦福商学院 MBA，毕业 10 年后，平均年龄 38 岁，平均年薪（含奖金）40 万美元，相比之下，一个医疗健康领域非营利组织的 CEO，只能挣到 23 万，而一个致力于减少饥饿的非营利组织的 CEO，挣得更少，只有 8 万。很多人愿意为自己热衷的公益事业做贡献，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或者愿意年复一年地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牺牲呢？而颇具嘲讽意义的是，这些高薪的企业高管，每年即使拿出 10 万捐赠给非营利组织，享受 5 万税收优惠后，他们每年还能比非营利机构的 CEO 多挣 25 万，而且还能落个“慈善家”的美名，堂堂皇皇的进入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大摇大摆的指挥那些苦命的 CEO。有了如此名利双收的好事，那些聪明无比、原本可以为改变这个世界做出极大贡献的人，当然会蜂拥至商业部门，你还指望非营利部门能壮大？

广告和营销：

在商业部门，广告促销是天经地义，市场推广费用，没有最多，只有更多；而在非营利部门，捐款怎么可以用来做广告呢？没门！（除非有公司愿意免费做广告！）那么是不是非营利部门做营销本来就没必要呢？绝非如此！Dan以自己筹划的AIDS为例，5年里，18万余人参与，共募集了近6亿美元。他们能够触及这么多人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强大的广告攻势，他们在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登整版，在电台、电视台黄金时段大肆做广告。Dan问，试想一下，如果你只是在洗衣房散个小传单发个小广告，能召集到多少人呢？连“市场”都不让做，怎么能指望非营利机构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呢？

为创收的新创想承担风险：

如果迪斯尼砸下2亿美金拍个电影，打了水漂，没人会上告到司法部；可是，如果你的社区贫民百万募款活动，在12个月内没有产生75%的“收益”，你连人品都会被质疑。与其做得越多，错得越狠，大家都墨守成规，没人愿意尝试募款新方式。你扼杀创新时，也扼杀了新的募款渠道，也遏制了机构乃至整个部门的成长。

时间：

亚马逊(Amazon)成立后，6年没有盈利，可是投资者们也舍得着眼长远，等他们一步步构建基础设施，打好基础；在非营利部门，想要花6年时间去创建一个梦想？等着上十字架吧。

盈利：

资本有追逐利润的天性，而非营利部门的盈利，不能用于分红，直接影响就是没有资本愿意来投入，没法实现资本流转增值的滚雪球效应。商业领域能轻松锁定万亿资本，扩张发展，而非营利部门却是渴求资本而不可得。

总而言之，由于这些观念上的桎梏，非营利部门吸引不了优秀人才，无法利用市场手段进行推广宣传，吸引新“客户”，不敢进行新尝试，没有时间去打基础去犯错误，也没有交易市场来扩大资本规模，就这样的状况，你还指望非营利部门能有怎样的发展？数据说话吧。1970-2009之间的30年里，年收入翻越5000万美元的企业有46,136家；非营利机构？区区可数的144家。

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创新？

商业领域革新不断，这些保守而矛盾的思想从何而来呢？Dan把它归咎于新教徒的传统。400年前，当新教徒远涉大西洋，来到这片新大陆，一方面他们想要实现其宗教理想，另一方面，他们又迫切希望在这块新大陆上创造积累新财富。于是这构成了一组矛盾，钱赚的越多，罪孽就越深重，于是行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忏悔的方式。既然是因为“赚钱”而生的忏悔，那怎么还能让慈善继续“赚钱”呢？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他们关注善款里究竟有多少比例是“直接做了善事”，也因此对运营费

用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对非营利机构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很多人把“支持善业”和运营支出二分对立，如果运营支出多了，那么支持善业的资金就少了，因此运营支出是负面的。由此，很多机构不得不尽量压低运营费用，而这是以机构发展为代价的。事实上，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运营支出。如果运营支出，能够帮助非营利机构把饼做得更大，吸引更多的资金，那不是更好吗？募款费用是绝好的例子，因为募款支出有极大潜力实现直接增收。以他自己的经历为例，他们以5万美元作为风险资本，启动“为艾滋骑行”的募款活动，9年里，在扣除一切募款支出后，他们一共募集了1亿零8百万美元，让启动资本翻了1982倍；而在为乳腺癌研究进行的募款活动中，短短5年里，他们让35万美元的筹款费用翻了554倍，募集了近2亿美元。Dan随之问了一个非常有力度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真心关注乳腺癌问题的慈善家，你是会找来全世界最好的研究专家，给她35万美元做研究，还是给她的筹款部门35万美元，让他们把它变为1亿9千4百万美元，让这个专家全心做研究？

大家习惯性认为筹款费用不能超过预算的5%，一旦破了5%的界，好像这个机构问题就大了。Dan曾经处在这个问题的暴风眼中，有过切身之痛。2002年，他的公司正在巅峰，一年就募集了7100万美元；而同时，他们也被盯上，被指责运营费用高达40%，追求扩张，过于费力去取悦客户，片面追求活动的新奇刺激感。他的客户顶不住压力，终止了合同，他的公司一夜倒闭。随后，他的客户延续类似的活动，而募款规模却直线下降了84%。

Dan认为，这种做法是用道德绑架了俭省。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整个的饼有多大？一个是运营支出只有5%，收入只有71元的烘焙义卖活动，一个是运营支出占40%，营收却高达7100万的企业，你觉得哪个的贡献大？

反思过往，Dan倡议，现在是重新检省先人遗产和过失的时候了，是该考虑我们应该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的时候了。他很形象的说，当我们这一代退去的时候，我们的墓志铭不该是“我们为慈善机构省了很多运营支出！”，而应该是，“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

Dan最后总结道，如果我们能有勇气和胸怀改变这些观念，发展出一个壮大的非营利部门，发挥它的真正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创新。

后记

Dan Pallotta的观点，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我还在商学院就读时，他曾作为嘉宾，来到我们的课堂上。即使在波士顿这样一个以开放闻名的城市，即使是一群年轻而激进的MBA学生，在课后，仍然有不少同学摇头。我们曾有过一番小范围的热烈争论。最后，起初站反方的同学开始承认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其实并非不能接受，可是他的行为太极端，触痛了很多人的心理底线。

Dan Pallotta的这些观点，在他2010年出版的Uncharitable一书里，有很详细的阐述，其中

专门有一章讲述运营成本。国内受”零成本“怪圈困扰的同志们，也许能在他的辩驳中，找到些启发。

2012 年底，Dan Pallotta 出了一本新书，Charity Case，我刚拿到。如果有朋友愿意一起读，一起拆，那就一起来吧。

来源：善天下

地址：<http://www.gpcommon.org/ch/?p=124>

[【返回目录】](#)

美国非营利机构能力建设的新变化

2 月 20 日下午，我参加了《非营利季刊》(Nonprofit Quarterly)组织的主题为”2013 年非营利机构能力建设“的网络研讨会。会议由《非营利季刊》主编 Ruth McCambridge 主持，会议嘉宾在非营利机构能力建设领域，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4 位嘉宾分别是

Kate Barr of the Nonprofits Assistance Fund,

Jeanne Bell of CompassPoint Nonprofit Services,

Carlo Cuesta of Creation In Common

Robin Katcher of the Management Assistant Group (MAG).

背景变化

Ruth 先勾勒了非营利机构能力建设领域的大背景变化。总体说来，非营利机构本身在经历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型。工业时代的非营利组织，往往以地域为基础，组织结构分明，活动领域、项目内容和执行方式界定都很清楚；而信息时代下，非营利机构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都变得更加灵活，地域界限也逐渐淡化，机构自身的边界也不再那么僵化，无论是调动志愿者，还是项目外包，甚至跨机构协作，机构内外都出现了很多 free agent。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非营利机构的能力建设开始日益从”提高机构生存发展能力“，转变到”优化促进使命达成“。具体地说，过去能力建设往往以单个机构为焦点，而现在，能力建设越来越多地以使命为目标，考虑为达成这样的使命，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及其项目活动之间的协调。

主要趋势

几位嘉宾从自身经验出发，总结出当前非营利机构能力建设的 3 个重要趋势：

理事会最需要“能力建设”。一方面很多非营利机构的管理人员已经认识到，创新和改变已经时不我待，而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机构的理事会，要么与机构和当前环境脱节，要么过于保守，所以往往成为了机构改变的最大障碍；所以，理事会需要重新认识他们的角色和责任。在实务上，非营利机构理事会的整体“财商”大多还停留在过去阶段，片面地以“收入/支出”来衡量非营利组织的财务健康，或者认为“机构发展”就是“增长”——收入增长，服务对象增加，活动范围扩大。这些问题前几年已经出现，而在最近这两年，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领导力发展的理念在更新。不是只有机构高层才需要领导力，机构的各个层面都需要领导力；过去的领导力发展往往是“矫正式”(Corrective)，把大家往一个高度上拔；而现在领导力发展更多地是帮助领导人加强自我认知，发挥各自的优势，并指导他们有效地将自身的优势与机构管理相协调。教练式发展(Coaching)越来越受重视。

品牌建设需求越来越大。非营利机构正在认识到品牌建设不是什么锦上添花的工作，而是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必须。而品牌建设的需求也逐渐从工具使用，发展到建立系统的品牌策略和战略规划。这是近 2 年的一个显著趋势。

主要任务

作为非营利机构能力建设的支持方和提供方，几位嘉宾对于能力建设有 3 点共识：

咨询师、培训师和支持机构，不应该只关注自己手上有什么工具和模型，而应该从非营利机构面临的问题出发，以结果为导向，实施能力建设。

领导力发展是非营利机构长期发展的关键，既紧急，又重要。行业内需要研究探索一套不同层面领导力的能力模型，包括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

促进理事会治理的转型和建设，激发对话，引起关注，探索实践模式。

来源：善天下

地址：<http://www.gpcommon.org/ch/?p=107>

[【返回目录】](#)

慈善如何缔造美国

2006年6月26日，在一座因慈善捐赠兴建的图书馆——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内，全球第二大富豪沃伦·巴菲特，将一份310亿美元的财产赠与承诺书交给身旁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此举意味着巴菲特的310亿美元已归至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名下。

2006年6月26日，在一座因慈善捐赠兴建的图书馆——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内，全球第二大富豪沃伦·巴菲特，将一份310亿美元的财产赠与承诺书交给身旁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此举意味着巴菲特的310亿美元已归至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名下。

巴菲特的捐赠，让盖茨基金会如虎添翼。这个600亿美元的慈善联合体，已经在“改变世界”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

盖茨夫妇促成了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该联盟的成果之一是研制出了一种挽救了数百万儿童生命的新型脑膜炎疫苗；

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多地发放农业贷款和农具，无数农民因此摆脱了赤贫；

盖茨基金会投入巨资研发新药，例如B型肝炎疫苗的成本已经减少了99%；

持续致力于根除小儿麻痹症，现已只剩临门一脚。

作为商业巨子的比尔·盖茨，曾经打出旗号“让每一个人的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如今，慈善家比尔·盖茨的信念是：“人人拥有平等的生命价值”。

作为当今世界个人财富值增长最快、也最注重效率的两大富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不仅规定了自己的大笔慈善资金的使用方向，甚至还为善款的使用确定了日程表——巴菲特在自己的遗嘱中规定，在本人去世的10年以内，其慈善基金必须全部花光。

比尔·盖茨本来给自己规定的这一年限为50年，但当与巴菲特就慈善事业进行深入交流并合作后，也受到巴菲特的影响，将这一年限缩短了一半，为25年。

早在100年前，安德鲁·卡内基这样的慈善富豪们，已经秉持财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

如今，世界两大最富有的人将这一趋势更加推进了一步——不仅要用之于社会，还要在一定期限内用之于社会，以迫使变化尽可能快地发生。

在整个西方历史上，富豪一边聚积财富，一边将财富散播于社会，投入到自己感兴趣或是感觉身负使命的社会领域，推动社会建设和改变，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体现其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这种由个人投入到社会、参与社会变革、进行社会实验的钱，可以被称作“有价值观的钱”。这种钱曾经是推动文艺复兴的重要力量，也是镀金时代崛起的超级富豪们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大手笔改造社会的工具。如今，在杠杆效应因为现代科技与金融手段被无限放大的时代，商人们更是以前所未见

的热情和力量，参与到改变世界的事务中去，也使得慈善力量，成为政府力量及商业力量之外塑造和影响世界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如果把美国慈善比作一条河流，这条河流不仅源远流长，且不拒细流，越流越大。

盖茨和巴菲特的 600 亿美元慈善基金，只是美国慈善河流中一朵耀眼的浪花。这条长河从“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的那一刻即已开始，至今近 400 年间，浪花不断。

追溯美国近 400 年来的历史，那真是一段慈善群星闪耀的历史，无数人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在推动世界改善和进步的领域不遗余力地创新和实践，寻获其光荣与梦想。

1620 年 11 月，102 名在英国饱受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帆船抵达美洲，在马萨诸塞海湾附近登陆，寻找他们新的人生。一个国家的历史由此开篇。

刚登陆的这批清教徒，面临的并不是幸福图景，而是饥饿、寒冷，以及终日在附近逡巡的狼群。面对困境，他们唯有相互帮助，救助老弱病残，及至后来，自治性的宗教团体，迅速成长为教育、卫生医疗和其他服务的提供者。

随着越来越多前来寻找财富的欧洲人源源不断地登陆，新大陆逐渐得到开发，财富的积聚和分配也随之进行，出现了贫富之分。有感于现实社会的弊端，移民中那些怀有改造社会理想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对缓解贫富不均的思考。

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思罗普对最初的社会贫富不均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他认为，人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耀，就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不幸的“兄弟”，从而改善社会，这是上帝的旨意。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创建者威廉·宾看来，人们应该勤劳致富，积累的财富必须用于造福社会。他认为，所有恶行中最坏的是坐拥财富而吝啬至极，“给予”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是最好的自娱方式。

此后，一个叫科顿·马瑟的人系统地抛出一套慈善理论：无论男女，无论个人还是团体中的成员，都应该持久地做有益于这个世界的事。他认为，行善是利人利己的事情，行善不仅能使弱者得到帮助，而且能使行善之人获得愉悦和荣耀，甚至对事业成功和身体健康也大有裨益。

科顿·马瑟还强调捐出去的钱要使用得当，善款应该帮助受助者提高生存能力，而不是培养好吃懒做之人。这也成为日后的慈善家极力强调的一个问题，甚至成了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一般原则。

科顿·马瑟之后，一位真正的慈善先驱，同时也是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现了，他被誉为“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他还是位伟大的发明家，发明了避雷针。不过，他的慈善探索比他的科技发明更值得被铭记。他推崇富人用财富做慈善，进而用知识服务大众。他的口号是“促进人类幸福”、“提高普遍的知识水平”。

在慈善行动上富兰克林更是不遗余力。跟他有关系的公益慈善项目包括：美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在费城铺路、清道、建路灯以及警察巡逻等各种市政建设计划；建立宾州医院、成立宾州大学

前身的高等学院和美国哲学会等。

在一次前往波士顿的途中，富兰克林注意到，该市的消防警备状况比费城要好得多。返回费城后，他于1736年组建了联合消防队，这是美国第一支志愿消防队。此后，志愿消防队的概念日渐普及，类似的消防队相继在北美其他殖民地成立。

1790年，富兰克林去世，他在遗嘱中规定，用自己的遗赠在波士顿和费城各建立一笔基金，专门用来资助学习手工艺和应用科学的学生。正是受到富兰克林等先驱的影响，今天，用遗赠做慈善，在美国俨然已成为一种风尚。

富兰克林去世100年后，以他的遗赠为基础资金，波士顿第一所理工学院成立了。

富兰克林的慈善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和社会科学，这也是近200年后慈善基金会捐赠的几个主要方向。

得益于富兰克林几十年在慈善上奔走呼吁和身体力行，富兰克林死后，费城的慈善事业继续蓬勃发展。1793年，黄热病在费城肆虐，大量居民死于疾病，很多人开始举家逃离费城。危难降临时，无数的“富兰克林”积极行动起来，无论是基督教的教义，还是美国人信奉的“自由平等”，都让费城人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拯救费城。一座座医院迅速建立，以此为契机，城市的各种卫生设施也随之建立，费城得救了。这是费城人的胜利，也是慈善的胜利。

费城慈善家涉足的领域多样，且多属首创。

1800年，在费城，马格达伦协会成立，目标是帮助失足妇女回归正常的生活。这个协会的创立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关注和帮助失足女性的基金会。

美国慈善捐赠开始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1845年，一个英国人在美国开了捐赠支持学术机构之先河。根据英国化学家詹姆斯·史密森1829年立下的遗嘱，美国政府在1845年用他的遗赠——一笔50万美元的资金，建立了名为“史密森学会”的学术文化机构。时至今日，这个学会仍然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之一。

史密森大概不会想到，他的一个决定，影响了美国慈善捐赠方向的转变。之后，一系列由私人捐助的学术文化机构在美国纷纷出现，渐渐地，美国在教育领域的慈善捐助重点开始由道德、宗教等向科学、文化转变。进入20世纪，文化教育成为美国各大慈善基金会关注的重点。

在史密森学会建立之前，已经陆续有私人慈善家把目光集中到高等教育上。有别于过去强调关注中小学教育的传统。

在美洲新大陆，私人捐赠大学最早的著名案例发生在1638年，那年，一位叫做约翰·哈佛的移民不幸逝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将自己半数的财产780英镑和400本图书捐赠给附近的一所学院。不要小看这笔钱，当年，政府给学院的拨款仅为400英镑。

哈佛逝世 100 年后，美国私人慈善家惊讶地发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竟然如此之低！有感于此，一大批私人慈善家把捐赠的重点转向大学。因此，美国的大学数量，从 19 世纪初到 1860 年代，短短半个世纪，从十几所猛增到 500 多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和慈善家的努力密不可分。

19 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逐渐黯淡，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一批通过掌控石油、钢铁、汽车等新兴产业而崛起的商业巨头开始出现，其发家致富的速度和所获财富的数量，均创造了历史新高。

但是，在将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迅速地集中到手中，如何面对这笔财富，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这些财富拥有者面临的新课题。尤其是当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他们快速致富的同时滑向贫穷深渊的时候，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令这些企业家思考手中的财富的意义。

在此形势下，美国的慈善事业有了新的动向。富豪们的慈善行动第一次显得如此集中，如此耀眼。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安德鲁·卡内基执掌的卡内基钢铁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制造设备和 2 万多名工人在卡内基钢铁公司日夜不停地运转、工作。卡内基钢铁公司的钢铁年产量超过英国全国的钢铁年产量，每年的收益高达 4000 万美元。

安德鲁·卡内基在事业上大获成功，可是在生活上，他是失败者。亲人和朋友陆续先于他去世，对他打击甚重。

几次沉重的打击促使卡内基开始深思人生和财富。关于财富，早在 1866 年 12 月，年轻的卡内基就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人生必须有目标，而赚钱是最坏的目标。没有一种偶像崇拜比崇拜财富更坏的了。”1890 年问世的《财富的福音》，更体现了卡内基对财富的系统思考。彼时的卡内基，坐拥巨额财富却忧虑不安，他希望给财富找到一条出路。在《财富的福音》中，他分析了三种财富的归宿，认为“最后只剩一种选择，就是把富人的巨额剩余财产在他们生前通过适当的运作用于造福公众的事业。”他还准确地为为富不仁者的下场作了预言，“总有一天，公众会给带着巨额财产死去的人刻上这样的墓志铭：‘在巨富中死去是耻辱的’。”

卡内基大概不会想到，他在无意中创造了“工具性捐赠”这个日后广为流行的概念。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卡内基坦言，他的慈善目标是通过规范的慈善行为实现系统的变革，这正是“工具性捐赠”的真谛。从这一目标出发，卡内基的慈善主要表现在兴建图书馆和创办大学。

从 1893 年开始，他开始零星捐赠。1900 年，卡内基更是宣布：“我不再努力挣更多的钱！”并把卡内基钢铁公司作价 5 亿美元卖给金融巨头摩根，开始了规模更加庞大的慈善捐赠计划。此后 6 年间，卡内基的捐赠额高达 7000 万美元。1906 年，他注册成立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该基金会

1910年资助对美国的医疗教育进行调查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医疗教育和医疗改革，推动建立了代表当时美国医学最高水平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10年，在自己75岁生日那天，卡内基宣布捐资1000万美元成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此外，他还有很多项捐赠。1911年，卡内基已经76岁了，还有1.5亿美元没有花出去。在好友罗拓的建议下，他把剩余的1.5亿美元的绝大部分拿出来，成立了“卡内基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增进和传播知识，并促进美国与曾经是英联邦海外成员的某些国家之间的了解。”

后来的无数慈善富豪，视卡内基为榜样和偶像，认同并实践卡内基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对财富进行合理的管理，富人和穷人之间应该是兄弟般的和谐关系。”有人戏称100年后在美国商业界和慈善界风靡一时的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等人为“卡内基的孩子”。

卡内基的慈善是有里程碑意义的。超级富豪慈善在他之前还不成气候，在他之后蔚然成风。卡内基基金会的成立，更标志着美国的慈善事业开始进入现代时期，各种慈善基金会开始争奇斗艳。

和卡内基同时代，无论光芒还是争议程度都远甚于卡内基的约翰·D·洛克菲勒，凭借自己一手打造的石油帝国，在19世纪末成为全球首位十亿美元富翁。从少年时代起，洛克菲勒就开始思考财富与责任的关系，从领到人生的第一份薪水起，他就固定地将其中的1/10捐给教会，直至去世。随着财富的急剧增加，他也感觉到了巨大的财富带来的沉重。他这样对邀请来的慈善助手弗雷德里克·T·盖茨吐露真言：“盖茨先生，我遇到了麻烦。面对各种资助请求的巨大压力让我无法承受。身负商业重担，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很好地回应这些要求。但只有当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些项目之后我才能放心地资助。现在，我花在这些事情上的时间比花在公司事务上的时间都多。我能做的就是要么转移部分负担，要么放弃慈善，但我深知我不能选择后者。”弗雷德里克·T·盖茨给老洛克菲勒回复道：“您的财富如滚雪球一般不断积累！您必须坚持慈善事业！必须以比慈善增长更快的速度捐赠！否则，您的财富将会压垮您和您的子孙后代。”老洛克菲勒听从盖茨的建议，开始从事更大的慈善事业，主要在教育和医学方面，同时也涉足科学、艺术领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两位20世纪初的全球超级富豪，竟因为慈善而结缘。阅读了卡内基1889年发表在《北美评论》上的《财富》后，洛克菲勒给卡内基写信，他写道：“我希望更多的富人参与到你的事业中，虽然现实并未如此，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大有作为，富人们更加慷慨地资助他人的时代指日可待。”

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成立，此时，洛克菲勒20年的慈善捐赠已是硕果累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是：“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比起卡内基基金会的宗旨，这一宗旨的全球视野要广阔得多。

老洛克菲勒对科技的发展颇为倾心，对那些天才般的科学家和潜力十足的项目，他会毫不犹豫

地答应捐赠，且往往会超额资助。有一年，在回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封 500 美元的资助申请信时，洛克菲勒信心十足地对他的慈善顾问说：“咱们给他 1000 美元。他可能会成就一番大业。”

和卡内基类似，洛克菲勒对财富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财富就会幸福的想法无疑是错误的。像我们这样的富人，从财富中获得快乐，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帮助他人的能力。”

洛克菲勒对中国颇为同情和关注，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建立的。

据统计，洛克菲勒生前一共捐赠了 5 亿 5 千万美元用于慈善事业。

如果要对卡内基和老洛克菲勒的慈善做一个小结，洛克菲勒的孙子戴维·洛克菲勒在《洛克菲勒回忆录》里的叙述无疑是最准确的，他写道：“有人说，祖父和父亲——以及安德鲁·卡内基——一起发明了现代慈善事业。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言过其实。他们两人所做的，是强调有必要调整慈善活动的方向，从医治社会问题的‘病症’转向理解并消除其背后的‘病根’。这种转变促使他们两人都欢迎科学的方法，支持在诸多领域里的专家工作。”

当然，客观来看，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都存在道德瑕疵。1891 年，卡内基名下的霍穆斯德钢铁厂的工人罢工，远在苏格兰的卡内基遥控着属下雇用了 300 名警卫，镇压工人的罢工行动，最终发展成一场血腥的武装冲突。对于洛克菲勒而言，除去他极尽各种商业手段打败对手，1914 年发生的拉德洛惨案，造成 45 人死亡，20 多人受伤，20 多人失踪，他也难咎其责。美国的慈善家就有这个特点，一边用各种商业手腕获取财富，有时甚至残酷冷血；一边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整个社会往善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名女性慈善家，塞奇夫人的慈善实践也格外动人。

1907 年，玛格丽特·塞奇继承了亡夫拉塞尔·塞奇的 6500 万美元遗产，建立了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它的宗旨是：“改善美国的社会和生活条件。”该基金会在老年问题、贫困问题、改善医院和监狱条件、劳工立法、推进医疗制度改革等领域颇有建树。它对 20 世纪社会科学的贡献尤其值得铭记，它发起了社会调查和分析，使社会科学得到长足发展。在与政府合作上，塞奇基金会堪称各类基金会的表率。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塞奇夫人为基金会选的格言是：“你为你最不幸的兄弟所做的一切都等于为我而做。”

卡内基、洛克菲勒和塞奇夫人对慈善的探索和实践具有启示性意义，一时间，美国慈善事业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1913 年，美国开征个人所得税，4 年后，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赠可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达 15%，鼓励民众捐赠行善。这项法律对美国的慈善事业影响巨大，有人这样评价道：“这项法律反映了美国人普遍相信：支持私人慈善应该得到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由是观之，富豪们争相建基金会做慈善，一方面确实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推动政府

对政策进行优化。

从1907年塞奇夫人建立慈善基金会开始，到1929年，据统计，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超过300家。有学者这样总结这一时期的慈善基金会：很少见到资本在1亿美元或1亿美元以上的新的大型基金会。而那些资本在30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之间，规模相对较小的慈善基金会，它们的数目确实增加了。

大萧条和“二战”，使美国的慈善基金会遭受重大打击，纷纷寻求自救自保，要么削减项目，要么停止设立新机构。在一片哀嚎声中，也有一些基金会逆势而生。

1930年，凯洛格基金会成立。“二战”后，该基金会开始兴旺，此后几十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1999年的资产近64亿美元。凯洛格靠经营早餐起家，当时人称“玉米片之王”。凯洛格本人对慈善怀有理想，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天赐我以大笔财富能够用于帮助别人，而我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忠实的管家。”早在1927年，他就自己工厂的女工工作区域设立了托儿所，建立儿童医疗中心，并配备一名营养师。大萧条期间，他非但没有裁员，而且还增加新雇员，并积极帮助家庭负担重的员工。

1932年，一位78岁的老人，从连续担任了12年的美国国家财长的职位上黯然离开，他就是安德鲁·梅隆，一位由商入仕的天才投资家。由于在“大萧条”前夕制定了不合理的税收制度，美国经济出现了难以收拾的惨痛局面。危机爆发后，虽然他聪明地通过慈善捐助转移视线，以个人名义给音乐学校的学生捐赠钢琴、给聋哑儿童收容院提供资金，以期挽救自己的信任危机，但愤怒的美国人没有原谅他。从他离职之日开始，就不断遭到“税务审讯”。

1935年最后一天的下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会见了80岁的安德鲁·梅隆。梅隆向罗斯福表达了想在华盛顿修建一所大型美术馆的想法，且承诺自己愿为之捐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现金。他急需得到总统的首肯及国会的支持。他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得到迅速实施，此时的梅隆身患癌症，剩下的时日已经不多。罗斯福没有犹豫，立即全盘批准了他的计划。1937年夏天，浩大的美术馆工程开始动工建设，不久，梅隆离开了人世。临死前，梅隆将他的所有艺术收藏无偿捐赠给政府，且要求不留下任何个人印记。

天才总是异于常人，难以捉摸，卡内基、老洛克菲勒、梅隆，概莫能外。

大萧条后，美国政府对企业增加了税收，出于逃税的商业利益考量，一个日后在美国慈善界影响巨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成立了。成立之初，它只是个地方小基金会，资助范围非常狭窄，远不能和福特创立的汽车帝国相匹配。直到后来在老福特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精心打理下，基金会才骤然做大。1953年改组后，实力和影响力大增，其主要关注的焦点是：教育、社会科学、社会改良和种族问题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全球，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时也打响了一场漂亮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发动的。1940年，亨利·华莱士访问了墨西哥，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让他十分震惊：食物极端匮乏，很多人食不果腹。当时的情况是，墨西哥一半以上的小麦和部分玉米需要进口才能满足基本供应。亨利·华莱士回到国内后，旋即约见了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的雷蒙德·福斯迪克。副总统向福斯迪克描述了墨西哥人民的悲惨生活，希望洛克菲勒基金会能为改变墨西哥普通民众的生活做出贡献。那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致力于贫困地区疾病的治疗，饥饿问题当然也会引起疾病。

于是，194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达成协议，共同启动了“墨西哥农业项目”，开启了“绿色革命”的大门。之后的20年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墨西哥培养了700多名农业专家。1956年，墨西哥实现了粮食自给。

20世纪50年代后期，福特基金会也加入“绿色革命”。后来，“绿色革命”的“战火”从墨西哥燃烧到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所到之处，建农业大学、农业研究所，培养优良品种，当地的粮食紧缺问题都得到很大改观。在这场“革命”中，一位名为博洛格的科学家的贡献尤其重大，被人们誉为“绿色革命的缔造者”，他也因此荣获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绿色革命”后来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地球人口越来越膨胀的时代，它解决了全球上十亿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基本粮食需求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喧哗躁动的社会空气中，一项致力于缩小教育鸿沟的慈善项目——“儿童电视工作坊和芝麻街”诞生了。当时，除了一档针对学前儿童的“袋鼠上尉”外，美国没有其他儿童电视节目。福特基金会作为美国教育类电视节目的主要支持者，关注的焦点是成人教育。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做出点改变了。最后，由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联手资助儿童节目的制作，公共广播公司和美国教育办公室也随即参与进来。1969年11月10日，芝麻街首次在公共电视频道播出，很快风靡全美，研究表明：观看芝麻街的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

“儿童电视工作坊和芝麻街”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始作俑者的意料，它创造了儿童教育的新模式，它是一个以小博大的经典案例，起到了杠杆作用，这种效果是慈善家们梦寐以求的。

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二战初期的美国发轫，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70年代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科技在不断寻求新的突破，慈善事业也在努力地寻求新的增长点。

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端到高潮，再到今天，美国慈善主要有两个群体在推动。一个群体是那些在硅谷的IT公司里敲打着电脑的科技天才，以及和这些IT公司相伴相生的风险投资家；另一个是那些坐在华尔街的摩天大楼里，指挥着全球金融帝国的金融家。

1977年，在硅谷，惠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从CEO的职位上退休了，并转身走进慈善。他们把科技创新的思维引入慈善事业，引领了硅谷企业家的慈善风潮。而在东海岸的华尔街，一位金融大鳄也正在默默地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1978年，人到中年的乔治·索罗斯正在经历“中年生活危机”，彼时，他已经是1亿美元基金的管理者。一次在大街上心脏病发作的经历，突然令他对财富产生了怀疑，“它值得么？我要这些钱究竟做什么？”于是，他成立了慈善基金会。日后他坦言：“我知道我真正关心的是整个社会。”

除去硅谷和华尔街，“真正关心社会”的人大有人在。1979年，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尤努斯，创办了格莱珉乡村银行，开始为贫困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业务。他延伸了企业的边界，发展了“社会企业”。他的理念是“慈善事业的资金是受资源限制的，而商业企业没有那么脆弱。”这意味着，把商业理念引入慈善领域，不失为一种好的尝试。如今，人们正在就此作出越来越多的探索。

也就在索罗斯建立基金会那年，比尔·德雷顿创办了阿育王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和培育社会企业家。德雷顿不仅在改变着传统的商业模式，还在改变着商业世界的缔造者，很多人对比尔·德雷顿的事迹震撼和感动，纷纷投身到创办社会企业的大潮中。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这样描述“德雷顿们”：“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

这么多人推崇德雷顿，意味着德雷顿的方法代表了慈善的一个新动向，这个新动向就是：社会企业家创办社会企业改变世界。

“社会企业家”之上，其实涉及一个更宏大的命题——社会创新。“社会创新”是被誉为“慈善资本主义教父”的德鲁克在1986年提出的。晚年的德鲁克，以管理学大师的敏锐眼光，观察到了公益创业的兴起。有人这样评价德鲁克在社会创新上的贡献：“德鲁克帮助形成了慈善、资本主义和宗教的混合，而这种混合是非常奇异的，但它也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

所有的现象和趋势都表明，“慈善资本主义”的时代到来了，它的含义是：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

20世纪末至今，得益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体。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一方面为自己在全世界赚得盆满钵满而欣喜不已，另一方面却又为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而忧心忡忡。对财富有社会化视野展望的富豪、对社会有担当感的名人，不约而同达成共识：整合手中的资源，利用财富的杠杆效应，让慈善最大限度地发挥力量。他们是新的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历经几百年，很多慈善方式在美国和全世界已然无效，慈善也的确急需创新。这些新的慈善家

要“用做商业的方法做慈善”。很多慈善家借鉴经商的方法，或者称之为慈善资本主义的方式做慈善，成绩斐然。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正式产生。公益创投的最大特点是，捐赠者会广泛参与到所选择的受捐赠者的决策过程中，这和一般的慈善捐赠有质的区别。

1989 年，社会企业家温迪·柯普创办了非营利组织“为美国而教”，该组织从美国一流大学招收毕业生，组织他们到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这其实是一种缩小信息鸿沟的做法，后来的比尔·盖茨，在美国捐建数字化图书馆，初衷和“为美国而教”类似。“为美国而教”大获成功，现在，它的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它的成功，离不开一家名为“绿色回声”的创投基金的支持，这是一家由查克·费尼创办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专门为社会企业家提供原始资金。

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曾在 30 年前提出“公益风险投资”概念——一种敢于冒险并承担风险，对一些不受人重视的社会事业进行融资的方法，终于在此时得到发扬。若要追根溯源，公益风投由美国半岛社区基金会在 1984 年实践，其初衷是将企业创投的做法运用于公益事业中。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公益风投开始和硅谷的风险投资搭界。此后，公益风投愈发盛行。

1998 年，硅谷社会风险投资基金成立，它是久负盛名的硅谷社区基金会有一个创新性分支，目标是向新富裕的高科技企业家和其他人展示如何成为有效的慈善家。它试图为那些拥巨富而不捐者提供一个可以学习和了解同行的网络，为他们提供慈善模板。此前一年，桌面出版之父保罗·布莱内德创立了社会风险投资伙伴。

更为著名的是 2000 年由马里奥·莫尼罗创立的公益风险投资伙伴。早在 1992 年，莫尼罗有了足够多的财富之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了慈善。他观察到，在自己的故乡，随着制造业的衰退，原来的工人阶层的移民邻里关系已经被破坏，因此，他决定从学习和社区两个方面突破，用自己的力量扭转家乡的衰败。1994 年，莫尼罗创办了莫尼罗研究所，专门研究互联网和网络经济如何带来积极的社会变迁。至 2007 年，莫尼罗已经将公益风险投资伙伴的第一笔共 3000 万美元的大部分进行了投资。莫尼罗的方法是将资金、专家和个人强有力地结合起来。不过，在美国，最成功的公益风投机构应该是克拉克基金会，它每年的公益风投资金达 2500 万美元，投资的项目多数获得极大成功。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纽约商机基金也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公益创投机构，其特点是呼吁美国富人投资一些生产且低价销售给发展中国家急需商品和服务的新生营利性组织。从低价助听器、低价眼镜到低价蚊帐，应有尽有。

在私人、基金会对慈善进行大力创新的同时，企业作为慈善主体在慈善领域异军突起。

早在 20 世纪中期，随着通用电气基金会、IBM 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企业基金会建立，企业就开始意识到基金会可以向利益相关方传达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以达到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的最大化。

1998年初，eBay上市的前一年，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达和杰夫·斯科尔带着100万美元即将上市的公司股票，敲开了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大门，把这100万捐给了基金会。一年后，基金会出售这批股票，套现4000万美元。从那时起，奥米达和斯科尔走上了慈善之路。

2004年，奥米达建立了奥米达网络，集中精力支持小额信贷的发展。那年11月份，奥米达和尤努斯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奥米达认为，与尤努斯的格莱珉乡村银行非营利的模式相比，奥米达网络运用营利的方式进行小额贷款，可以更快地让更多人摆脱贫困。尤努斯反击道：“人们是应该赚钱，但为什么要赚穷人的钱呢？”

同年，斯科尔创建了“帕提森媒体”，专注于制作具有社会意义的营利性电影，提出“改变世界，一次一个故事”的宣言。

无独有偶，另一家伟大的互联网公司——谷歌，也于稍晚些时候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早在2004年，谷歌准备首次IPO时，它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就宣布成立公司的慈善部门——谷歌公益。布林认为：“一家成功的公司除了要不断增长之外，还担负着更重大的责任。”谷歌上市后，向谷歌公益捐出1%的股本，2007年市值20亿美元，以及1%的公司年度收益，并贡献员工1%的工作时间。

此外，通用公司已经在支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投入颇多，进行一个名为“绿色创想”的项目；沃尔玛发起了“超越汽油”的环保项目；思科尝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信息科技教育，以填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要想在未来取得更大成功，就必须在社会责任上领先于民意。

除了慈善资本主义、社会风投、富人慈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时代还值得关注的慈善热点是名人慈善。

在美国，名人慈善的传统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名人慈善风潮的发轫期。电影明星马龙·白兰度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决定将自己收入的12%捐给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支持金博士的事业，此前，他就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资救济难民。

进入21世纪，名人慈善在美国愈发盛行。当然，名人做慈善，除了在金钱上占优势外，最重要的是天然的影响力。他们不但可以用自己的财富做慈善，也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利用自己的个人品牌为慈善事业募款，以达到安吉丽娜·朱莉所说的：“大家听我的”之效果。

朱莉称得上是美国最著名的名人慈善家之一，从2001年她给阿富汗难民捐了100万美元后，她在慈善上倾注的心血越来越多，2005年，她为美国国家难民与移民儿童中心捐赠50万美元，2006年，她和丈夫布拉德·皮特联手成立朱莉—皮特基金，她捐出了自己年收入的1/3，截至目前，这个组织已经为各类慈善机构捐赠了上千万美元。

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早在1998年就建立了“奥普拉天使网”，致力于激发全世界的人都去帮助那些深处贫穷境遇之人。2004年，她访问非洲的同时，为55000名儿童捐钱、书本和衣服。截至2005年，她的慈善捐款已经超过3亿美元。2007年，奥普拉又出资4000万美元在南非建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女子领袖学校。

克林顿从美国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后，靠在全球各地演讲和做咨询挣了不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慈善家。他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他在募款中意识到和其他慈善家联合会使慈善效益最大化。克林顿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不过更为瞩目的是他的全球倡议（CGI）。过去的几年里，全球倡议募款达几百亿美元之巨。克林顿全球倡议的目标是：“给人们提供一些渠道，同时也给那些想捐款的人一个讨论的平台。但这不是光说不练，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仅要讨论一些事情，我们还需要知道能够干什么，同时来参加的人都应该承诺做些什么。”从2005年起，每年9月，克林顿都会邀请企业家领袖、社会活动家参加全球倡议大会，共同探讨慈善之道。克林顿的倡议无疑是成功的，仅2007年一年，就有600多个慈善项目的认捐。毫无悬念地，克林顿成为全球最有募款能力的前国家政要。克林顿对认捐的项目有严格的监控管理，一旦认捐者没有完成认捐项目，不被邀请参加下一届“克林顿全球倡议”即是对他的惩罚。当然，树大招风，克林顿的高调慈善也引来一些争议，有批评家认为，克林顿在慈善事业上的投资和商业行为之间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

名人慈善如此耀眼，且成绩斐然。正如一些人所说，当后人回顾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们也许会把它称之为“名人慈善时代”。

这个时代，比名人慈善更为耀眼的是富人慈善。

当然，富人慈善，有时会遭遇尴尬。正如罗伯特·布莱姆纳所说：“我们期望富人慷慨，否则会批评他们吝啬。不过，当他们捐赠时，人们却会怀疑他们的动机，谴责他们获取财富的方式，质疑他们以慈善之名获取功名。”伟大的慈善家是这样应对质疑的：对它置之不理，遵从自己的内心，只管做好自己的慈善。

理查德·布兰森，既是商业天才，也是慈善明星。2007年，他创立了人道主义组织“长者会”，这个组织里的人都是全世界最有名且德高望重之人，曼德拉、克林顿、尤努斯等都是其中的一员。此外，布兰森还向气候变化发出了挑战，承诺未来捐出30亿美元用于发展非碳燃料。

乔治·索罗斯在慈善上从不走寻常路，这和他的投资理念相符。索罗斯的慈善事业起步很早，不过直到1992年9月，他做空英镑后，他和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才被世人所熟知。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大力支持非民主国家的民主组织机构，为他们开展活动提供经费，当然，他的基金会也投入巨资关注教育问题，并在东欧预防和抗击艾滋病行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在美国，相对于其他慈善家，索罗斯在慈善事业上的确是个异类，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慈善事业：“我热心致力于政治性慈善事业，

设法利用金钱来影响政府如何花钱。”

新晋富人的慈善手笔也令人刮目相看。1984年出生的 Facebook 掌门人马克·扎克伯格于 2010 年 9 月 24 日在奥普拉·温弗里的节目中宣布，他将捐资 1 亿美元以帮助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其实，仅 2012 年一年，他就捐赠了 5 亿美元。

纵观美国慈善，最大的玩家还是比尔·盖茨，特别是巴菲特给了他 300 多亿美元后，可以说他是在运作一个慈善帝国了。很多人不会想到，比尔·盖茨这个今天的慈善大亨，在 1997 年 CNN 的创始人特德·特纳宣布给联合国捐款 10 亿美元的讲话中，曾被点名批评是“为富不仁”。特纳对盖茨的批评可能不那么客观，1994 年，盖茨就出资 9400 万美元作为老盖茨的威廉·盖茨基金会的启动资金。2000 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注资 210 亿美元。几年后，盖茨和妻子梅琳达打破了以往的慈善捐赠记录，宣布捐出 160 亿美元。2006 年，盖茨基金会把慈善资助领域大致限定在三个领域：全球健康、全球发展，以及美国国内的不平等。

作为这个时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盖茨认为，慈善家投入教育的钱和政府相比微不足道，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有所作为的话，就要有所创新。他道出了当今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

布隆伯格肯定会非常赞同盖茨的观点，他是纽约市市长，同时也是位大富豪。他建立了自己的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最新动向是出资 1 亿美元，培育一种不会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这样大胆而新奇的慈善计划，很可能会遭遇失败，政府当然是不愿承担这种风险的。然而，很多慈善项目必须有人带头去突破，这个重担，只能由慈善家来承担。正如布隆伯格所说：“创新可能意味着，你在做一件结果不很明朗的事情，你不知道它将以何种方式呈现，你甚至不知道如何操作，如何推销。你也不能从中赚到钱，但是你必须努力去做。”

慈善如何更加有效？一代又一代的慈善家们为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到硅谷的 IT 天才，再到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今天，站在慈善巨人的肩膀上，一些有效慈善的经验、理念和方法呈现出系统化的态势。除去有效慈善的具体内容，基金会本身是否有必要永久存在，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例如，存在了 30 多年的文森特·阿斯特基金会已于 1996 年寿终正寝。围绕一家基金会是否有必要永久存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有永久存在的必要，还是应该给基金会设定寿命年限？

反对永久存在的声音可谓言之有理。“公众面临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大量而直接的帮助，因此，我们需要用我们手中的钱解决当代人的问题，而将以后要解决的问题留给下一代人。”

从公众的利益角度来讲，否定永久性基金会似乎也很有必要。建立永久性基金会，会大大减少基金会当下可以直接使用的资源。更为关键的是，永久性基金会的存在会使上层社会经济阶层攫取

对整个社会的永久控制权。

然而，永久性基金会的支持者的呼声同样掷地有声。“只有拥有无限期限的永久性基金会能凭借其长远眼光，通过长期的研究和探索来解决那些持续存在的社会问题。”“只有永久性基金会才会利用现世资源为解决未来问题做准备。”“永久性基金会还在稳定社会、遏制激进主义、引导缓慢变革而非突然变革方面起重大作用。”

从对社会政策有利的角度思考，永久性基金会给民众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它带来的社会机会成本。另外，美国政府曾承诺鼓励建立多元的公民部门，由是观之，富人建立永久性基金会应该被允许和鼓励。

现在，是否需要建立永久性基金会的争议仍在继续，慈善家们的“上下而求索”也将继续。真理将在争议中逐渐浮出水面，其他所有和慈善有关的争议亦然。

不过，所有的争议都是值得的，它们必然将更好地推动慈善发展。

21 世纪已经过去了 12 年，美国慈善的一些新趋势正在悄悄地发生。慈善捐赠将会显著增加，慈善的形式将会在 20 世纪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将成为慈善的主流。

未来，慈善将更加大有可为，它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时代发展方向，它会为世界带来更多更好的改变。

来源：中国慈善家

地址：http://www.icixun.com/html/view_314.htm

[【返回目录】](#)

美国大学募款之道

1638 年，年仅 30 岁的约翰·哈佛（John Harvard），从英国移民到美洲新英格兰查尔斯城不到一年，就患上重病。哈佛没有子嗣，身边只有新婚不久的妻子相陪，他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兄弟、一个姐姐均早于他离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哈佛，本来希望到新大陆当一名牧师。

临终之际，他立下遗嘱，将自己半数的财产 780 英镑和所有的 400 本图书，捐赠给从他住处可以遥遥相望的查理斯河对岸的一所学院——当年政府给学校的拨款也仅仅是 400 英镑。那所成立不久的学院，校长恰好是哈佛在剑桥大学的一位校友，他们以前经常一起聊天，说起“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节衣缩食，办一所大学，让我们的后代从欧洲教育的终点开始”。

1639 年 3 月，校方决定，将这所未正式命名的学院命名为哈佛学院。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前身。

哈佛大学出了6位总统和30多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或许都曾驻足于哈佛的坐像之下，抚摸他那铮亮的左脚…

“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美国慈善捐助教育的传统自此开启。

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说：“大学是人类的最大创新之一，通过大学，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是，这个可以创造更好未来的“创新”事物，需要靠大量的资金才能维持运转。利用社会力量募集兴学资金，成为哈佛大学乃至全美大学办学的一大特色。

哈佛募款之道

在美国大学年度社会捐赠排名榜上，哈佛大学总是位居榜首，遥遥领先。

作为有着丰厚家底的私立大学，其运行的年度开支传统上主要依据大学的永久捐赠基金。

1994年，由于资产增值速度赶不上运营开支增加的速度，哈佛大学一度出现“财政赤字”，为此，哈佛大学决定开展一轮为期5年的筹款运动，筹款目标为21亿美元。

1999年底，大筹款运动圆满结束，实际取得26亿美元的成果，超过原定筹款目标24%，比起1984年结束的3亿美元筹款业绩，这是一次历史性突破。巨额捐赠来自174378个人或机构，平均每笔捐款13000美元，平均年度获得捐赠高达5亿2千万美元。时任哈佛校长陆登庭（1991年～2001年在任）称这次筹款成绩“在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建立了又一个里程碑”。

此后，哈佛大学逐渐将每年募款目标提升到10亿美元以上。

这种筹款能力，除依靠学校影响力以外，很大程度上是由哈佛大学的校长当家制决定的。

哈佛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7人董事会，以公司命名，由校长、财务副校长、三个著名商界人士、两位著名教授组成。董事会规定，谁当哈佛大学校长，任务之一是每年必须组织募集到10亿美元的办学资金。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不仅要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极强的管理能力和个人魅力，还要具备有效进行筹集资金的能力。校长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能否做好筹款者这个角色密切相关。美国教育理事会主席罗伯特·阿特维尔说：“在私立大学，集资活动是家常便饭，不容喘息，如果你是私立大学的校长，对你的评价是你的集资情况怎么样。”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陆登庭，作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杰出的募款人，有“募款大王”的美称，他曾在6年之内向1715万人募集捐款26亿美元，平均一天100万美元，创下了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新记录。

陆登庭说，教育经费不足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难题。在任哈佛校长期间，他将筹措经费列为自己最重要的一个任务，而且感到很不容易。

谈到筹款的秘诀，陆登庭说第一要利用校友会。哈佛毕业生有30多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对母校很有感情，学校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计划告诉这些校友，获得帮助。在每年一度的校友返校庆祝大会前，哈佛校长站在会场入口同排队入场的校友们逐一握手寒暄，笑容可掬地给每人送去几句亲切问候。这次活动往往就是校友捐款的高峰。

二是哈佛有一个由300多人组成的筹集资金的专门组织。

三是校长每年要进行旅游和演讲，让有可能提供资助的机构和个人了解哈佛的计划和目标。

美国的许多著名大公司和各界富翁名流，都纷纷慕名向哈佛大学慷慨解囊，如美国的微软公司总裁，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两年后，一次性为其捐资2000万美元。

对于大型的捐赠，学校会授予捐赠者一些荣誉称号，这些称号将被载入史册，对捐赠者产生精神上的丰厚回馈。

哈佛大学校园里的教学楼、宿舍、图书馆、博物馆等建筑，大多是私人捐献的，并镌刻着捐献者的姓名。

据统计，为哈佛大学募捐的各种基金会多达7700多个，是全美大学中获得捐款最多的大学。

捐赠缔造大学

依靠捐赠创建大学的情形，在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就开始，那时各个学院都利用与英国富商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进行募捐活动。最初的捐赠可以说是通过刺激富有捐赠者的荣誉感实现的。各大学将捐赠者的名字作为永久纪念，直接满足了捐赠者个人的虚荣心和荣誉感。

殖民地学院吸引私人捐赠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学院通过学校的选址而获得大量捐赠和援助，如新泽西学院选址普林斯顿、女王学院选址新布伦瑞克，都获得了当地的大量捐赠。一些学院（包括耶鲁学院、罗德岛学院）通过向捐赠者授予各种名誉学位而吸引捐赠。罗德岛学院在以授予名誉学位获取捐赠未产生实效后，又搬出其特许状的规定，将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校名作为条件吸引捐赠。

依靠私人慈善捐赠，一批服务于殖民地的学院先后建立，并为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向高等教育提供慈善捐助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并深深植入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

1804年，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的人捐给罗德岛学院5000美元，以便在该学院设立一个教授席位。同年，为了纪念尼古拉斯·布朗对学院的慷慨捐赠，罗德岛学院正式改名为布朗大学。

1843年，一生未婚的服装零售大王保罗·杜兰（Paul Tulane）捐资创办了杜兰大学。

1876年，同样未婚的巴尔的摩银行家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捐出700万美元，均分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这在当时的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仿照德国大学模式，成为当时西半球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

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夫妇的独生子因为伤寒而在佛罗伦萨不幸夭折，他们夫妇为了纪念小儿子，1891年共同捐资建立了小利兰·斯坦福大学。

也许受了朋友利兰·斯坦福的启发，没有后代的地产大亨乔纳斯·克拉克（Jonas G. Clark）1887年创办了克拉克大学。

西联汇款的创始人埃兹拉·康乃尔（Ezra Cornell）跟同为参议员的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于1865年共同创立康乃尔大学。

19世纪在美国出现了一个以商人、金融家和实业家为主的新兴精英阶级，其巨大的财富使他们有机会通过慈善事业实现自己新颖的教育理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通过个人奋斗而致富的，没有接受多少正规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古典教育。因而，他们对古典教育十分反感和不满。他们希望转变现有的院校或建立新的院校，以使这些院校更加积极地满足他们提出的现实要求。

这时的慈善家希望用自己的捐赠支持大学的实用教育，在其捐赠意愿或遗嘱中明确规定捐赠必须用于自然科学等实用学科的训练与指导。

同时，许多通过经办实业致富的慈善家认为，财富并不能使人感到快乐和满足，只有利用财富做善事才会使自己感到踏实。这一观念促使许多实业家纷纷参与慈善事业。

实业家劳伦斯（Abbott Lawrence）对哈佛大学的科学教育项目表现出极大热情。依靠劳伦斯的捐赠，哈佛大学设立了动物学和地质学教授席位。

实业家谢菲尔德（Joseph Earl Sheffield）向耶鲁的科学学院提供了巨额捐赠用于基建、设备购置以及设立教授席位。基于他的慷慨捐助，耶鲁董事会于1861年将科学学院命名为谢菲尔德科学学院。

尽管当时接受捐助的主要是应用科学，但随后商业和贸易管理也得到讲求实际的慈善家的资助。费城制造商约塞夫·沃顿（Jos. Wharton）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提供大量捐赠设立了沃顿商学院。今天，沃顿商学院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最优秀商学院之列。

慈善捐赠还开创了其他大学的高等商业教育。

1898年，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向芝加哥大学资助了几百万美元建立商业管理学院；1900年，纽约市的一群商人资助纽约大学成立了商业、会计和财经学院；爱德华·图克（Edward Tuck）资助达特茅斯学院；阿莫斯·图克资助经济管理学院；哈佛大学则从银行家兼实业家乔治·贝克尔（George F. Baker）那里获得了500万美元开展经济管理研究生教育。这些捐赠拓展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范围，使学生获得了适应美国工商业发展的实用技能。

1900年，安德鲁·卡内基致信给政府，愿意出资100万英镑建一所技术学院。后来政府在肖莱

公园附近划出 32 公顷土地建成了卡内基技术学院。

1903 年 4 月，卡内基捐献了 1000 万美元，向 92 所院校的教授提供退休养老金。

1920 年之后，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重点开始转向，集中于对特定项目的资助，几乎所有的项目都试图转变高等教育传统的教学功能，强调学术调查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出版。

20 世纪 50 年代后，企业也逐渐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捐赠。这一数字 1953 年为 0.7 亿美元，到 2004 年则达到 44 亿美元，在整个大学捐赠收入中占 18%。

在众多的慈善基金会中，1913 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906 年成立的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07 年成立的塞奇基金和福特基金会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最为突出。1997 年至 2004 年的八年中，美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基金会 372.3 亿美元的捐赠。2001 年，超过 9/10 的基金会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捐赠，总金额创历史新高达到 73.4 亿美元。

根据 2011 年在《美国教育纪事》发布的《对高等教育的私人捐赠列表》显示，盖茨千年教育计划在 20 多年中捐赠现金将近 10 亿美元，排名第一位。

来源：腾讯公益

地址：<http://gongyi.qq.com/a/20130319/000020.htm>

[【返回目录】](#)

六个改变世界的青年公益组织

美国慈善组织 DoSomething.org 周二在有线电视台 VH1 上选出了 2012 年有所作为大奖（Do Something Award）的获奖者。

改变世界绝非易事，而这些年轻人正通过发明新产品或新服务来帮助他人，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尽管作用有大有小。美国慈善组织 DoSomething.org 周二在有线电视台 VH1 上选出了 2012 年有所作为大奖（Do Something Award）的获奖者。只有一位赢家可获得 10 万美元项目资助，但所有这 12 个入选项目都足以成为创业者的榜样。

不少名流也因参与慈善事业而获得表彰。出席颁奖仪式的明星包括：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克里斯汀·贝尔（Kristin Bell）、赵耀翰（John Cho）、奥利维娅·玛恩（Olivia Munn）、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和小哈利·沙姆（Harry Shum）。

DoSomething.org 专注于缔造一个“庞大而有趣的运动，鼓励青少年采取行动解决他们关注的

问题。”过去一年来，共有 220 万年轻人参与了其组织的活动，我认为这证明了该组织促进青少年参与慈善事业的模式起到了效果。该组织今年将提供总计 60 万美元的奖学金。一些年轻人试图通过“创造”或调整某种事物的方式来解决问題。

下面介绍的是五个最终入围者，不过另外七个进入“半决赛”的项目也值得关注。

苏丹人道援助 (Humanity Helping Sudan)

曼杨·里斯·科赫 (Manyang Reath Kher) 是“苏丹的迷途男孩” (The Lost Boys of Sudan) 的一员——约 2 万个男孩因战争而成为孤儿、流离失所。他启动了苏丹人道援助项目，致力于通过提供渔网、农业项目和社区菜园等方式帮助苏丹难民，覆盖了 4 万个难民。

艺术食粮 (Art Feeds)

梅格·伯恩 (Meg Bourne) 缔造了艺术食粮组织，为残疾或经历过创伤的儿童提供创造性的理疗与鼓励。伯恩的家乡密苏里州乔普林遭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龙卷风之一，受到很大破坏，她的艺术食粮项目发挥了很大作用。她现在与超过 800 名志愿者一起工作，服务于逾 8,000 位儿童。

共同崛起 (Together We Rise)

丹尼·门多萨上大学时发现，他的 9 岁堂弟罗杰 (Roger) 无家可归，生活在一辆汽车里。给他的小堂弟找到真正的住房之后，他采取行动缔造了共同崛起组织，致力于帮助被寄养的孩童自行作出选择。通过音乐课程、学习辅导、体育锻炼和简历写作等方式，他们为被寄养的儿童提供所需资源，使其 18 岁之后失去寄养家庭资助时仍可能取得成功。

教育缔造未来 (Educate2Envision)

凯蒂亚·戈梅斯 (Katia Gomez) 充分发挥了自己对教育的热情，组建了非政府组织“教育缔造未来”，为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洪都拉斯儿童提供教育。他们在三个边远社区工作，迄今为止已帮助了超过 450 个儿童，彰显了中等教育能为他们带来的机会。

解渴计划 (The Thirst Project)

塞斯·马克斯维尔 (Seth Maxwell) 创建了解渴计划，鼓励年轻人共同努力，增强人们对全球水危机的认识，并拿出解决方案。通过知识宣讲和水井挖掘，解渴计划已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 788 个淡水开发项目，并用相关教育活动开阔了 25 万个美国学生的眼界。

半决赛入围者

另外七个项目同样值得人们花时间关注，或许还值得为之捐赠。它们虽入围有所作为大奖的半决赛，但已没有获得奖金的机会。

这七个半决赛入围者中有一个项目是我的最爱——

全民手工 (NationWares)

艾米·赛德尔 (Amie Sider) 出生于危地马拉的一个边远渔村，她母亲生了 18 个孩子，为了生存被迫贩毒、犯罪和卖淫。刚满 16 个月的艾米有幸被一个加拿大家庭收养，摆脱了极端贫困的生活。艾米希望他人能像自己一样幸运，她创建了全民手工组织，为那些因身体或精神残障、感染艾滋病毒或极端贫困而原被认为不能雇佣的人士提供工作机会。该组织目前在 10 个国家运作，雇佣了 850 位当地手艺人，其中许多原来都是社会弃儿，而今却成了所在社区备受尊重的领袖。——摘自 DoSomething.org 网站。

改变世界看来仍是可能实现的，只要你知道谁在创造未来。DoSomething 组织与这些未来行业领袖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实现了巨大效益。只有一位赢家能为其项目获得大额资助，但所有这些人都有理由感到骄傲：这就是创造者的光荣所在。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地址：<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208/0019488.shtml>

[【返回目录】](#)

志愿活动影响力评估方案

那作为公益机构，如何身先士卒，在志愿者管理上展现你靠谱专业的一面？

有着成熟公益环境的英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着深思熟虑的。2004 年，英国志愿服务研究机构 ([Institute for Volunteering Research](#)，以下简称 IVR) 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实操方案——志愿者影响力评估工具包 (Volunteering Impact Assessment Toolkit)，用于指导公益机构自行对志愿者项目进行针对性、可量化的影响力评估。

在具体实施评估过程中，志愿者影响力工具包建议公益机构对四类志愿者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展开调查，包括“志愿者本人、服务机构、机构受益人和其他社会利益相关方”。调查的影响力范畴覆盖因志愿者项目所产生的“生理、人性、经济、社会和文化”多方面的变化。调查方法以问卷填答为主。针对上述四类利益相关方各方面的变化，都提供了“核心问题”和“选答问题”两类填答信息。如果公益机构希望对某些具体问题展开更细致的评估和分析，工具包中还提供了包括小组座谈会、志愿者日记等更丰富的方法指导，以结合机构特质了解具体志愿者项目的影响力程度。

听起来如此复杂的事情，你可别以为是闲的无聊的时候随手做做。致力于志愿服务研究和推动的 IVR 多年研究指出，好的志愿者影响力评估体系可以帮助公益机构：

1. 充分了解志愿者项目的成效，明晰其中得失，以在未来针对性调整
2. 向出资人公允证明志愿者服务项目效果，为志愿者项目寻找新的募资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明
3. 给辛勤投入的志愿者一个靠谱的答复，让他们也了解自己的付出价值所在
4. 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关注志愿服务，并产生兴趣投身于此

这么有价值的一件事，听了以后你一定动心了吧。别捉急~还得说两句“泼冷水的话”。

第一、你机构中的志愿者服务项目一定是推动机构发展的，最好还是较长期持续的。如果只是偶然找俩志愿者来帮忙整理整理文件这种，我想……还是不用这么大张旗鼓的测评了

第二、你的英文能力还是要不错的，没办法，毕竟是洋机构的方法包，暂时还木有中文翻译版

第三、你得会基本的数据收集、分析和统计技术，工具包再全面，机构个性化的信息还是需要自己参悟呀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你得有耐心。联络各种人士填答问卷、收回结果，不是随时做做就行的。要知道光操作手册就有 130 页哟

第五、天下木有免费的午餐，研究成果更是宝贵。这套工具包（含指导手册、CD-ROOM）需要 35 英镑购买……

如果上述要求你都满足，而且信心满满打算尝试一下，恭喜你，能做你所在机构的志愿者一定是件很幸福的事。

不在大不列颠群岛范围内，我们没办法体验到 IVR 定期举行的有关志愿者影响力评估的培训和分享会。不过可以多多关注创思客，说不定很多和你一样读了这篇文章的朋友正也跃跃欲试要尝试，也许我们可以组成我们自己的分享会，找到咱们自己的志愿者影响力评估体系呢。

来源:创思客

地址: <http://www.thinker360.com/page/3736>

[【返回目录】](#)

后金融危机时代 挣扎的华尔街慈善业

金融危机之后，慈善组织的捐助者基金会一直在压缩开支。2011年花旗集团的基金缩减了60%，减到115000美元；荷兰国际集团（ING）基金会延迟支付承诺给Operation Hope的300,000美元；CIT，一贷款集团，曾是该组织最大的捐赠者之一，则完全停止捐赠。

“这些公司并没有意识到，像他们有工资和租赁款一样我也是有工资和租赁款的，”约翰·霍普·布莱特说，他在洛杉矶当了六年的银行家后创建了Operation Hope机构。

虽然华尔街已经从金融危机的深渊里缓慢地回复过来了，但是那些依赖这个行业捐款的非营利组织仍在苦苦挣扎。随着全球市场的动荡以及面临经济加倍衰退的威胁，许多大银行都捂着自己的现金或重新考虑自己的捐赠策略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手中的美元。

但是潜在捐助者的联营也还没有完全恢复。雷曼兄弟公司，在2007年给慈善组织捐赠了3900万美元，一年后申请破产了；美国银行，2008年同意收购美林证券公司，于去年捐了2.08亿美元的慈善款，根据由“慈善事业编年史”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2007年，两家公司共捐赠了2.44亿美元。

虽然一些忠诚分子，如高盛捐出的款额更多，但是他们也在动摇他们的慈善计划。随着银行把现金转到含有公司名称方案的出台，一些慈善伙伴关系就已经结束了。

“华尔街不断变化的赠款性质已经触及到了非盈利性世界的许多角落里。虽然公司的捐赠款占整个慈善业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2010年金融公司占企业现金捐赠款的很大一部分，约为21.1亿美元，根据“鼓励企业慈善促进委员会”的统计，这是一个得到各行业支持的旨在促进捐赠的组织机构。

回调是带有融资倾向的慈善团体最大的问题，比如象那些给低收入借款者提供咨询或培养有抱负的企业家的慈善机构的问题一样，华尔街历来是这类机构资金的主要来源处。

承担着学生的金融扫盲项目的SIFMA基金会的捐款，在2009年从470万美元降至400万美元。由于其掌握的资金较少，基金会削减了36%的助学金，减到420000美元。该基金会是华尔街的一个贸易集团，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的慈善部门。

虽然Operation Hope在2009年收到了创纪录的捐赠款，但在2012年早些时候其资助款下降了20%。反过来，该集团不得不动用储备金以实施失去了融资的项目，裁员14人而且在六月份关闭了其波士顿的咨询中心。

在一个削减成本和裁员的时代，华尔街的慈善事业是一个微妙的平衡行为。如果捐赠得太少，银行会被称为贪婪；如果捐赠得太多，会危及账户底线。

在 2009 年破产发生后，CIT 集团不得不缩减其慈善捐款。虽然这个金融公司仍然保留着一个企业的捐款部门，但该部门把钱发放给非营利机构时就像老大哥和老大姐施舍一样，而且它已结束了与其它几个机构，包括 Operation Hope 的联营关系。

其它的金融公司都在削减给非营利组织的较少数的大支票，而这一趋势成为整个企业景观。摩根士丹利的捐款从 2007 年的 5430 万美元下降到了 2010 年的 4670 万美元，根据慈善事业编年史的统计。美国银行，在经济危机的黑暗日子里其慈善捐赠小幅回落，预计今年他们的融资持平。

由于兼并和破产，慈善业也要努力从签订了合同的捐赠者基金会里争夺钱款。

SEO 集团 (Sponsors for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为少数族裔学生提高的职业生涯预备课程，2006 年的现金非常充足，收到了来自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公司和雷曼兄弟的捐款。在积累了 1000 万美元之后，该集团买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那个壮观的办公场所。

然后捂紧了口袋。自从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合并以来，这个非营利组织现在只收到一张来自美国银行数目较小的支票。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该组织就完全失去了来自雷曼兄弟的资金。

雷曼兄弟为斯贝尔曼学院提供的赞助款也蒸发了，这是一所位于亚特兰大的妇女文科学校。该学院从未收到过为金融业更多毕业生准备的 1000 万美元中的 700 万美元的资助款，这是 2007 年 10 月宣布的一份礼物。

一些金融公司给他们的员工提供的是计费时间，而不是资金昂贵的学习项目，这代表了一种更广泛的企业趋势。所以非营利性组织正在收到所谓的大量的非现金捐助，包括给首次购房者提供咨询的志愿者。

在过去的三年中，摩根士丹利的员工们捐献了近 15000 小时的免费建议给三十几个非营利组织，包括主教团社会服务机构，它是纽约寄养儿童和无家可归人口的机构。Operation Hop 利用来自银行及其它公司的 15000 名员工给市内的学校提供金融扫盲课程并给许多成人提供信贷咨询服务。

尽管许多公司正在紧缩开支，但是华尔街里一些实力最强大的公司实际上花在慈善上的钱更多。摩根大通的礼金，从 2009 年的 1.04 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 1.85 亿美元，根据慈善事业编年史的统计。高盛在 2010 年捐给非营利组织 3.15 亿美元，超过它前年捐赠的四倍。

但即使这些最强大的银行加大了他们的慈善力度，然而仍然有些银行偏离了对多种杂项业务的支持而专注于品牌的创新上，如高盛的 10,000 家小企业项目或摩根士丹利的全球儿童健康联盟。通过建立显著突出公司名称的内部慈善项目，银行可以专注于他们的捐款并仔细监控实施结果。

一些金融高管承认，与华尔街许多情况一样，捐赠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盈亏的问题。那些就他们的捐赠方案向银行咨询的公司说，潜在的员工和客户在申请工作或考虑把他们的钱投资在在哪里的时候会越来越地询问银行的捐赠项目，因此，增加慈善捐助实际上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

“这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而且也没有什么错，” Tiller 公司，一家给大型企业的慈善捐赠方案提供建议的咨询公司的创始人罗布·邓森说。

布莱特先生，对捐助者基金会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最近重新改造了他的董事会会议室场地来突出慈善的经济效益。

现在，他强调 Operation Hope 如何运作，它管理着资金管理的免费课程，并旨在通过一对一的辅导授课来提高信用评级，这样将增加银行的消费客户。今年，在与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该银行公园大道总部长达一小时的会议上，布莱特先生探究了经济的黯淡状况以及 Operation Hope 的金融扫盲工作。

改造会议室场地的债务就要还清了。布莱特先生，Operation Hope 的首席执行官，一年的收入大约 30 万美元，表示说他与七家金融机构的生意快要议妥了，这些机构允许他雇用更多的人。

“我们感觉不错，”他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能够迅速恢复过来。”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html/view_492.htm

[【返回目录】](#)

跨代社区：邻里关系亦能有效助人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新建了一个专门接收年长者入住的社区，并让他们在这里帮助年轻夫妇抚养社会上的寄养儿童。当琳达·科曼奈琪(Lynda Komanecky)得知这一消息时，她知道，这就是属于她的地方。

“我当时的感觉是，终于有个地方能让我有所贡献了。”今年 65 岁的科曼奈琪去年春天从伊利诺斯州的家中搬到了此处名为“桥梁牧场”(Bridge Meadows)的社区，她说，“我有许多爱心需要释放，我想这些孩子们会需要。”

“桥梁牧场”，开办于 2011 年，是三代不同年龄居民的家——像科曼奈琪一样的年长者，他们可以在此用每周 10 小时的志愿服务换取低廉的房租价格；无家可归的寄养儿童；还有在逐步学习照顾儿童的家庭。

“桥梁牧场”的执行总监德兰达·舒伯特(Derenda Schubert)介绍说，该社区的理念非常行之有效，因为它回应了居民的不同需求。

“这里的年长者都似乎肩负使命，感觉自己是被社会需要的。这样一来，这些年长家庭得到资助，孩子们也得到爱心和照顾。”她说，“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收到了难以置信的正面成效。”

建立邻里关系

类似“桥梁牧场”的这种模式，其中的组成元素能够帮助所有类型的弱势群体，包括负伤退伍军人和后天残疾的成年人。随着住房市场终于在近年回暖，这类社区也看到了扩展的机会。

“我相信这是 21 世纪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以往传统的社会服务并未能真正填补这些需求。”希望世代发展集团(Generations of Hop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是第一个启动这类项目的公司，该集团的执行总监布兰达·艾哈特(Brenda Eheart)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社区是如何运转的。所有年龄段的居民在其中彼此熟识，并且互相关心、乐于互助。这就是我们想创造的一种氛围。”

持这种理念的先行者如今已经得到赞许。本月，马萨诸塞州东汉普顿(Easthampton, Mass.)的跨代社区“树屋”(Treehouse)的创始人朱迪·库克顿(Judy Cockerton)因她的杰出工作贡献，得到了来自 Encore.org 网站的 10 万美元的奖励。这一年度性奖项的得奖者均为 60 岁以上、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创新途径的长者。

此类跨代性解决策略也得到了众多捐赠者的资助，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凯洛格基金会(W.K.Kellogg Foundation)和亨氏家族基金会(Heinz Family Foundation)。2007 年，凯洛格基金会向希望世代捐赠了 770 万美元助其在美国 18 个州开展这种模式。

“我们经常资助那些修补社区问题的社会服务项目。”回顾这些拨款，凯洛格基金会前任项目总监陈泰德(Ted Chen)说，“通过这种投资，我们实际在尝试另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想知道这种在社区内自然结成的邻里关系是否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人。”

陈泰德说他对凯洛格基金会支持的创新途径保持继续的支持态度。但从社区组织者的角度出发，传播这种理念并不是易事。

除了对预期的承诺外，搭建这样的社区，从图纸开始就要经历各种挑战，如筹集资金、购买用地及其产权，还要创建支持这些社区运作的机构。

所有年龄

诸如“桥梁牧场”、“树屋”等类似社区，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94 年。当时，身为伊利诺斯州大学社会学家的艾哈特，在该州兰图尔市(Rantul)废弃的空军机场原址上兴办了“希望牧场”社区(Hope Meadows)。

她预见了一种原滋原味的社区是一种满足两种截然不同类型人群需求的途径。大部分的寄养儿童都曾经遭受冷遇和虐待，而年长者也时常感觉被这个崇尚年轻精神的国家所抛弃。

如今，“希望牧场”已经成为了一个蓬勃向上的跨代社区，48名超过55岁的长者、36名儿童和14名父母在这里和谐相处。

更值得一提的是，艾哈特理念的成功更可从伊利诺斯社区长大的寄养儿童的学业成就上可见一斑。所有“希望牧场”的寄养儿童都成功地取得了大学或同等学历，而美国全国的寄养儿童大学毕业率仅为30%。

“当你能为寄养儿童创造一个安全和稳定的成长环境，他们定会在其中绽放。”艾哈特说。

她相信，正如年长者在“希望牧场”中对寄养儿童未来成功起到的关键作用一样，这些人也必定能在照顾负伤退伍军人、后天性残疾或自闭症儿童和刑满释放母亲等项目中成为“稳定性因素”。

服务退伍军人

在新奥尔良州，希望世代发展集团正在为戴兰·泰特(Dylan Tete)提供咨询服务。后者是一名伊拉克战争的退役军人，他希望创建一所能够聚集年长者、遭受严重脑部创伤的军人及其家庭的社区。这家名为“堡垒”(Bastion)的社区，将会从一家老海军后勤基地的基础上重建，并成为155名居民的归宿。

“从前线被迫退下的老兵很有可能无家可归、被纳入收容机构甚至自杀。”泰特说，“有太多的军人家庭最终只落得妻离子散。而这个社区则能够保持他们的家庭完整，并让服务时刻围绕在他们的周围。”

泰特对跨代理念的热衷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他从战场上归来时，虽没有身体创伤，但心中却是伤痕累累。

在经历长期的抑郁后，他最终转向国家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寻求帮助。然而，最终帮他走出低谷的却是自己参与的一次年度性的夏令营活动。在活动中，他志愿帮助因战争而失去父母的孩子培养乐观的情绪，从而使自己也得到了解脱。

“这让我有勇气继续活下去。”泰特说。

“堡垒”社区仍处于规划阶段，一家监管该社区运作的非营利机构刚于上月成立，但该社区的理念已经吸引了美国社会的高度关注。

“堡垒”社区得到了来自鲍勃·伍德夫基金会(Bob Woodruff Foundation)10万美元的资助，后者由2006年在伊拉克战争中严重受伤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前线记者所创立。

独立生活

在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黑德岛(Hilton Head, S.C.)附近，则有另一家社区在展开活动，他们专门接收有成年残疾人的家庭。

这家名为“鱼鹰山庄”(Osprey Village)将自己称为“受目的驱动的社区”，它的目标是帮助这些

成年残疾人尽可能地依靠自己生活，当然，这个社区中也有其他居民作为志愿者为他们提供帮助和关心。

这家非营利机构正在谈判以购买布拉夫顿(Bluffton)的一片土地，以便为有特殊需求的居民和 16 户家庭修建 6 处居民楼，以及为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年长者修建一所集体公寓。

“鱼鹰山庄”的创始人之一大卫·格林(David Green)本身就是一名 30 岁残疾青年的父亲，他说该社区的理念来自于确实的需求。

如今，已有 2500 名成年残疾人在这家社区的等待入住名单上进行了登记。

格林说：“如果您是一名残疾儿女的家长，你会止不住地问自己：如果我不在了，我的儿女该如何是好？”

改动太多

当“堡垒”社区和“鱼鹰山庄”均承诺扶助弱势人群的同时，他们也在搭建社区的过程中面临了严峻的挑战。

“有太多的地方需要修改——就像下象棋一样。”格林说。

“鱼鹰山庄”的最大挑战在于资金，6 年前成立的这家社区几乎已将当时筹得的项目款项消耗殆尽。

如今他们仍需要 700 万美元来购置用地和修建设施，除此之外，运营费用也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

在项目的初始阶段，他们曾经向国家申请一部分联邦农村发展资金，而剩下的不足部分则期待由企业赞助来补充。

一年前，这家社区开办了一家二手商店以帮助节省开支，它也曾数次举办募捐活动并从当地的一家社区基金会获得过一笔资助。

然而，“鱼鹰山庄”并不是唯一一家在规划阶段就承受资金压力的此类社区。

希望世代发展集团向旗下项目内的居民收取的费用大概是每年 8000 美元，要远低于传统社会服务类慈善组织和政府机构开出的收费。

然而，它的多项使命——服务年长者、寄养儿童、负伤军人等，却通常没有办法取得众多基金会的青睐，这些基金会所自主的项目类型通常都极其有限。

当然，政府提供的资金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财政鸿沟。比如，“桥梁牧场”和“树屋”的建立，都离不开联邦税收的减免和房屋补贴。

建立董事会

艾哈特的机构也经常向一些有前途的跨代社区提供财政和管理上的扶持，她说她的团队经常收

到来自对“希望牧场”有所耳闻的人的问询，这些人希望能够创立属于其自身的理念，但却缺乏所需的技术和支持。

“其实说白了，你需要一个工作团队。”她说，“不能只是一个人在努力。”

一个有计划的社区需要有其组织架构，其中包括一个公益性的机构来监管项目，以及一个汇集众位成员的董事会，他们需深谙募款技巧、熟知政府项目，并在如何帮助有特殊需求的人群方面有深厚的知识。

举例来说，“桥梁牧场”的董事会中就有之前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寄养儿童，以及有收养儿童经验的家长。

“我们深刻感觉到需要听到真实的需求声音。”舒伯特说。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3-03/19/node_15.htm

[【返回目录】](#)

可乐生命：一个公益项目的“寄生”史

1988年，英国国际援助人员西蒙·贝瑞(Simon Berry)在非洲大陆开展工作，他将当地两组看似毫不相关的现象不经意地联系在一起，却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其一：在赞比亚的偏远地区，所有家庭都是依靠耕作勉强支撑生活，许多因病死亡的儿童染上的是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比如腹泻引起的脱水。

其二：就是在这些经济极不发达的田间地头，你却总能想办法买到一瓶可口可乐。

身为一项英国援助计划技术执行官员的贝瑞，对这两组现象展开了大胆的联想——可口可乐强大的配送网络是否能够被用来向援助罕至的地区投放最基本的、但却有可能挽救生命的药品？

20年过后，在多方力量的配合下，贝瑞和妻子珍妮(Jane)终于开始回答这个多年以来的设想，他们的解题方式是建立了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可乐生命(ColaLife)。他们的做法是利用可口可乐的配送渠道搭运所谓的“社会化产品”——防脱水的口服液、补锌营养片、水质净化片，在发展中国家内承担起向最后几里路进发的使命，从而挽救当地儿童的生命。2008年这一年，据联合国估算，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每7名儿童中就有一人在5岁前夭折。

一个天才般的设想

最初，贝瑞的设想是，取出货箱上的一瓶可乐，把一个装有以上物品的瓶子插入原位。但是珍妮却有另一番打算，这位在赞比亚度过无数漫漫长夜的女性“长期从有关国际发展的书中探究众多初衷甚好的项目为何最终驶离正轨”，她向贝瑞问道：“你为何不利用没有被占用的空间？”

于是，“援助匣”(AidPod)便由此诞生，这是一个形状经过设计、耐挤压、能够紧紧地安插在可乐瓶颈部间的盒子，而一个标准的可乐箱能放下10个这种“援助匣”。“我们所做的就是利用没被占用的空间，让这些关键性的物品和可乐一道出现在它们能到达的地方。”贝瑞说，“我们只是搭乘方，有能力把货物分配到偏远地区的人们不是我们。”

这真是个巧妙的想法，也正是这份巧妙让“可乐生命”在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上赢得了数以千计的支持者，贝瑞也因此于2010年受邀前往柏林发表一次TEDx演讲。但这个想法真的能实现吗？“我们不想只作为这个好主意的发起者，我们想亲手把它变为现实。”他说，“所以我们在2010年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投入全部精力促成一次试验性的行动。”这次试验的地点还是放在非洲的赞比亚，但同样也能对亚洲起到指引作用，因为在亚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也有相当多外界难以到达的地区，在那里，儿童夭折率的降低也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之一。

一个强大的品牌系统

“劝说当今世界最大的饮料公司把别家的产品放到它的货箱中，哪怕仅仅是让对方对此做考虑，都是长足的一步。”贝瑞这样说道。可口可乐体系，是一部在一个世纪以来都运转完美的庞大机器，在它市场所遍布的200多个国家中，可口可乐唯一做的几件事就是生产软性饮料、拥有旗下品牌和批准制造商在当地生产。有将近300家地方性的瓶装合作伙伴在实际生产和配送可口可乐的产品，销售地点则遍布全球——超市、电影院、餐馆、街边小贩——基本在有人们聚集的地方，可口可乐就会出现。可口可乐称，全球每日消耗掉的公司旗下产品就达17亿件。

“可口可乐配送链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从制造商到批发商这一块，而是从批发商往后的这一段。”贝瑞说，“在后面这一段中，是各种微型商人的天下——骑摩托车的青年、往面包车上搬可乐箱的妇女，等等等等。而这正是我们想借用的一段。”

多方位的支持者

“可乐生命”的这场试验将贝瑞夫妇带回到了赞比亚，这个启发了他们行动的内陆国家。然而，贝瑞的第一站却是随同两家支持者在另一个国家——法国进行游走，为前往赞比亚征得6000英镑的行程费用。这其中的关键一方是可口可乐在赞比亚当地的生产商——赞比亚酿造厂(Zambian Breweries)，它是全球领先的酿造企业英国南非米勒酿酒公司(SABMiller)的旗下分支，而这家全球企业则一直致力于兑现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承诺。英国南非米勒酿酒公司的加盟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把‘可乐生命’的理念扩展到全球。”贝瑞说道。

“可乐生命”在赞比亚的其他伙伴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赞比亚国有医药销售企业“医疗连锁有限公司”(Medical Stores Limited)。一家名为“赞比亚守护者基金会”(Keepers Zambia Foundation)的 NGO 则负责在当地居民区做知识普及工作,按贝瑞的话说,就是“为我们将要发放的套装制造影响和认知度”。“可乐生命”计划向 30 个居民区内的母亲和儿童监护人发放至少两万份“援助匣”,而这些计划内区域的居民每天的生活开销都只在 1-2 美元之间。

“这些地区人烟稀少,医疗设施的补给尤为稀缺。”贝瑞解释说,“赞比亚全国只有 70 家登记在册的药店,而且全都集中在较大的城镇。”但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偏远地区,小卖部却随处可见,他们出售生活基本用品——洗衣粉、食用油、饼干、香烟,当然,还有可口可乐。所以,这些小卖部应该可以被用来发放医疗产品。

“援助匣”中可以搭配各种产品,其中一样就是补锌的营养品。腹泻儿童服下这种营养品后,可以缓解病情的症状和发病周期,如果发放到位,每年最多能在全球挽救 40 万名 5 岁以下儿童的生命。“可乐生命”在赞比亚的合作方希望通过发放治疗腹泻的套装(ADK)来测试这种搭运的理念。“我们希望得到有意义的的数据。”贝瑞说,“我们在试验阶段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要挽救儿童生命,更要测试出我们是否能够利用可口可乐的销售链来进行配送,让人们在腹泻来临时能在家中或者离家很近的地方拿到我们的套装。”

透明公开的创新也促使“援助匣”在不断进化。如果采用透明的 PET 树脂材料包装,“援助匣”还可能被用于太阳能净水。把这种 PET 外包装放到污水中并在太阳光照下放置 6 个小时,紫外线便能彻底杀死水中导致腹泻的病原体。出于成本考虑,贝瑞搁置了这种想法,但是瑞士水科技联邦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Aqua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仍然向他寄来了一个水净化的包装样本,大小和形状与“援助匣”一致。

“可乐生命”募集了 135 万美元的捐款用以启动这次试验,试验在 2012 年年初开启。在第一批的捐助者名单中便有来自强生公司的企业公民信托基金(Corporate Citizen Trust),该基金代表强生集团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等地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保证创新成功的模式

试验的结果是成功的,不但如此,他们还对“援助匣”的形状做了进一步的改造,使其更好地利用货箱的空间。截至目前,“可乐生命”已经生产出了约 3 万个抵抗腹泻的套装,而其中有 1 万 4 千个已经送到了当地居民的手上,平均每天会有 100 个家庭受惠于此项计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可乐生命”的套装对于减少儿童因脱水及腹泻的死亡率有很明显的助益,也是推广公共卫生观念的好工具。

作为总结,“可乐生命”的成功源自好的创新主意、社交媒体的传播和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三

者缺一不可。Facebook 和 TEDx 等媒体担任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让“可乐生命”在过程中可以得到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强生集团的援助，而“可乐生命”也利用了多种网络媒体随时更新工作状态，让关心的人能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可口可乐对于这项能提升企业形象，又不会增加额外成本的计划，给予支持，并推荐了适合当地的物流方式。其他合作伙伴如赞比亚政府、医疗连锁有限公司的大力倡导，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成果做评估和追踪，并在实行过程中不断地给予反馈，才使得“可乐生命”能不断地改善产品设计、制作流程和商业模式。

“可乐生命”在赞比亚的试验阶段尚未对使用者收取费用，现仍靠着捐款及政府补助在运作。若能成功的话，他们也会试着把“援助匣”授权给其他非营利组织或商业机构，以收取一定费用来维持整个组织的运作。

未来他们则希望能把这个成功的模式套用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正如同可口可乐的口号“下一站幸福将在哪里？”一样，现在的疑问就是：“可乐生命”的下一站将在哪里？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7065>

[【返回目录】](#)

把设计思维带入公益世界

过去 20 年间，设计公司艾迪伊欧（IDEO）帮助过诸如苹果、福特、美国银行等公司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现在，这家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公司成立了一个非营利分支，将其创新方法带进慈善业界。

作为新的慈善努力，早在 2011 年 10 月，IDEO.org 正式启动，并独立于公司近些年的非营利工作。

派翠丝·马丁（Patrice Martin），IDEO.org 的创意总监说，艾迪伊欧设计思路的起点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产品的最终用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愿望——而非建立一个有关用户需求的假设。往往，公司或机构从可行性开始思考的过程，但她认为，“除非你所创造的东西是设计所针对的人群真正渴望的，否则就毫无意义。”

“更有尊严”

去年，这家设计公司开始为一家在伦敦的公益组织“城市贫民饮水和卫生（Water & Sanitation for

the Urban Poor)”与联合利华开发一项业务，这项业务为加纳的城市居民提供新的卫生产品和服务。在来到这个西非国家进行考察期间，公司的顾问们与多种类型的潜在用户进行访谈，比如妇女、户主、教师、劳工、老人、残障人士等。

据“城市贫民饮水和卫生”组织的项目协调员安迪·那拉科特（Andy Narracott）所说，这些顾问们询问了一长串问题。

其中一些问题非常私人化：他们的家庭挣多少钱，他们做什么工作，家中住多少人，家里有没有厕所，他们现在购买什么卫生产品或服务。

有一位接受访谈的妇女甚至问她的访谈员：你为什么要大老远从你的国家来了解我家厕所？

那拉科特说，大多数公益组织也许会这样回答：“因为厕所对你的健康有好处，而我们愿意来帮助你。”

相反，他说，顾问之一回答这位妇女，他们是和联合利华公司一起来的，他们想创造一种人们会很乐意购买的卫生用品，而且也能改进人们的健康。

“在我看来，这样做比传统的（公益界的）方法提供了更多的尊严。”那拉科特说。

测试创意

在掌握了客户的需求后，艾迪伊欧开始编排选项，开发样品以供测试。

IDEO.org 的马丁（Martin）说，“这并不一定是准备进入市场的解决方案。相反，这是某种看起来像是我们尝试创造出来的经验。我们收集用户的反应。我们看有用的是什么，没用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工作。”

在若干轮的重复后，艾迪伊欧为加纳的这个项目开发了一种便携式厕所。“城市贫民饮水和卫生”组织现在正在运行一个为期六个月的服务测试，出租这种厕所，并每周收取费用以回收废弃物。试运行从 20 名客户开始，他们第一个月的服务是免费的。测试开始两个月后，全部 20 名客户都同意购买这种服务，通过公益组织的努力又介绍了更多的客户。

那拉科特说，这种测试项目为他的小组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财务信息，可以用来为这项服务开发商业模式。

培育天赋

IDEO.org 启动了一项伙伴计划，以在公益界推广公司的设计方法。

在 11 个月期间，伙伴们——5 人来自公益界，3 人来自艾迪伊欧——将一起在 IDEO.org 为公益界设计产品，包括农业、金融服务、健康，以及其他领域。

这个主意是希望公益界的伙伴们能够带着新的技能回到慈善业界，而艾迪伊欧的人则能带着对公益界问题的新理解，回到自己的公司。

“我们把设计与社会部门整合在一起了，”马丁女士说，“我们看到那些正在解决最棘手的挑战的人们如何工作，而我们带来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创意，然后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

深入了解：想了解如何在自己工作中应用艾迪伊欧设计原则的慈善组织，可以免费下载“以人为本设计工具集”，由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国际援助小组原创撰写。此外，开放艾迪伊欧（OpenIDEO）是一个在线的平台，人们可以合作开发新的创意来解决困难的社会议题。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3-03/19/content_5478.htm?div=-1 [【返回目录】](#)

遗产税如何撬动美国慈善

遗产税不只是“杀富济贫”那么简单，它已被广泛认可为美国民主、经济和社会的调节器。

不交给国家，就做慈善吧

你肯定知道，美国第一位十亿富豪是约翰·D·洛克菲勒，但你可能不知道，当约翰·D·洛克菲勒去世时，他个人财富的 70% 被美国政府以遗产税的名义征收。有人替老洛克菲勒鸣不平：“哎，一生的辛苦钱只留给子孙 30%！”

美国遗产税首次开征于 1797 年，但作为一项正式税收制度被固定下来，是 1916 年。

经历了 19 世纪的工业大发展，那些大工业巨头们乘自由市场经济之风扶摇直上，美国政府为防止出现欧洲国家那种世袭的贵族，对待遗产税比较苛刻，不到 1 万美元就开始起征，而且税率很高。在 20 世纪上半叶，遗产税最高税率一路上涨。

1916 年遗产税税率为 16%，到 1935 年最高税率达到 70%。后来几经调整，又有所下降。

遗产税相当不利于富翁们把万贯家产留给下一代。2000 年遗产税规定：遗产在 65 万美元以下的免征遗产税。据统计，当时约 98% 的美国人财产都不超过这一界限。遗产税只对超过的部分征收，税率以递增方式计算，共分 17 个档次，税率最低为 18%，之后每个档次以一万美元或两万美元向上递增，税率也以 2% 或 3% 向上攀升，最高档为 300 万美元以上，税率高达 55%。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留下了 200 多万美元，真正到后人手中的不过一半左右。

让富人头痛的不止上述一条，这美国税法还有一条规定：遗产受益人必须在继承遗产前，先交纳遗产税，然后才能办理遗产手续。

例如，在纽约长岛有一座美丽的庄园，原来是美国总统希思福家的豪宅。房子依山傍海，花木葱茏，现在变成公共博物馆，就是因为希思福的子孙不争气，拿不出钱来缴纳遗产税，这种豪宅短期内又卖不出去，只好将祖宗辛苦建起的家园捐献出去。

再比如，比尔·盖茨如果没有把全部财产 580 亿美元捐赠掉的话，他的子女想要拿到这笔天文数字财产，先得交 319 亿美元的税。同时还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两税相加，达到遗产价值的 70% 以上。

好在美国税法还有抵税条款。美国从 1913 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仅仅 4 年后，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赠可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达 15%，借此鼓励民众捐赠行善。1935 年，美国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但同时允许公司用捐款抵税。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可抵税比例维持在 50%，企业的这一比例则为 10%。

巨额财产税、捐款抵税制双管齐下。做慈善既规避了遗产税，又得了名声，还抵了部分个人所得税，谁不愿意呢？

巨富们为什么反对降低遗产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遗产税税率曾大逆转性下降。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了政府福利政策与私人公益捐赠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模式，政府在福利事业方面唱主角，私人基金会退居辅助地位。1977 年以后，全球兴起减税浪潮，发达国家首脑达成一致共识：为促进经济发展，必须降税而非增税。里根总统一上台，一手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一手大幅度削减遗产税，前者使得慈善事业少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后者减少了企业主为公益事业捐赠的动力，慈善遇到了寒冬。

到了 21 世纪共和党小布什上台，更是力挺减免遗产税，制定了 10 年减税法案。根据法案规定：从 2002 年到 2009 年，美国遗产税的税前综合扣除额将逐步增加：2001 年为 67.5 万美元，2002 年增加到 100 万美元，2004 年增加到 150 万美元，2006 年增加到 200 万美元，2009 年增加到 350 万美元。与此同时，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将逐步下降：2001 年为 55%，2002 年降低到 50%，2003 年降低到 49%，2004 年降低到 48%，2005 年降低到 47%，2006 年降低到 46%，2007 年降低到 45%。2010 年停止征收遗产税 1 年。2011 年将遗产税恢复到 2001 年的状况。

布什和拥护此政策的一派认为，高额遗产税对通过个人奋斗而积累财产的人不公平，有损美国社会和经济活力的基础。

此项制度最大的受益人无疑是美国顶级富翁，但他们却成为最强有力的反对者。120 名顶级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以广告方式刊登请愿书，要求国会继续保留遗产税。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的父亲等都是强烈抵制免税政策的急先锋。

沃伦·巴菲特更是义正辞严道：“这是绝对愚蠢的做法。废除了遗产税，将使国家出现财富贵族，

意味着某些人将根据世袭而不是根据才干来掌握国家资源。”

他们认为，这一免税政策只能使美国百万、亿万富翁得利，而损害那些入不敷出的穷人。政府因此而损失的亿万税收，不是靠向支付能力更弱的人征税来弥补，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医疗保障、环境保护和其他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的政府项目。特别是取消了富人向公益事业捐献的一大动力，将减少私人公益事业的收入。遗产税对慈善捐赠一向是一大促进力量，而免去这项税收将对慈善事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对美国的民主、经济和社会都不利。

美国的富豪对国家和社会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他们受惠于这个时代和这种社会制度，自然对它们感激不尽，最好的回报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此外，美国崇尚个人奋斗，不像其他一些国家尊崇世袭的爵位和财富。很多通过艰苦创业而成功的美国企业家不相信财富可以传代。他们知道，金钱很多时候不但不会给孩子带来幸福，反而有可能对孩子带来伤害，让他们丧失了体验真实生活的权利。

现在，在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富豪加入了“捐赠誓言”，他们将在有生之年捐出自己的至少一半财富。

来源：腾讯公益

地址：<http://gongyi.qq.com/a/20130322/000011.htm>

[【返回目录】](#)

◎企业社会责任

想过做 CSR 吗？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英文简称，大多数人对此的理解可能就是“慈善或者公益”。这理解没错，只是 CSR 现在所包含的东西已不止这些。

“企业已经从单纯做慈善转向可持续发展思维，以及如何共同创造价值。”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可持续发展副总裁张华莹说。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设立 CSR 部门，“公司希望借此能创造并提升沟通、管理以及品牌的价值。”吴佳伦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她是立邦中国公关及企业品牌传播总监兼企业社会责任常务委员。

对很多公司人来说，CSR 则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职业选择。一方面很多大公司都有这类人才需求，一方面可参考的岗位却几乎没有，对于它是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都了解有限。

就职场结构而言，CSR 是一个统筹协调、推动管理的角色，这个职位涉及的工作内容包括环境、公益、安全、健康、劳工法律、员工关系等内容，几乎涉及到和公司内所有部门的沟通与合作。而一个项目的顺利完成还需要争取到外部社会资源的支持，比如政府和 NGO 组织，沟通就成为了这个职位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有效的沟通能力和沟通热情也成为了从事这份工作必备的条件。如果想从事这份工作，那你最好是充满 passion。

由于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此受访者的一个普遍共识是，CSR 的职业发展还未像其他成熟的职能部门那样，有清晰的晋升路径。但他们都对这个职位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而且，现在市场上做 CSR 的专业人才比较稀缺。这个工作的一个最大好处大概就是很容易让人获得成就感，并体味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财经周刊》在 2013 年 2 月底推出了“商业创新 50 人”评选，其中的一个奖项就是“CSR 创新者”，主要针对公司 CSR 项目的 team leader。我们对本次获得这个奖项的两位创新者，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张华莹和吴佳伦进行了一个深度回访，并采访了任仕达（中国）市场总监孙海宁，从职场角度为你解读 CSR。

A 工作内容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公司对这个类型部门的命名一般有两种，一些公司叫可持续发展部，比如可口可乐、拜尔；一些公司叫企业社会责任部，比如立邦、强生。在此，我们统称为 CSR。前者更关注环保或技术方面的议题，后者更强调直接跟社会大众的全方面沟通。但它们的工作内容大致相同，可以分为三大块：一是负责公司产品与人的工作生活之间的互动，比如如何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积极，这涉及到安全、健康、员工关系等；二是服务于某个群体的社区型服务，比如可口可乐的“520”项目，服务的对象是有意愿自主创业的妇女，而立邦的“为爱上色”项目服务的对象是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三是与环境保护相关，这往往需要通过创新来实现。

公司内统筹协调

CSR 的工作基本上是通过某个具体的项目来完成，但要做好一个项目通常需要公司内部各个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也就是说要经常和各部门的领导打交道。“我们要把可持续理念推广到公司运营中的每一个环节，这时候 CSR 部门就处于一个统筹协调者的位置。”张华莹举例说，如果要做绿色环保冰箱项目，那就要和技术部沟通保证冰箱质量，和采购部沟通保证供应，和市场部沟通设计冰箱的绿色环保标识，还要和运营部门合作与各部门一起安排市场投放。“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是 CSR 单独完成的，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公司其他部门进行沟通，然后你还要一直盯着。”张华莹说。

在立邦，同样是如此。吴佳伦把 CSR 定位为“推动和管理的角色”。“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了解公司的整体业务，和相关的管理层沟通，制定目标并推动项目的完成。”

公司外获取资源

CSR 和公司外部的沟通也不少，主要是获取一些社会资源的支持，比如政府和各种 NGO 组织。“你要去想谁和你有共同的愿望，最想和你一样做成某件事。”吴佳伦说。比如说针对贫困小孩儿的公益项目，你就需要获得当地政府或希望小学的支持，而把女性作为帮扶对象的项目可以去争得和中国妇联的合作。

B 能力要求

Know-how

宏观来说，CSR 需要了解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议题，不同国家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政策，以及不同 NGO 组织的运作方式。微观来说，CSR 要清楚公司战略，对公司整体运营有一定的了解，熟悉各个部门的业务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CSR 需要掌握的 know-how 部分的知识比其他单一职能部门的多，需要知道的是综合性的信息。所以，很多公司的 CSR 部门更倾向于招聘有 NGO 方面工作经验，或者对环境项目有工作经验的公司人。

项目控制能力

CSR 的工作主要是通过项目来完成的，这就需要你要有掌控项目的能力。作为一个统筹协调者，要敢于引领一些方向。在了解公司战略和社会需求的情况下，通过娴熟的技术路线，去一步步实现项目的完成。所以，你要有战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沟通热情

这是张华莹和吴佳伦在采访过程中反复提及并强调的。CSR 不仅需要具备沟通的能力，还要有沟通的热情。她们说“没有沟通的热情，整个项目就没法推动”。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大家齐心协力帮你完成一个项目，那就要能够让别人心甘情愿配合你的工作。

研究精神和创造力

CSR 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要有研究和创新的精神，能够提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并且对社会有益的项目。对于一些全球性的项目，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做到因地制宜。对于公司内的一些既有项目，你需要思考如何能够做到更好。

高情商

这很难给出一个标准。但想想你要沟通的对象基本是公司高管或者说“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你差不多应该心中有数了。“不能硬干，要找到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吴佳伦说。也就是要会借力使力，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单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好的事儿。

全球化视野

CSR 的工作通常与环境和社会议题相关，这就需要你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了解全球性的话题以及

市场变化的新趋势。除此之外，目前设立 CSR 部门的公司基本是跨国企业，这同样需要你具备国际化的视野。

C 挑战与成就感

“和那么多不同的人去沟通，这本身就很有挑战性，”张华莹说，“比如你如何让人家在手上有 100 件事情都等着去处理的时候，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

CSR 面对的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被“质疑”。“当我跟技术部人员去沟通我们需要把一个绿色环保技术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的时候，可能会问到一些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吴佳伦说。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新的东西，必须知道比沟通对象更综合的信息。

除此之外，CSR 现在面临的一个职业发展方面的挑战是“当你要往别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别人可能会疑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吴佳伦说。

幸运的是，恐怕很少有职位能像 CSR 这样这么容易让人获得心理满足和成就感。但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社会公益和慈善，所以你很容易有幸福感。“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在做一些项目的过程中，你能够切切实实地看到你帮助了一些人，”张华莹说，“一个简单的感谢，都会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和意义。”

D 业绩评估

CSR 的工作主要以项目的形式展开，对其工作成果的评估也建立在项目的基础上。“一部分是看你对既有项目的推动，也就是你的执行力；另一部分就是你创造了多少新内容出来，也就是你的创造力。”吴佳伦说，在立邦公司，它们对 CSR 的工作同样采用 KPI 的考核方法，因此有很多可以体现为数字的评估方式。比如说你负责的某个公益项目覆盖到了多少所学校；对于需要更多员工参与的项目，你又鼓励了多少人参与其中；对于需要公司内多个部门配合的项目，你又和几个部门领导进行了有效沟通；你是否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政府、NGO 组织等的支持，以及你是否开创了一个新的并得到大家一致好评的项目。

张华莹也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踏实做好项目”。但她同时表示，有些项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看到明显的效果，比如可口可乐在全球的 520 项目，“这个项目会持续到 2020 年，每个国家都还在想这件事要怎么做，还远没有到衡量业绩的时候。”

E 职业发展

虽然 CSR 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的重视，但这仍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很多跨国公司也是近几年才在中国增设了这个部门，立邦在 2009 年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委员会，划入到品牌传播部下面。可口可乐在 2011 年 12 月在中国成立了独立的可持续发展部门。

从职场的角度来说，它还不算是一个成熟的职位，不同行业对这个职位的定义和描述都不尽相

同。目前看来，不管是在可口可乐，还是立邦，它的职业晋升路径都还不是特别清晰，还没有像其他职位那样形成一种结构化的模式，它们对此也都还在摸索当中。吴佳伦觉得如果是在公司内部的话，可以朝着品牌传播领导者的角色去努力，如果跳脱出来，那 NGO 组织是个不错的发展方向。张华莹说公司是从战略层面来建立这样一个部门。而且，“如果你能做好一个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那你以后做什么项目都不成问题，可以到各行各业去发展。”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成熟”意味着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人才的稀缺性也会随着更多企业重视程度的增加显现出来，吴佳伦和张华莹都表示，“未来，这方面的人才会很抢手。”

孙海宁

任仕达（中国）市场总监

C=CBNweekly

S=孙海宁

C：一般哪些公司或者行业会设置 CSR 这样的职能部门？公司希望它创造什么价值？

S：从规模上来说，主要是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从行业属性上来看，石油、化工、制造业、奢侈品、快消等行业设置 CSR 部门的比较多。它的主要价值在于维护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提升品牌美誉度。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所以银行，以及像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等都开始增设这样的部门或者专门让一些员工做这部分的工作。

C：这些年，CSR 方面的人才竞争状况如何？

S：现在来说，还不是很厉害，但市场上很缺做 CSR 的专业人才。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才刚起步。根据我们的调查，有 4 年至 8 年工作经验的慈善 / 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年薪在 36 万元至 86 万元之间。

C：对于想要从事 CSR 的大学生和公司人来说，您有什么建议？

S：一般来说，设有 CSR 这个职能的公司，企业规模相当可观，在雇主品牌上比较容易受到尊敬。

如果能够有机会体验这个岗位，需要将眼光放长远。这个职位的发展前景相当不错，如果做得好，可以做到公司战略层面，负责可持续发展、慈善基金管理等等。不少跨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后，都在寻求本土化的人才。它们比较青睐有商科背景、沟通能力强的候选人。但这是一个听上去比较抽象的部门，这意味着要做出业绩，你将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地址：<http://www.cbnweek.com/yuedu/ydpage/?raid=3025>

[【返回目录】](#)

环境责任险立法正在协商中

——保监会副主席：强制险从试点到全国铺开须走法定程序

针对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加快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简称“环境责任险”)立法,19日,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跟有关部门沟通协商;强制险要想从试点向全国铺开,必须走一个法定程序。”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了环境责任险的相关提案。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原总裁杨超建议,借鉴《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中规定建立强制性责任保险制度的做法,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性环境保护责任保险制度。民革中央提案呼吁,开展环境责任险立法研究工作,改变以往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污染、群众受损、政府买单”的状况。

对此,李克穆表示,环境责任险的难点在于,它能不能作为强制险去推广。环保部门坚持“强制”这一点,保监部门对此是比较尊重的,但到现在为止,法定的强制险只有一个交强险,全国强制推开需要慎重。李克穆指出,下一步将对环境责任险的产品设计进行完善,同时还要营造法制环境。

谈到“企业购买环境责任险是花钱消灾”的社会舆论和环保专家质疑,李克穆回应称,一方面,企业买了环境责任险,高水平的保险公司就会帮助监管部门去监督这个企业。另一方面,企业买了环境责任险,一旦环境污染事故爆发,保险公司的及时理赔能避免企业缺乏应急的治污资金,导致污染物扩散、污染程度加深。

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董波认为,环境责任险也有助于及时保障环境事故受害方的权益。

保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相关试点工作,投保企业达2000多家,承保金额近200亿元。董波透露,围绕今年初出台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目前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保部门和保监部门密切合作,正制定其实施细则。

今年“两会”期间,广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文提出,由于我国环境责任险覆盖范围小、保险赔付数额小,赔付范围窄,相关政策滞后,造成各方参与环境责任险的积极性较低。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吴焰则建议,建立环境责任险的保费补贴机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投保企业的保费补贴力度,对承保保险公司给予相关的税收优惠待遇。

“这是很好的建议。”董波对此表示,希望得到相关扶持政策,提高保险企业参与环境责任险的积极性,鼓励其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来源：经济参考报

地址：http://jjckb.xinhuanet.com/2013-03/20/content_434575.htm

[【返回目录】](#)

中国标准化协会联合海尔空调起草制定行业首个除 PM2.5 标准

两会期间，PM2.5 成为从基层代表到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热议话题，而其带来的健康危害更是备受瞩目。其中“PM2.5 或取代吸烟成为肺癌最大元凶”的报道更是引发了人们对洁净呼吸的强烈需求，除 PM2.5 将成为空气净化类产品新的市场增长点，相关标准亟需出台。

基于在除 PM2.5 技术、研发等方面的领先优势，日前，中国标准化协会联合海尔空调起草制定了《房间空气调节器去除 PM2.5 功能要求》，作为行业标准直接推广实施，进一步促进行业除 PM2.5 空气净化技术、功能的规范化发展，引领行业向空气质量调节方向转型升级。而且，为了传递健康呼吸的理念，让更多消费者拥有清新舒适的家居环境，海尔空调目前还开展了“除 PM2.5 一句话宣传语征集活动”，通过汇集大家的智慧创意向雾霾宣战，在除 PM2.5 空调的呵护下，一样可以自由呼吸！

从首创到同行跟风再到制定标准海尔持续引领

2011 年底，PM2.5 这一全新的名词开始闯入人们视野，咳嗽、咽炎以及一系列老年病发病率的持续增长，引发了人们的健康担忧。作为以“空气质量调节”为宗旨的空调品牌，海尔迅速挖掘到用户需要，从全球五大研发中心整合领先技术资源，研发了采用 IFD 高效除尘技术的除 PM2.5 空调。产品上市后，不仅满足了人们健康呼吸的舒适家居环境要求，同时引起业内不少主流品牌开始致力于 PM2.5 技术的研发，跟进推出相关系列产品，在行业内掀起一场空气净化技术升级潮。

目前，海尔空调主导制定除 PM2.5 行业标准，其采用技术以及相关功能参数成为行业的参照标准和规范，在行业领导者地位进一步稳固的同时，也增强了消费者对其产品的信任和认可。

同时，为了普及除 PM2.5 空调标准，分享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更多消费者了解除 PM2.5 产品的功能、优势，海尔空调在海尔与用户交互平台上开展了“海尔除 PM2.5 一句话宣传语”征集活动。记者从活动负责人处了解到，在 2013 年 3 月 13 日~4 月 12 日期间，登陆 <http://www.haier.com/cn/yxhd/2013/aircon0313/index.shtml>，创意海尔除 PM2.5 一句话宣传语并进行相关阐释，就有可能成为海尔空调的专属创意达人。

用户需求创新海尔执掌全球标准话语权

为何海尔空调能够把握行业发展的脉搏，从标准制定方面促进行业升级发展？这源自其对用户需求精准、及时把握。事实上，用户需求是行业进步的源动力，而率先挖掘到用户潜在需求并通过技术创新给予满足的企业，在行业洞察力和技术领先性都具备领先优势，行业标准的制定是其技术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海尔空调主导制定相关标准便是如此。

在空调进入中国市场约 30 年的发展中，海尔空调通过标准制定不断促进、引领着行业进步。以在空调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服务为例，海尔空调通过主导制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安装规范》国家强制性标准、《家用及类似用途无氟变频空调器安装服务规范》行业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七星服务规范》中国 CAS 标准等系列标准，从设计、安装、售后等多个领域促进空调服务的全面化、规范化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海尔空调在全球范围内主导行业标准制定，发起并主导制定美国移动空调标准、唯一代表中国参加 IEC 国际空调标准制定……在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日益增强。

来源：中国广播信息网

地址：http://www.cnr.cn/life/gdxw/201303/t20130315_512160574.shtml

[【返回目录】](#)

万通样本：绿色公司的公益之路

2013 年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上，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再一次阐述了万通系的公益理想。

一好思想、好目标、好人物与好行动。

2013 年，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上，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再一次阐述了万通系的公益理想。他表示，一个好企业要在企业与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和平衡关系。除了要照顾到股东的利益，还要施惠于周边所有相关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企业持久、均衡地增长。

理想背后是点滴行动。近年来，公益基金、低碳产品、生态社区、志愿者服务等项目，逐渐串联起万通地产的绿色公司经营之道，成为万通地产在公益责任方面的关键词。它们统一于企业绿色战略的锦旗之下，日益成为万通人展现绿色行为方式的载体。

生态社区与低碳建筑：人人共建

观念决定行为。绿色公司战略为万通地产的公益责任形象打上了最初的底色，并成为万通人潜移默化地行为准则与管理约束。

“绿色公司”愿景屡屡出现在万通地产的公开宣示中，已成为对管理层的有效约束。2008年4月16日，以承担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平台身份的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成立。它与公司的绿色战略降生在同一年，以推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宗旨。作为资金提供方，上市公司万通地产每年会拿出利润的0.5%，万通系非上市公司则拿出利润的1%，捐赠给基金会。据了解，仅在2011年，万通地产就捐赠200多万元给万通公益基金会，而这一年基金会用于公益项目的投入就高达780多万元。

基金会热度不断升温，中国生态社区的搭建也在其支持下逐渐步入正轨。2009年，万通公益基金会资助的19个社区和1座办公楼，共减少碳排放量超5万吨，项目直接影响的受惠人群达103900人。截止2010年，基金会共批准生态社区改善项目共计22个。2013年初，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身为万通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的冯仑透露了最新的数字：万通公益基金已做了近60个生态社区，连续两次荣登中国公益慈善透明度榜单，可谓成绩斐然。

除了生态社区改造与建设，万通地产的绿色增长最终需要从每一栋建筑的生态环保中创造最大的正能量。随着企业的绿色战略逐渐细化，与生态社区建设息息相关的是社区内每一栋建筑的绿色标准达标与否，“低碳”自然而然也成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万通地产董事长许立表示，未来五年，公司预计将开发项目1000万平方米，并全部符合绿色建筑标准，预计减少碳排放244.55万吨。这是万通践行绿色公司战略的第五个年头。据了解，公司每年都将拿出年营业额的千分之五用于绿色产品研发，“低碳”已成为内部产品管控的标准之一。

2009年，万通地产对外宣称未来开发的所有项目都将是绿色产品，2010年更公开承诺，所开发住宅产品将力争全部达到中国绿色三星体系标准。这样的官方承诺，令万通地产的绿色公司形象日益深入人心。2012年11月22日，万通地产再次荣获“2012低碳先锋企业奖”，在此之前，这一奖项通常是国外500强公司的专利。在万通地产总经理云大俊看来，万通地产在低碳建筑领域的布局，主要是出自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内地建筑业占据全国碳排放的量比达到了45%以上，因此，房企的减排责任格外重大。”

“目前的进展，只是万通地产在低碳建筑领域迈出的第一步，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在低碳建筑领域增加投入，这将是我们的实践万通地产绿色公司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大俊表示。

但是，绿色的故事需要每一位万通人的点滴行动，有赖于每一位万通人的主动参与，才能获得持续的动力，汇聚成激扬的绿色篇章。

植根于绿色公司战略，在生态社区的基础上，2010年，万通地产紧锣密鼓地继续推出“绿色社

区服务体系”，在“绿色社区行动”的旗帜下，推进并深入实践万通绿色社区建设。同时在位于北京、天津的9个成熟社区，推行旨在提升业主绿色行为模式的年度主题行动。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2013年，还将继续贯彻下去。

在连续10余年坚持集体义务植树约18000棵之后，2010年4月，万通地产及其下属子公司员工和家属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植树活动，这些让理念照进现实的绿色公益之举串联起每个万通人，也成为首次将“万通?万树节”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与文化活动之中的凭证。事实上，为打造公司长期植树基地，万通还计划在河北香河建立绿色基地。

从大战略的制定，到每一个社区、每一栋物业的绿色营建，及至普通员工的亲身参与教化，这都意味着推进数年的万通地产绿公司战略已经进入新阶段。

志愿者制度：人人公益

一面聚焦于运转公益基金和打造生态社区，另一面与之同步的则是指向公司内部志愿者的制度和组织建设。在万通内部，它们具有共同的公益慈善色彩，在企业绿色战略的一统下并驾齐驱。如果你愿意为一件事情付出工作之外的精力与时间，这大抵证明你是热爱它的。志愿者制度是万通地产绿公司战略的一个试金石。

2008年，万通地产制定发布了《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志愿者制度》，以鼓励全体员工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公司提供给每一位员工每年4个工作日用于做带薪志愿者活动。2008年，万通组织了320人次总计8124小时的义工时间用于四川抗震救灾。2009年，公司总部还召开第一次员工绿色志愿者会议，成立了员工自主发起的“绿色志愿者组织”，简称“绿种子”。公司内部的志愿者导向日渐明确。

这一组织正式发力于2012年9月13日，这一天，万通地产完成了对总部全体员工的专业志愿者服务培训，万通地产的专业志愿服务事务亦即日发端。公司内一个19人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开始为公益机构富群环境研究院湖南桃源手工艺产品营销设计方案。他们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富群进行辅导，将其项目定位、运作方式、需求等信息制作成完整案例。“这是万通地产在公益领域的一次创新实践。”万通专业志愿者计划的合作伙伴——惠泽人公益机构项目总监朱鹏程称。

至2012年12月15日，由万通志愿者规划的项目营销方案落地杭州万通中心，活动现场售出了60个公益手工艺品。至此，在多次方案研讨，万通40多人共同参与，志愿者团队总计投入服务时间188小时之后，这一服务项目尘埃落定，最终成为万通志愿者行动的一次开门红。与此同时，旨在实现社区垃圾减量的“绿房子”和看护孤残儿童的“儿童希望之家”两个专业志愿者服务的公益项目，万通志愿者踊跃参与，也在持续服务中。

人们普遍相信，这些行进在既定轨道上的公益慈善行为，使万通地产向“一家受人尊敬的民营

企业”继续迈进。万通地产董事长许立说，“把社会责任、企业价值观放在绿色竞争力框架下，用员工的公益行为和志愿服务构筑绿色公司的根基，进而凝结成万通地产绿色产品之外的绿色文化基因，经由所有员工的志愿行为，让更多的‘绿种子’在万通地产体系内扎根和成长，才能铸造企业牢固的绿色竞争力。”“在万通，公益是我的第二福利，我很享受这种感觉。我相信我的客户也会喜欢这样的公司。”万通地产的一位普通员工说。

来源：新华网

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13-03/19/c_124475141.htm

[【返回目录】](#)

利乐公布“2020 环境目标”最新进展

2013 年 3 月 21 日，全球领先的食物加工和包装解决方案供应商利乐公司公布了其推进“2020 环境目标”的阶段成果。2012 年期间，利乐在提供完全采用可再生原料的可持续包装产品、环境足迹最小化及实现包装零废弃的道路上再进一步。

利乐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德森先生表示：“我们开了个好头，不过要完成‘2020 环境目标’还要加倍努力。良好的环境表现与公司的长期发展息息相关。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客户以及其他外部合作伙伴紧密协作，确保兑现我们的环保承诺，帮助实现全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的远大目标。”

利乐公司的“2020 环境目标”发布于 2011 年，其中提高利乐包装回收再利用率、提供可持续产品和降低环境足迹，是该目标的三大重点。2012 年利乐公司在这些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回收利用

“2020 环境目标”计划在 2020 年将消费后利乐包装的回收率在 201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40%。

从全球来看，2012 年消费后利乐包装的回收量增长了 10%，从前一年的 52.8 万吨提升至 58.1 万吨，平均回收率达到 22.9%。在中国市场，2012 年消费后牛奶饮料纸包装的回收量达到 11.3 万吨，相当于 113 亿个 250ml 标准的利乐包装得到了有效再生利用，回收率接近 25%。

尽管中国垃圾分类回收的政策推进及基础设施建设尚属起步阶段，但利乐包装在中国的回收量仍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增长，回收率在过去三年里已经翻了一番。这是利乐长期不懈的支持建设牛奶饮料纸包装的再生产产业链、与多方协作共同探索完善垃圾分类和管理体系所带来的成果。

可持续产品

利乐“2020 环境目标”提出开发 100%由可再生材料制作的包装，并将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认证纸板在利乐包装中的使用率逐步提高到 100%。

2012 年，利乐在全球投放的 FSC®认证包装数量已达 264 亿包，较 2011 年提升了 40%。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利乐 2012 年共投放了 51.2 亿个 FSC®认证包装，占全球总量的近五分之一。自 2010 年首次在中国市场推出 FSC®认证包装以来，利乐在中国已累计投放了 117 亿个认证包装。

生物质塑料开盖的应用同样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 2011 年下旬利乐推出以甘蔗提取物聚合制造的生物质开盖以来，2012 年全球范围内使用生物质塑料开盖的利乐包装从 2011 年的 8 千万包增至 6.1 亿包。

环境足迹

利乐“2020 环境目标”承诺，力争将 2020 年全价值链的碳排放量控制在 2010 年水平，假设公司年复合增长率为 5%，这就意味着要减少 4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初步统计显示，2012 年利乐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当量较 2010 年减少了 2000 吨，而公司产量则同比增长了 9.5%。

2012 年 12 月，利乐中国呼和浩特包材厂与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续签了《绿色电力供应和采购意向书》。未来三年，利乐呼市工厂将继续 100%采用绿色电力，年采购量约为 3,000 万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2,290 吨。结合该工厂自 2009 年投入运营以来就全面使用的绿色电力，截至 2015 年，预计将累计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 13.5 万吨。这一举措有助于利乐实现全球总体的碳减排目标。

2012 年期间，利乐还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供应商以及客户携手合作，测算出全价值链的碳排放基准线，以及评定指标，以计算未来整个价值链的总体环境足迹。

来源：利乐中国官网

地址：http://www.tetrapak.com/cn/pressroom/news/Pages/2020EnvironmentalTargets_GoodStart.aspx

[【返回目录】](#)

三星加强中国市场布局 创建投资与社会责任并重模式

3 月 18 日，中国三星在创立 18 周年纪念日宣布今年为中国三星企业社会责任经营元年。中国三星计划在共享企业社会责任资源和力量，摸索投资与社会责任并重的崭新的产业投资模式，全方位扩大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用开放的心态积极与社会沟通等四方面全面推进。

此次，中国三星与社会科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基地”。过去的投资对于地区社会的贡献局限在了厂房建设、提供就业岗位、扩大税收、配套产业入住等经济层面上。三星要从这种传统的投资模式中跳出来，通过向地区社会普及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创造共同参与的平台等措施，寻找一条崭新的经济投资与社会责任齐头并进的投资发展之路。此外，中国三星还发布了首份“中国三星社会责任报告书”，承诺变为“开放的中国三星”。

来源：证券日报

地址：http://www.p5w.net/news/cjxw/201303/t20130319_69728.htm

[【返回目录】](#)

◎社会组织登记体制大变革专题报道

聚焦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大变革

3 月 10 日，备受各方关注的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七次重大行政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诚如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当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时任，3 月 16 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马凯指出，要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让人民群众依法通过社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有关规定，《方案》提出，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一是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

二是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民政部门要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切实履行责任。三是坚持积极引导发展、严格依法管理的原则，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外界普遍认为，上述社会组织的制度改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新突破。

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行业内相关人士，试图了解他们第一时间对于政策的态度与反应。

部委声音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

政府加快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

3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召开的记者会上。针对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对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安排，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李立国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了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安排。一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其中行业协会商会要与行政机关脱钩，自主开展活动，并且引入竞争机制，探索发展一业多会；对四大类社会组织，就是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同时，要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登记审查和依法监管，按照这个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国务院会部署职能转变方案的实施，民政部门一定落实好这些改革措施。

李立国认为，管理制度改革以后，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范围、步伐、力度会加大加快，会把一些事务性的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这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从总体上看，今后我国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会扩大和加强。

在实行管理制度改革后，怎样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加强依法监管。一是修订涉及社会组织的三个行政法规，把社会组织的资金、活动、行为都纳入到监管之中。二是促进社会组织活动的公开透明，增强行业自律，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三是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把民政部门实行的登记、年度检查、执法、评估的情况和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反映、评价及时反映在信息平台上，以利于加强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共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专家声音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张秀兰

去除顾虑 探索政策实施路径

“现在应该是全面放开的时候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张秀兰对《公益时报》记者说：“此前管理层面有一种恐惧症，担心顾虑太多，阻碍着这项政策出台。但事实证明有些担心是多余的，比如广州的社会组织放开登记比较早，并没有出现很乱的问题。”

借鉴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经验

国务院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中提出要引入竞争机制，探索一业多会。对此张秀兰认为，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建立了市场机制并成功地进行管理，竞争机制在市场领域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很好地转移到社会组织领域，但在政策上要做深入研究。

“开放登记之后，行业协会、枢纽组织等应该转变理念，主动发挥其枢纽作用和服务功能。”张秀兰认为，目前市场经济领域的各项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相比之下，社会组织领域因为有太多禁区和发展不足，政策研究严重滞后。研究是跟着问题来做的，如果不放开政策，就没有研究的对象和资料。没有机会去研究，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其实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

“所以说出问题并不可怕，市场机制刚建立的时候，也有很多问题，但我们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我对政策放开后的情况比较乐观。”张秀兰说。

管理能力要跟上

对于社会组织登记改革，张秀兰认为，各地此前的社会组织开放登记试点为全国性政策的出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要充分总结试点经验，梳理出哪些经验可以推广，哪些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建立学习机制，各地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另外，要制定出政策的具体实施步骤和路径，这是政策落实亟需的。”

张秀兰同时表示，放开登记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管理机构能力、人员跟不上。要保障这个政策有效实施，民政部门应该尽快加强管理能力建设，这是目前欠缺的，也是应当马上进行的。其次是加强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化来促进管理，应该在一开始就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以确保政策可以有秩序地、规范地进行下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各地方和各级部门都应该转变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理念。

“提升管理能力，需要军队未动，粮草先行。”张秀兰指出，社会组织登记试点进行了这么多年，大量工作压在民政部头上，但民政部门在人员、经费等方面都跟不上来，这一点是政策推行中的风险，管理跟不上，就可能会出乱子。“所以我强烈呼吁，可以从财政资金或其他相关资金来源中拨出一定比例，一定要保障人力资源建设。”

基金会声音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

引入竞争将极大改变慈善格局

《公益时报》：此前民政部以及各地都有推进直接登记的尝试，此次国务院改革方案提出这样的内容，有何不同意义？对于该举措，您如何评价？

秦国英：首先，这个改革方案对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是一个具有突破性改革意义的政策指向。

方案释放的信息，是政府下决心切实加快职能转变的步伐，把政府管得多过的职能下放给社会组织，进一步激活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让第三部门通过对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和提供服务，在维护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的正能量。

此前，已有不同省份开始为“开放”进行试水，民间资本、社会资源进入公益领域的空间在各地逐步拓宽。国务院的方案正是基于各地成功的实践做出的积极决定和正确选择。

其次，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快速发育，增加自主性，提高自主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性循环能力。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应该是现代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组织快速而成熟的发展，在提高公民的自主和公益意识，为基层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缓解社会矛盾，完善社会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和作用。如果说政府向市场放权，反映的是经济自主性，那么政府向社会放权，反映的则是社会自主性。

第三、放开登记管理是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新突破，这对于社会组织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社会组织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是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增强其自主性和活力的源头之策、高效之策、务实之策。对今后社会组织在促进改革发展和社会向善与和谐稳定方面发挥其优势作用，确实值得期待。

第四、政府应健全管理制度，发挥积极的引导、规范、监管作用。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不能止于一路绿灯得到一个“名分”，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还应该实施配套改革，政府还需在人、财、物上为社会组织创造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及良性竞争条件，同时健全管理制度，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公益时报》：直接登记，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对于现有基金会会产生何种影响？

秦国英：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社会组织还处于快速成长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提升的空间都非常大。对此，我们需要全面、辩证地看待这个政策信息。

公益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协会性组织实行一业多会，对基金会组织，特别对公募基金会，是挑战，更是机遇。

第一、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实现公益组织的优胜劣汰。各种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优质的公益组

织汇聚。同时，更多的学会、协会、公益类组织成长起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组织之间合作的空间越大，资源整合的可能性也会越多。

第二、推动基础较好的公益组织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机构，提高团队的执行力、公信力。面对公益组织新的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把自身建设的功夫下足，特别是团队的策划能力、执行能力、工作效率、公信力的建设上。不论到什么时候，要壮大组织力量，靠的还是组织的诚信，靠的是专业性、多样性的服务能力。只要我们有良好的社会信誉、专业性的服务、团队的整体实力，就一定会争取到企业的认同，争取到更多公益组织的合作。

第三、要以开放的视野，合作的姿态，加强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一业多会和公益类组织直接登记，会极大改变慈善格局。作为成立早的较大型公募基金会，一定要保持不自满、不畏惧的奋进精神，要向其他基金会和学会协会学习，不断更新理念，改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提高项目策划和执行能力，充实组织实力。同时，要善于合作。

当然，在今后的慈善资源配置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新的问题：一、公益资源会出现流失现象，部分企业、协会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基金会，自己运作公益项目，在一定阶段减少对公募基金会的支持；二、更多的草根公益组织因为获得合法地位，在争取慈善资源中形成一定的挑战；三、为争取公益资源可能会出现更多无序竞争的状况等等。

引入竞争机制不是政府不管，政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建立良好的公益市场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指导和监管制度。首先，要为公益组织的竞争创造市场环境、法制环境。要规范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监管，要修订行政法规，要促进社会组织活动公开透明。增强行业自律，要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共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其次，政府职能的转移也需加快脚步，增加购买服务力度。再次，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助力公益事业健康发展。另外，鼓励公益组织的强强联合、跨界合作，推动公益组织公益项目运作模式的多样化，将公益组织自主发展与合作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

各方受益 无人受损

此次国务院改革方案中提出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这是一个利好的制度，标志着准入门槛放低了，同时，可由此理解政府的过度管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当然，成员多了，竞争对手也多了，竞争会变得激烈。竞争将促进基金会提高效率和品质，可谓各方受益，无人受损。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

能否顺利登记尚待观察

直接登记从地方尝试变成了中央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对于全国社会组织来说是利好消息。这说明直接登记试点成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直接登记突破了长期阻碍社会组织登记的双重管理体制，但是是否将来社会组织就能很顺利地登记，还有待观察。

非公募基金会基本上早就没有门槛了，可直接登记。如公募基金会也可一业多会，直接登记，基金会必然会走上公开透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道路，越办越好。现存的基金会如不改革，提高透明度，提升专业性，肯定会为公众所抛弃。

民间声音

草根组织期待柳暗花明

2013年两会之前，已有广州、浙江、北京等多个省市开展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公益组织成功注册的新闻时见报道。但各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各种客观条件以及大环境没有放开等原因，许多草根公益组织在寻求注册时仍遇到种种困难，迄今没有得到民政部注册门的正式身份。

国务院此次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消息传出，让这些在“转正”路上屡受挫折的公益组织重又抱起希望。3月16日，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一北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看到全面放开登记的消息后，计划下周再去北京市民政局询问，而此前他们已经先后到多个相关部门拜访过七八十次，至今未果。

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成立于2000年3月，我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发布，但当时北京市还未发布民非登记的规范性文件。胡一北说，当时政府部门的同志帮忙想了办法，在工商部门进行了登记注册，名称为“北京慧灵家政服务中心”。

因为工商注册没有资格申请政府支持资金，慧灵多次申请转为民非注册，但这个过程就如唐僧西天取经般漫长曲折。胡一北介绍，对口的业务主管单位残联和民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地理原因，慧灵最初在西城区注册，后来因房租高，搬到了东城区，于是西城区这边说要在服务点所在地登记，东城区则说原来在哪儿登记的还在哪儿登记。另一方面是机构性质，慧灵采用比较方便的社区化服务模式，在昌平、丰台、东城等区都有服务点，但实际上是一个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受理机构将服务点做分支机构对待而驳回了申请。这条规定现在看来可能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组织发展情况了。

2012年，北京市社会组织登记放开已逐步推行，慧灵在年底提交申请，但仍没有成功。与慧灵情况类似的还有为盲人提供文化服务的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红丹丹”曾因找不到主管单位而去工商注册，去年通过一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向北京市民政局递交了登记申请，但后来没有得到回应。国务院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出来后，“红丹丹”的曾女士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对今年正式注册民非很乐观。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3-03/19/content_5474.htm?div=-1 [【返回目录】](#)

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契机

“多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是今年两会颇受关注的一大热点，甚至有代表认为这是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的一大亮点。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有关领导明确提出：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从1989年10月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开始，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一直遵循“双重管理”制度，要求社会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并得到支持，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这种“双重管理”制度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的后果就是，“为了挡住个别坏的，大量好的组织也被挡在外头”。

为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各地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到了2012年，全国已有19个省开展或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9个省下放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8个省下放了异地商会登记管理权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提出的社会组织登记新规定，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更加有利的环境，必将有力促进各类社会组织成长壮大。

转变政府职能的要义，就是将一部分政府管不了、不该管、管不好的社会问题还权给社会，鼓励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从政府中转移出来的职能，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政府的某些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核心就是政府放权，很多公共事务需要区分，那些社会能管好的，政府就别再管了，大胆放权给社会组织。当然，在放权的同时，要培育好社会组织，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防止蜕变成“二政府”。

坦率地讲，当前各地不少行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检测机构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直接从行政部门分离出来的，管的事情和政府差不多，行业商会还可以打着社会组织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收费谋利，成为政府官员的“养老院”，不少政府领导退休后就被安排去行业商会任职。这种“二政府”的怪胎早已被社会所诟病，其中衍生的腐败现象更是为群众深恶痛绝。

社会组织应尽快实现“去行政化”。让社会组织的人、财、物与政府部门完全脱钩，把所谓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都名正言顺地回归社会，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性社会组织。政府公务人员退休后，不得再到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任职，实行严格的任职回避原则。社会组织的主要领导原则上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择优选聘。

社会组织还应尽快实现“去垄断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是大势所趋，但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阳光运作，不得暗箱操作，同时坚持“去垄断化”原则，绝不允许搞一家独大，而要让这个行业里的社会组织自由竞争，明确选择标准，谁的服务好，政府就买哪家组织的服务。

社会组织要具备独立自主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既要依靠自身力量发展，也要努力提高与政府、企业和社区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跨界合作能力。通过参与政府采购，与基金会合作开展项目，由企业购买服务，以及自筹项目等方式，实现筹措资金的多元化。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但绝不是把公权力延伸到社会每个领域，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此，一方面应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成熟发达的社会组织，加快社会建设。唯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各得其所、各就各位，政府职能转变才可能真正到位，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刘武俊 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

来源：福建日报

地址：<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22/c40531-20881736.html>

[【返回目录】](#)

法制日报：只有法律自身完善社会组织才能成熟

3月13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就社会组织的管理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将修订社会组织的行政法规，将资金、活动、行为都纳入监管。

正在审议中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让人民群众依法通过社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人们再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组织。

一直以来，我国社会组织都处在一种“发育不良”的状态，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着进入门槛高、管

理不规范、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导致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国务院的方案无疑是在为社会组织“松绑”,同时也是在为社会组织加压,今后的社会组织将承担更多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职能。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长期在政府羽翼下的社会组织,就像一个始终没长大的孩子,它能承担起和承担好它应当承担的职责吗?一些社会问题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换了社会组织就一定能管好吗?这一点还真的不容乐观。

社会组织要想尽快壮大成熟起来,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能,必须要靠法治来“催熟”,以法律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目前,我国涉及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只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3 部行政法规,存在着法律位阶低、内容分散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截至目前,法规还保留着“托管单位”的管理方式,即成立社会组织需要获得有关行业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这与人们期望的“直接登记”管理相去甚远。虽然在这点上一些地方性法规已经有所突破,如广州、北京,但是上位法还没有修改。

所以,要让法治“催熟”社会组织,法律自身就要先完善起来。一方面当务之急要尽快修改现行的行政法规,使其符合当前社会组织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完善社会领域立法,制定统一的社会组织法也应当适时提上日程。

只有法律成熟了,社会组织才能成熟,这是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对立法提出的新要求。

来源:法制日报

地址: http://www.legaldaily.com.cn/locality/content/2013-03/15/content_4278843.htm?node=30761

[【返回目录】](#)

中国青年报:政府放权给社会 四类社会组织将不需再找“婆婆”

在我国延续 20 多年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3 月 14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这样规定: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以前,申请成立社会组织,在向民政部门申报登记之前,还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没有

找到这个“婆婆”就意味着无法登记。现在，这一饱受诟病的现象被终结。

这样的变化，成为今年两会期间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

“请大家注意，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改革是这一轮改革中的重大突破。”3月11日下午，在江西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

“改革开放32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但缺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已经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接下来的改革必须要搞清楚政府和社会的边界在哪里。”赵白鸽提高了声音。

“目前的中国，需要大量的作为政府伙伴和助手的社会组织来共同承担责任、发挥作用，需要通过积极的社会建设来正面引导社会的有序发展，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自我调适的社会。”她说。

全国政协委员王名多年来一直建言改革我国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他认为社会组织准入的高门槛导致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没有登记注册，这些社会组织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无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张华（化名）2009年就几个朋友成立了创业者联盟，为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创业提供资源、技术支持。后来她发现需要“拜个码头”，找一家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局注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跑了好久，发现对于我们这种草根NGO来说，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没有一家单位愿意给你做主管单位”。

得不到社会组织的合法身份，张华他们只好进行工商登记，千辛万苦募集来的捐款还要缴税，开展稍微大一些创业资源共享活动的成本根本无法承担，几年过去了，联盟规模依然很小。

对于已经通过的方案，张华表示，热切期盼降低门槛的详细政策措施。“我现在最盼望有真正的政策措施让我们草根NGO看到希望。”

来自地方的民政官员更关注相关法规的修改。

“改革方案已经明确，当务之急要尽快修改三个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为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提供法律依据。”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徐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社会组织门槛的降低，带来的直接变化将使民众的许多个性化需求，能够通过更多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得到满足，”他以养老服务为例解释说，多年来政府投了很多钱，但单靠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现在不是缺吃少喝，空巢老人心灵慰藉、失能老人的专门护理等工作不是政府拿钱就能够全面提供的，最好的办法是让社会组织去做，扩大政府预算，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个性化、人性化服务。

2011年，江西省专门出台文件，对社会组织“先登记、后备案”，政策实施后，获得合法身份

的社会组织增加了近两成。

除了降低登记门槛，几位全国人大代表还注意到了改革方案中逐步推进有关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表述，“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黄代放看来，“原来很多协会、商会带有很多官办色彩，一些官员退了以后，来到商会担任会长、秘书长，掌握人事、财务权，有可能发生一些腐败行为。脱钩后，会带来竞争，谁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好，谁就能得到更多资源。”

赵白鸽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将迎来新的良好机遇，需要得到更多支持。“我们期待在法律、体制、政策、规划等方面进一步营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积极推进职能转变，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把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更多的转移给社会组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不要认为对社会组织放权，政府就不必投入了，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未来的社会服务项目，政府应当承担相当大的资金保障，社会组织则提供多项具体的社会服务，这个大格局，需要确定下来。在香港，政府每年的财政综合援助资金大体为 400 亿港元，其中有 100 多亿港元是直接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 3 月 13 日表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以后，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范围、步伐、力度会加大加快，会把一些事务性的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这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从总体上看，今后我国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会扩大、加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地址：http://zqb.cyol.com/html/2013-03/15/nw.D110000zgqnb_20130315_1-T01.htm

[【返回目录】](#)

中华工商时报：民间公益组织或将蓬勃涌现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这样规定：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以前，申请成立社会组织，在向民政部门申报登记之前，还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现在，在我国延续 20 多年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被终结了。这样的变化，给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带

来了更宽松的政策与空间。

“社会组织的发展将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但同时各类社会组织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说：“我们期待在法律、体制、政策、规划等方面进一步营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积极推进职能转变，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把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更多地转移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登记门槛降低，无疑今后一段时期，各类社会组织将频频涌现，对于红会来讲也将面临各种挑战。赵白鸽坦言：“的确，红会今后会遇到更多的竞争，但是红会非常欢迎这样的竞争。中国有13亿人，民间公益组织再多也还是不够的。民间公益组织越来越多，红会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普及防灾减灾、自救互救、逃生避险、卫生健康，增强社区自我发展综合实力上面了。”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实行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后，在认真依法履行登记审查职责的基础上，民政部门将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依法监管。对于社会捐赠资金如何监管的问题，李立国表示，社会捐赠资金是纳入到政府的监督和检查之中的，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一是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使用效果进行专项检查。二是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对捐赠资金的划拨到位使用情况进行专项的审计、监察。三是民政部门对使用捐赠资金，在使用的基层单位和管理环节严格要求进行公示。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地址：http://203.86.76.53/epaper/uniflows/html/2013/03/19/12/12_55.htm

[【返回目录】](#)

广东推进社会组织自治 力争半数组织承接政府职能

“抓紧制定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的方案，”3月18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对下一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提出了要求。

“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李克强总理在3月17日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如是说。

改革之帆高高扬起，作为排头兵、先行地和实验区，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已率先迈出步

伐。

加快社会组织自治化进程

省民政厅厅长刘洪说，近年来，我省民政部门深入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加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不断完善专业社工服务，在民政领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从去年7月1日起，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外，我省已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不再需要找主管单位这个“婆婆”，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刘洪说，改革为社会组织松绑，并通过出台各项培育扶持措施，激发了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正能量。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进一步创新思路举措，勇于探索新路、先行先试，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充分发挥民政的基础作用。推进社会组织“政社分开”，巩固和完善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加快社会组织自治化、民间化进程。

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认为，从全国来看，广东引领了社会组织的改革，而此次国家层面的社会组织改革也借鉴了很多广东的经验。广东社会组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去行政化”就是要剪断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各种利益联系，还原其民间组织的本来面目。“去垄断化”就是要形成一种竞争性的机制。

政府主动向社会让渡空间

刘洪说，在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方面，将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建立健全以法人治理为核心、公信力建设为目标的法治规制。健全各类型社会组织法人治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监管制度，形成民主自治、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综合治理机制。引导社会组织下沉基层，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力争50%以上社会组织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资质和条件。

刘润华认为，之前的机构改革只讲政府自身设置、职能如何优化，但这次改革却清晰地指向了向社会放权，将推动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这是了不起的改革，必将极大地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发挥作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告别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模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社会日趋多元，由政府包打天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灵了，现在就是要确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相适应的社会治理结构。”刘润华认为，在新的社会治理结构下，政府要主动向社会让渡空间，只要社会能够自我调节和管理的事务，政府都要尽量放手，尽量交给社会去管。政府腾让的空间必须要有承接的主体，显然，社会组织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承接主体。

他表示，社会组织是双刃剑，监管体制需要逐步完善，社会也需要凝聚共识。放开社会组织登记要循序渐进，在一些敏感度相对较低的社会组织先行改革有利于形成共识，应鼓励一些具有明显社会意义的社会组织率先开放、率先发展。下一步，省社工委将在为社会组织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上继续发挥作用。

五类社会组织优先发展

据了解,按照分类指导原则,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群众生活类、枢纽型社会组织将得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通过使用社会组织信用管理共享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可以掌握社会组织的信用状况,让守法守信的社会组织在竞争中胜出,推动行业自律和优胜劣汰。

省社会组织党委副书记陈钦城说,应充分发挥不同类别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行业协会应突出行业自律,反映行业诉求,促进行业发展,民办非企业单位应突出优质服务,满足教育培训、文化、群众医疗等需求,基金会应突出扶危济困、慈善救助、捐资助学、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作为,城乡基层社会组织要突出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维护稳定。

陈钦城表示,社会组织的发展呼唤政府给予更多的扶持,建议各级政府都建立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和社会组织公益创投资金,重点用于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增加非营利组织取得税收减免优惠的种类和范围,保障社会组织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尽快建立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劳动用工制度,完善人员流动聘用、户籍管理、档案管理、职称评定、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具体政策措施,创造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

“三社联动”互相促进

有学者把“社工”、“社区”、“社会组织”比喻为拉动社会管理创新的三驾马车。在实践中,“三社联动”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认可。

刘洪介绍,民政部门将探索建立“三社联动”的工作机制,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区居委会为枢纽,以社会组织为支撑,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为提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民间运营等方式,实现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 and 社工人才的有效联动、互相促进。在这个格局下,社区服务供给由政府出资购买,由社区居委会引领带动,“三社”联动互补。

“围绕增强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需要继续深化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刘洪说“厘清街道与社区居委会权责,推行政务社区准入制度,可以减轻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负担,强化社区自治组织能力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枢纽作用。”

刘润华也认为,在保留街道办事处的前提下,可以对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实行功能差异化,由街道办事处兜底承接政府下延到社区的各种工作。“从表面上看层级没减少,但由于居委会的行政性工作被街道办事处拦截住了,从工作层面上看等于减少了层级。其中,更重要的意义是推进居委会去行政化。”

此外,鼓励范围较大的社区业主委员会和居委会融合也将提上议事日程。刘润华说,业主委员会实际上也是基层自治组织,是围绕着业权展开的自治。物业管理社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尽管现

在存在很多问题，但通过业主自治实现群众自治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省社工委与相关部门已经形成共识，将尝试通过制度设计来整合。”

据了解，省社工委接下来将在社会建设上鼓励改革的有30多个领域，这些领域是在对各级部门多达三四轮的征求意见基础上形成的，是对基层改革的一个指引，没有强制性要求。

来源：南方日报

地址：http://news.jwb.com.cn/art/2013/3/20/art_189_2555943.html

[【返回目录】](#)

深圳率先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从深圳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改革，现在已经在广东全省实施，人们普遍认为，这为推进社会建设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16日在北京表示。

吴敬琏16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举办的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新近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无疑是我国新一轮改革的开场锣鼓，例如它明确了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安排，对四大类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全面深化改革已形成共识，并且，从中央部门到地方都出现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探索。”吴敬琏指出，“一些既符合改革的总体方向，又无需与其他改革配套的改革，可提前独立进行，择机单独推出。”他举例说，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改革呼吁多年，突破是从深圳开始的，就属于这类改革。

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初步形成了社会多元共建共享共治的工作新格局。社会组织总量以年均两位数迅速增长，目前，深圳市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已达五六千家。

对此，吴敬琏表示，市场经济社会中，民间组织不是“二政府”机构，应该没有主管单位。但是过去，申请成立社会组织，在向民政部门申报登记之前，还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没有找到这个“婆婆”就意味着无法登记。为此，政府、学界、商界的人一直呼吁改革，突破从深圳开始。

来源：深圳特区报

地址：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3-03/17/content_2408383.htm

[【返回目录】](#)

安徽强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3月19日，记者从全省民政暨社会救助工作会议获悉，今年我省将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全面落实中央提出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

“我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贾宝明介绍，截至2012年底，全省依法登记社会组织达19419个，其中社会团体11291个，民办非企业单位8076个，基金会52个。

此外，还有纳入备案管理的城乡基层社会组织8304个。2009年与2011年，我省先后就合芜蚌试验区和皖江示范区内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出台意见，明确两区内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可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目前，两区内直接登记社会组织超过150家。今年，我省力争就全省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出台意见，落实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的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要求，并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引入竞争机制，探索一业多会的模式。

“适应宽进严管需要，我省将简化登记手续，推行社会组织网上登记和年检。”贾宝明告诉记者。为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我省将完善登记、年检、评估、执法“四位一体”社会组织监管模式，建立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制度和失信惩罚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来源：安徽日报

地址：

http://www.ah.gov.cn/stage/show_Sid_Zwxx.aspx?id=6F549174-3967-47A6-9A8C-FFDC4916242D&ctn=ah

[yw](#)

[【返回目录】](#)

◎公益布告栏

第八届中华慈善奖公布入围名单 启动公众投票

3月21日,民政部向社会公布第八届“中华慈善奖”入围名单,并正式启动公众在线投票。

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自2012年12月25日正式启动,截止到2013年3月12日,共收到744份申报材料,其中“最具爱心慈善楷模”197份、“最具爱心捐赠个人”112份、“最具爱心捐赠企业”160份、“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275份。

申报工作启动以来,民政部通过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推荐候选者以及申报人自荐等方式进行了广泛征集。为了保证各方能够顺利申报,除了开通信函、电话、邮件、传真等传统申报方式外,民政部还指导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对中国公益慈善网进行升级,进一步完善了中华慈善奖网络申报平台。据统计,有93.8%的申报材料是通过中国公益慈善网“中华慈善奖在线申报系统”提交。

申报截止以后,评选办公室对各个奖项的申报材料进行了认真核实和筛选,以确保初选工作的公平、公正,并最终从申报材料中确定200名入围名单,其中“最具爱心慈善楷模”40个、“最具爱心捐赠个人”40个、“最具爱心捐赠企业”80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个、民营企业40个、港澳台及外资企业20个)、“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40个。

第八届“中华慈善奖”的公众在线投票时间为3月21日—3月27日,公众可登陆中国公益慈善网(<http://eightcharity.charity.gov.cn/>)进行在线投票。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将根据评委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从入围名单中最终选取100名获奖者予以表彰。

“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由民政部每年举办一次。作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中华慈善奖”旨在弘扬和表彰社会各界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崇高义举,彰显慈心为民、善举济世的慈善精神,激发全民向善、人人为善的昂扬热情,自设立以来,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范围为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在我国赈灾、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助学、助医以及支持文化艺术、教育科研、环境保护等公益慈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企业和有突出示范作用的慈善项目。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设立四类共计100个表彰名额,即“最具爱心慈善楷模”20个、“最具爱心捐赠个人”20个、“最具爱心捐赠企业”40个和“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20个。

附件:

第八届“中华慈善奖”入围名单(各奖项按拼音字母排序,共200名)

一、最具爱心慈善楷模(40名)

阿扎提古丽·日介甫、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陈锐、陈万霞、陈伟鸿、陈一丹、第二起跑线医疗志愿服务团队、丁耀先、方庆云、高镇同、郭海良、胡宝桃、孔祥银、黎敏兰、励娜、梁张辉林、廖彩梅、林秀贞、刘发英、刘凤英、刘岩、罗布旺堆、马依尔江、彭庆英、启民义工、钱宏伟、苏芒、汤福荣、田洪武、天天捐、王诚印、王敏、王晓菲、谢东祥、杨文学、杨玉仙、叶树元、禹小琴、赵克信、自蓉

二、最具爱心捐赠个人（40名）

曹德旺、陈爱莲、陈逢干、陈建福、党彦宝、傅光明、古润金、侯昌财、侯建芳、黄炳均、盛承慧伉俪、黄朝阳、黄如论、贾锋、李春平、刘彪、潘亚文、任太平、任元林、沈小平、释妙乐、宋国强、苏志团、孙俊良、谭少群、唐白莉、王健林、王振滔、谢国辉、许家印、许连捷、杨景队、杨受成、杨兴义、杨钊、姚志胜、叶如平、张克思、张利军、朱恩馥、宗庆后

三、最具爱心捐赠企业（80个）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个）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东风汽车公司、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国家电网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铝业公司、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40个）

安徽宣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大商集团、福建达利集团、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福建正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时代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宏立城集团、海航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兴安矿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华夏董氏兄弟集团、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劲牌有限公司、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啟福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森马集团有限公司、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太阳雨太阳能有限公司、腾讯公司、万向集团公司、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亿达集团有限公司、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卓尔控股有限公司

港澳台及外资企业（20个）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戴尔(中国)有限公司、顶新国际集团、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华阳电业有限公司、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强生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威盛电子、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正大集团、中国衣恋集团

四、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40个)

爱心助环卫、安利环保嘉年华、长沙市“幸福家园”危房援建项目、慈济迁居项目、慈善资助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第十九届“蓝天下的至爱”系列慈善活动、福建省红十字城乡困难居民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共铸中国心、浩德南宁助学项目、湖北省慈善总会困难家庭大病救助项目、捡回珍珠计划、捐建希望小学、捐助教育基金、资助贫穷大学生、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掘起生命之泉——红层找水、芒果V基金“快乐校车”、萌芽100爱心图书室计划、民生大礼包项目、母亲邮包、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项目、贫困孤儿和留守儿童文武帮扶项目、情暖江苏春节慰问活动、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神华爱心行动、手牵手家连家结对帮扶计生家庭大行动、思源扬帆计划、为了我们的孩子——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为生命续航——春雨大病应急救助项目、芜湖春雨育慈项目、武陟县村级慈善工作站建设项目、小天使基金——贫困白血病儿童救助项目、寻找需要帮助的人——来深建设者关爱基金、阳光·心灵贫困精神病人慈善救助项目、阳光伴我行、阳光下展翅行动——上海市闵行区有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教育帮扶项目、岳阳市特困家庭大病医疗慈善救助项目、藏文化慈善基金、中国肯德基曙光基金、中华红丝带基金凉山州艾滋病防治项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资助80后农民工创业就业项目

来源：民政部

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303/20130300431642.shtml> [【返回目录】](#)

福特基金会庆祝北京世妇会召开 20 周年项目招标

京+20 讲述她/他的故事—项目招标书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世界妇女运动的转折点。各国政府通过《行动纲领》对推进性别平等做出了庄严承诺。空前数量的妇女运动代表，积极分子和倡导者相聚在一起围绕社会性别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动员。来自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大会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北京世妇会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庆祝北京世妇会召开 20 周年，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启动了一个资助计划，拟资助 10 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 25,000 美元，资助个人或者机构讲述北京世妇会给他/她们带来的影响。故事不限内容、时间跨度、形式和目标人群，可以聚焦 90 年代初世妇会的筹备，可以聚焦受世妇会的影响而出现的当前妇女运动的趋势和现象，也可以聚焦整个 20 年。叙述形式可以是新媒体、纪录片、文学作品、学术或通俗文章、戏剧、艺术、口述史和多媒体等。故事的目标受众可以在中国，也可以是全球范围，可以是大众，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群体，例如，故事可以敦促对妇女运动或其它社会群体活动进行反思或变革，也可以只针对某一特定机构发出倡导。

评选的主要标准是故事要有创新性，并能引起目标受众的共鸣。

申请项目覆盖的领域即可以是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六大项目领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教育、治理和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法律与权利及加强民间组织和慈善领域建设，也可以是其它不同领域。

我们会优先考虑中国机构或个人的申请，但同时也会考虑国外的申请。

获选者将被邀请参加我们在项目启动阶段举办的为期一天的工作坊，届时我们将聘请顾问或者由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为大家提供咨询和指导以进一步完善项目。获选者故事将在世妇会 20 周年庆典会上发布。

如果您有意申请，请递交一份简短的项目概要，中英文都可以，需要包括：

1. 一页简介，介绍您想做什么、为什么做和怎样做，包括传播渠道以及如何使您的故事能让您希望的群体听到，请尽量具体描述；

2. 一段机构简介；

3. 项目主要成员简介，每人一段，其中包含一句话描述成员在项目中的作用；

4. 简要预算（如果预算超过\$25,000，请注明其它资金来源）；

如果您申请的是制作艺术、影视、新媒体或文学作品，请提供您以前的作品节选、摘录或剪辑。

书面申请不能超过规定长度，对于附加的其它申请材料，我们不能保证完整地观看或阅读整部

作品。如果您递交了 DVD，请剪辑出 10 分钟的介绍，或者注明需要我们观看的时长为 10 分钟的那一部分。如果您递交了写作作品，请告诉我们具体需要阅读哪一页节选。

时间表：

2013 年 6 月 15 日为申请截止日期，请将申请发给宫娅丽女士，电子邮箱地址：y.gong@fordfoundation.org；邮寄地址：中国北京市建外大街 21 号国际俱乐部办公楼 501 室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邮编：100020）；

2013 年 7 月 15 日前评选出入围项目，我们将与入围候选人联系并告知相关信息；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评选出最后的 10 个获选项目；

2013 年秋季召开为期一天的项目启动工作坊；

2014 年底完成项目成果。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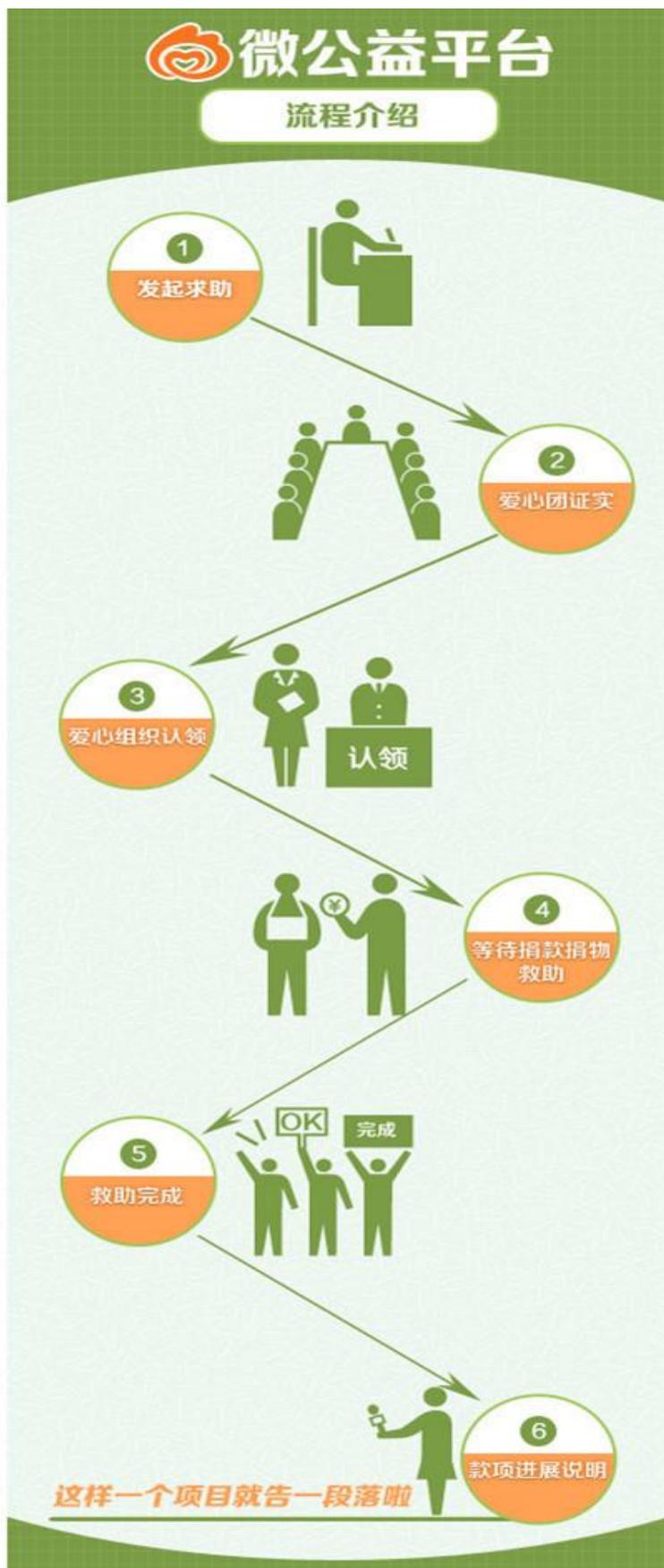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sortinfoview.php?id=7992>

[【返回目录】](#)

新浪微公益办事流程

自 2012 年 2 月正式上线以来，微公益作为救助平台主要承担劝募和监督的职能。所有加 V 用户（个人/机构）均可发起求助，并由有公募资质的公益机构核实认领并具体执行跟进。在项目进行中及结束后公益支持机构可随时向微公益提交结款申请。后续微公益将与亿万网友一起监督项目执行进展！

流程介绍如下：





来源：新浪微公益微博

地址：<http://weibo.com/weibogongyi?topnav=1&wvr=5&topsug=1>

[【返回目录】](#)

2013 年第五届 SEE · TNC 生态奖要评基层政府

第五届“SEE·TNC生态奖”于2013年3月正式启动，并将于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举办颁奖典礼。本届生态奖的主题是“全民给绿 美丽中国”，旨在促进日益兴起的环保运动，推动中国民间力量参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工作，改善生态环境。

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生物圈破损等严重危机，地球再也无力继续支持工业文明的这种发展。人类除了转变文明形态，迈向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环境危机、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全球最为重大、紧迫的问题。而走出这一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财富积累的工业文明发展理念，代之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切实转变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走生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之路，推进经济社会生态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关乎全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公共事务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政府、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需发挥各自作用和优势，全社会积极行动，为建设生态文明不懈奋斗，共同缔造人类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

评基层政府？全民给绿。

政府摒弃唯GDP增长反映业绩，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强化民主法治的监督约束机制。无疑，此次第五届SEE·TNC生态奖增设了针对基层政府的“绿色治理者”就能够树立起这样的基层政府的正面典型，为探讨可持续发展给出一条选择。

企业作为社会福利的创造者，不断提高其创造价值的效率的同时，也积极改进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回报。

知识分子以独立的身份，出于一种公共良知，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

公民理直气壮地依法主张权利，参与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

只有当所有人都用心地热爱自然、关爱生命，从自身做起，践行生态环境伦理观：维护环境权益、监督环境破坏、推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落实，全民给绿，才能更有力地遏制生态和资源状况的恶化，才有可能让“美丽中国”从文件中走下来，让理想照进现实，带给孩子们有生命力的未来。

奖项设置

本届共设置“绿色治理者”“绿色推动者”和“微博给绿奖”3个奖项，共13个获奖名额，奖金总额约为100万元。第五届“SEE·TNC生态奖”的奖项设立与以往有所不同，保留了第四届设置的“绿色推动者”奖项，并将“绿色知行者”和“绿色生活者”奖项并入；同时，增设了“绿色治理者”的奖项，以彰显SEE基金会对社区工作的支持和对基层政府有效工作的肯定。

绿色治理者

该奖专为保护生态和污染控制、探讨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工作的基层政府机构而设置。基层政府范围指县（市、区）。从管理机制上制订了生态保护相关规划和规章，并且能够有效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及地方颁布的各项环保规定、制度等。在污染防治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有明显效果。2年内无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能够科学利用资源（特别是水资源），未对区域（或流域）内其它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生态环境影响，且能够联合社会组织共同投身到生态保护工作中去。

绿色推动者

以关注和推动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议题为使命的机构和个人，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能够发挥扎实、创新、专业、合作的精神，且取得显著进展。可以是NGO组织和从业人员，可以是学者（包括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记者（包括专业记者或公民记者）、法律工作者、政策制定或执行者等，可以是人民当中的普通一员。他们为公众参与生态保护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实际的贡献。该奖项总共设10个获奖名额，其中：个人奖得主每名奖金人民币5万元；机构得主每个奖金人民币10万元。

微博给绿奖

为了充分考虑新媒体网民的意见，发挥与调动网民对环保和生态的参与度，该奖项将从官方微博发布的关于SEE·TNC生态奖微博当中选出转发和评论总量第一的候选人，结合评委会和奖项设置综合意见，评出微博给绿奖获奖者。该奖项将设置1个名额，奖金5万元。

两委会参加评审

第五届“SEE·TNC生态奖”的评选办法在往届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将由参选人直接申请转为由推荐委员会提名，再由评奖委员会进行评审。

本次评选将设置推荐委员会和评奖委员会，分别由 SEE 和 TNC 邀请组成。推荐委员会名单将向公众公示，每个推荐人需要核实奖项候选人信息真实性和完整性，推荐时间为 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3 年 4 月 10 日。

评奖委员会将由 SEE 基金会现任秘书长、TNC 推荐专家、SEE 会员企业家捐赠人、环保部门官员、资深媒体人士、环保组织代表、特定领域专家等 8 名成员组成，并由 SEE 基金会秘书长担任委员会主席。评委会将在经过两轮现场评审会后，向评委会主席提交 SEE-TNC 生态奖提名奖名单。最终，由评委会和 SEE 会员代表最终投票选出获奖人。

2013 年第五届 SEE-TNC 生态奖颁奖活动将于 6 月 5 日在北京举行。

SEE•TNC 生态奖前世今生

“SEE•TNC 生态奖”的前身为“SEE 生态奖”，由 SEE 协会于 2005 年创立（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即 SEE 基金会与 2008 年成立）。奖项旨在促进日益兴起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中国民间力量参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工作，改善生态环境。此后，SEE 基金会与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将这个奖项发展为两年一届的“SEE•TNC 生态奖”，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到目前为止，该奖项共奖励 167 个获奖项目、机构和个人，累积颁发 360 万元奖金，成为中国环保公益领域颇受关注的重要环保奖项。

第五届“SEE•TNC 生态奖”由 SEE 基金会、TNC（大自然保护协会）共同主办，将结合十八大召开后的新形势，在前四届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评选基层政府、公众知识分子、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中的标杆，以扩大环保公益事业的社会影响力。

欲了解更多生态奖信息，请联系

赵文耕 zhaowengeng@see.org.cn 13621200844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4024 [【返回目录】](#)

【刊物简介】

公益慈善周报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策划编辑，旨在为 NGO 领导人以及政府民间组织管理负责人提供一周公益慈善新闻回顾，把握当前公益慈善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从而为 NGO 机构发展与地方民间组织政策推动发挥积极作用！

【主办机构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人文与发展学院先后参与了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参与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民政部民间组织局相关政策调研项目、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以及众多国际与国内 NGO 的项目评估与监测项目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公益慈善领域主要关注的重点：

-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
- 公益组织发展咨询研究
- 公益项目开发、评估与监测
- 公益组织能力建设

【刊物订退阅】

如果您的同行或相关人士希望订阅此刊物，请发送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位至 gycsweekly@gmail.com 即可。

如果您希望退订此刊物，也请直接回复上面邮箱告知。

主办机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董 强
编 辑：赵丽霞、杨文、蒋育龙、陈婉君、阳慧颖
办公电话：010-62731470
电子信箱：gycsweekly@gmail.com